

肖洛霍夫中短篇小说选





肖洛霍夫 中短篇小说选

马龙闪 段心强 / 赵惠媛 译

新 华 出 版 社

新 华 出 版 社
PDG

肖洛霍夫中短篇小说选

〔苏〕米·肖洛霍夫 著
马龙闪 段心强 赵惠媛 译

★

新 华 出 版 社 出 版
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
重 庆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7.75印张 插页2张 175,000字
1985年10月第一版 1985年10月重庆第一次印刷

印数：1—10,500册

统一书号：10203·069 定价：1.60元



译者的话

《肖洛霍夫中短篇小说选》主要是根据苏联列宁格勒文学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古典和现代文学名著丛书苏联文学部分中的一卷《肖洛霍夫小说集》(一九八三年版)译出的。在这个集子中,收选了苏联著名作家米·肖洛霍夫的主要中短篇小说。

肖洛霍夫是以他的长篇巨著《静静的顿河》闻名于世的,但是,他的中短篇小说也象“草原上的鲜花一样,生气勃勃,色彩鲜艳”(老作家绥拉菲莫维奇语),颇具特色。

肖洛霍夫的这部中短篇小说选,是按年代编选的,包括作家各个创作时期的作品,其中既有他的早期作品(作家的第一部小说《胎痣》),也有以后成熟时期的作品。这些作品排列起来,正好象一块块金砖玉石,铺下了肖洛霍夫在文坛上攀登的路。沿着这条路去寻觅作家成长的步履足迹,我们以为,对我国的广大文学青年,将不无借鉴意义。

这本小说中，有几篇已经译成中文，但由于作者本人在近年版本中又有所修改，加上对有的作品，中译者因对其思想倾向理解不同，翻译过程中在命题立意，遣词造句上亦表现出各不相同的色彩，因此，在这里对一部分已译过的小说又作了重译。

肖洛霍夫这个作家，对我国广大青年读者来说，可以说既熟悉又陌生，不少同志想了解他的情况。为此，我们写了《肖洛霍夫的生平与创作》附在后边，供读者参阅。

一九八四年

目 录

胎痣	[1]
放牛娃	[14]
粮食委员	[29]
希巴洛克的种	[36]
阿廖什卡的心	[43]
道路	[62]
“两个丈夫”	[116]
委屈	[139]
共同语言	[156]
学会仇恨	[164]
人的命运	[185]
附：肖洛霍夫的生平与创作	[225]

胎 痣^①

一

桌子上放着带有火药味的弹壳，还放着羊骨头、军用地图、战报，以及散发着马汗味的银饰笼头和一大块面包。所有这一切，都摊在桌上；骑兵连长背靠窗台，坐在一条砍制成的粗木长凳上，长凳紧挨着潮湿的墙壁，有些发了霉。连长那冻僵的手指间一动不动地夹着一支铅笔。一份陈旧的身份证摊放在桌上，旁边是一张填了一半的履历表。一张粗毛边纸上简明地写着：尼古拉·科舍沃伊，骑兵连连长，庄稼人，俄罗斯共青团员。

在“年龄”一栏里，他用铅笔慢吞吞地描出了“十八岁”三个字。

尼古拉的肩膀宽宽的，看上去比他实际的年龄要大。眼角上的一条条鱼尾纹，和他那象老头儿一样拱着的脊背，使他

① 《胎痣》是肖洛霍夫的第一篇小说。——译者

的容貌显得要老气一些。

“他本来还是一个毛头小子，乳臭未干的嫩芽芽呀，”在骑兵连里，人们经常这样开玩笑说：“可是，你能找到另一个人，不损一兵一卒，就消灭两个匪团，还在半年当中，带领骑兵连征战拚搏，毫不逊色于任何一个老指挥员的吗！？”

一提起十八岁，尼古拉就感到脸红。铅笔在讨厌的“年龄”栏里转来转去，迟迟难以下笔；面对这个栏目，他的面颊泛起懊丧的红晕。尼古拉的父亲是个哥萨克，按父系说，尼古拉也是一个哥萨克。他记得，当他五、六岁时，有一次仿佛还在睡梦中，就被父亲抱上了战马。

“抓住马鬃，乖儿子！”父亲大声叫唤着；母亲在厨房门里冲尼古拉笑着，可她脸色发白，两眼睁得大大的，盯着儿子爬在马背上的双腿，盯着手执缰绳的丈夫。

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后来父亲在对德战争中失踪，杳无音信，随后，母亲去世了。尼古拉从父亲那里承袭了对战马的酷爱，继承了他那勇敢无畏的气质，并且也象父亲一样，在左脚踝骨上方长着一块鸡蛋大的胎痣。十五岁以前，他到处打短工，后来讨得一件长长的军大衣，跟随路过村子的一团红军，去同弗兰格尔作战。这年夏天，尼古拉在顿河里游泳时，遇见一位军事委员。这个人歪着受过挫伤的脑袋，拍拍尼古拉有点驼背的、晒得黝黑的脊梁，结结巴巴地说：

“你可是太……太……你太幸……幸运啦！是啊，是幸运的！据说，这胎痣是幸运的标记。”

尼古拉龇着雪白的牙齿，一个猛子扎到水里去，然后钻出水面，一边呼哧，一边嚷道：

“你是瞎叨叨，真怪！我从小没爹没娘，一辈子拚死拚活，给

人当短工，哪里来的运气！……”

他一口气游上了环抱顿河的一片金黄色的沙滩。

二

尼古拉住的小屋坐落在顿河岸边。从窗口可以眺望浪花拍溅的奥布多尼耶和湛蓝湛蓝的河面。夜晚，浪涛撞击着陡峭的河岸，百叶窗发出郁闷的响声，尼古拉仿佛觉着，水在不断上涨，并且从地板缝里悄悄地钻进来，摇撼着小茅屋。

他本想换个住处，但始终没有搬成，一直拖到秋天。一个霜冻的早晨，尼古拉走到台阶上，他的响亮的皮靴声划破了清晨的寂静。他走进樱桃园，躺在挂满银色露珠的草地上。在这里，听得见女房东在棚子里与母牛的唠叨细语，她劝导牲口安静下来，牛犊却执拗而低沉地哞哞叫唤；奶流冲到铁桶壁上，发出响声。

院子的篱笆门吱地响了一声，狗狂叫起来。传来了排长的声音：

“连长在家吗？”

尼古拉支着两肘，欠起身来。

“我在这里！喂，有什么事？”

“信差从村里来了。据说，一伙匪徒从萨尔斯克区窜犯出来，占领了格鲁申国营农场……”

“把他带到这里来。”

信差牵着一匹浑身上下冒着热汗的马，向马厩走来。走到院子当中，马打了一个前失摔倒了，然后侧卧下来，断断续续发出短促的嘶声，接着就断气了，两只玻璃球似的眼睛直瞪着那条用铁链拴着的、凶恶狂吠的狗。马被这样累死，是因为信差带着一封画有三个十字的公文，一口气疾驰了八十多里的缘故。

尼古拉看了来函，原来是主席请他带领骑兵连前往援救。他走进屋里，佩上马刀，疲惫地思索着：“本想找个地方学习学习，可是这里的匪徒又闹腾起来了……军事委员取笑我，说什么‘你连字都写得错误百出，还当什么连长呢……’可我连教堂附设小学都没毕业啊？他真是个怪人……这里闹匪……又要流血了，这种生活真叫我难受……一切都让人厌烦……”

他走到台阶上，一边走一边往卡宾枪里上着子弹，可是他的思绪却象上路的马，奔驰起来：

“要是到城里去……学习学习就好了……”

他从断了气的马旁边走过，向马厩走去。看见从塞满尘土的马鼻中流出的一滩滩黑血，便转过了脸。

三

在高低不平、布满土墩的路旁，沿着被风吹得光光的车辙，深灰色的车前草卷曲着，滨藜之类的野草葱茏茂密，一片兴旺。不时有人沿着这条路把干草运往一座座打谷场，这些打谷场象琥珀色的珠子，镶嵌在草原上。山岗上铺展着一条平坦的大道；道旁的电线杆一直延伸着，跨过凹地和山谷，消失在秋天的、乳白色的雾霭之中。一个匪首带着一群约有五十来人的匪徒，沿着电线杆的走向，从光溜溜的大道上开过来。这是一伙仇视苏维埃政权的顿河和库班哥萨克。他们象一只窥伺羊群的狼，时而在大路上，时而而无路的荒野里，奔走了三天三夜；尼古拉·科舍沃伊的队伍，紧盯着他们，追踪在后面。

这伙匪徒都是些坏透了的家伙，一群兵痞和老奸巨猾的东西。他们的首领更是狡狴得很，在行进中总是瞻前顾后，不断在马镫上微微欠起身来，放眼搜索着草原上的动静，同时也计算着到达

顿河对岸树林的里程。

他们就是这样，象恶狼一样东奔西逃着；尼古拉·科舍沃伊的骑兵连踏着他们的脚印，尾随在后面。

夏日的顿河草原，晴朗无云。在高远的天穹下，钟声清脆嘹亮，麦穗摇曳不停。这是收割前的时节。颗粒饱满的黑麦穗上的麦芒，好象十七、八岁小伙子的胡须，已经发黑；大麦一个劲儿地往上窜，象是要赶过人头。

长着大胡子的哥萨克，在沙质的粘土地上，在村旁的沙丘上，在一切可耕地上，都种着大麦。大麦历来长势不好，很久以来就是一俄亩^①收不到三十俄斗^②。可是，人们仍旧播种它，因为用大麦可以酿出比姑娘们的眼泪还要清冽的酒来；因为自古以来都是这么干的，祖祖辈辈都要喝它。在顿河军区的徽章上，画着一个酩酊大醉的赤体哥萨克坐在酒桶上，想必不是没有道理的。一到秋天，村镇里到处游荡着醉醺醺的人们，红柳篱笆上随处晃动着醉汉的红顶毛皮高帽。

正是这个缘故，就是在大白天，匪首也往往不是很清醒的。这样一来，所有的马车夫和机枪手就都醉醺醺地倒卧在辎重车上了。

匪首整整七年没看见过故乡的农舍了。他当过德国人的俘虏，后来到了弗兰格尔的军队中。他沐浴过君士坦丁堡^③的阳光，蹲过扎着铁丝网的集中营，驾驶过土耳其的小帆船，钻过库班和土耳其的芦苇丛，最后加入了匪帮。

这就是这个匪首的经历。正象酷暑时节，牛蹄在草原泽畔留下的干脚印一样，他的心也变得又干又硬了。一种奇怪的、不可

① 一俄亩等于1.09公顷。——译者

② 一俄斗等于16.38公斤。——译者

③ 现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旧称。——译者

名状的痛苦折磨着他，使他肌肉酸疼，疲惫不堪。他觉得，不能忘却过去的痛苦，任凭什么样的酒，也不能把他灌得头脑发热，忘乎所以。可是那天，他一喝，却喝得有点醉意了。这是因为，在顿河草原上，在太阳下翻耕过的黑土地上，大麦正在扬花吐穗，正散发着香甜浓郁的气息；这时在村镇里，面孔黝黑的扎尔梅尔克人都在忙着酿酒，这酒与潺潺流动的泉水一样清冽诱人。

四

黎明时，出现了最早的霜冻。睡莲的阔叶上，银光闪闪。一大早，卢基奇看见水磨轮上的薄冰，好象云母片，五光十色。

从清早起，卢基奇就觉着有点不舒服：腰酸腿痛，双脚象灌铅似的，粘在地上抬不起来。他在磨坊里拖着脚步沙沙作响，吃力地移动着怪模怪样的身躯，动作迟迟缓缓的。从碾米机下钻出一窝小耗子来，抬起泪汪汪的眼睛朝上看了看：一只鸽子在顶棚的横梁上，咕咕叫个不停。老头用他那仿佛是泥土捏成的鼻子，长长地吸了一口气，闻到一股粘腻而潮湿的霉烂味和水磨上的大麦的香味。他仔细地听着，水流仿佛不大通畅似地，一边喘息，一边冲击和拍打着木桩，于是，他沉思地来回搓动着他那一根根象粗麻线似的大胡须。

卢基奇在养蜂场躺下来，想歇息一会儿，却侧身盖着一件皮袄睡着了；嘴大张着，嘴角的胡须上流着口水，粘乎乎地直冒热气。黄昏给老头儿的小屋浓浓地抹了一层颜色，磨坊笼罩在一团团乳白色的暮霭里……

卢基奇醒来时，两个骑马的人正从树林里奔驰而来。其中一个朝正在蜂场内走动的老头儿大声喊叫：

“老头儿，到这儿来！”

卢基奇疑虑地望了望，站住了。在这种动乱的年头，这种身带武器的人他见过的多了，他们往往连个招呼都不打，就把饲料和面粉统统拿走。对所有这些军人打扮的人，他无须分辨，一概不予理睬。

“快点，老家伙！”

卢基奇从板式蜂箱中间走过去，变了色的嘴唇含糊不清地低声嘟哝着。他在离这些不速之客老远的地方就站住了，斜眼注视着他们。

“我们是红军，老头儿……你不用怕我们，”匪首和颜悦色地说道。“我们正在追赶一伙匪徒，与自己人走散了……或许，你见过昨天有一队人从这里走过吧？”

“好象是有过什么人。”

“老爷爷，他们往哪里去了？”

“鬼晓得他们往哪里去了！”

“他们没有人留在你的磨房里吗？”

“没有。”卢基奇简短地回答，说着就转过身去。

“等一等，老头儿。”匪首从马鞍上跳下来，醉醺醺地摇晃着他那双罗圈腿，喷着满口酒气说道：“老头子，我们在歼灭共产党……就这么回事！至于我们是什么人，这不是你能明白的事！”他绊了一下，缰绳从手中滑落下来。“你要做的事情是，给备办七十匹马吃的饲料，不准声张出去……你得马上办到！……明白了吗？你的粮食藏在哪里？”

“没有。”卢基奇回答说，眼睛瞧着旁边。

“那这个粮仓里是什么？”

“破烂，各种各样的破烂……就是没有粮食！”

“好吧，去看看！”

匪首一把揪住老头儿的衣领，把他拖到侧歪着陷入地下的粮仓跟前。打开仓门，里面有小麦和黑灰色的大麦。

“你说这是什么，难道不是粮食吗？老混蛋！”

“粮食，是活命的东西呀……这是磨粮食得来的……我一年才积攒这么一点粮食，可你要让马来糟踏……”

“照你说，让我们的马都饿死不成？你这是要干什么，站在红军一边，想找死吗？”

“行行好吧，可怜可怜我！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呢？”卢基奇摘下帽子，跪下，拉过匪首毛茸茸的双手，亲吻起来……

“你说，你是不是喜欢红军？”

“宽恕吧，好心的！……原谅我说话糊涂，唉，宽恕吧，请不要处罚我。”老头儿抱着匪首的双腿，大声哭诉起来。

“对上帝发誓，说你不拥护红军……你要是不划十字，那就吃口土吧！……”

老头儿用没牙的嘴嚼了一杯沙子，泪水淋湿了他的前襟。

“得了，现在我相信了。起来吧，老家伙！”

看着老头儿麻木的两腿站不起来，匪首哈哈大笑。那些骑马的不速之客，从粮囤里弄出了大麦和小麦，倾倒在马蹄下，把整个院子铺满了一层金黄色的麦粒。

五

黎明时升起了雾，湿漉漉阴沉沉的。

卢基奇为绕过哨兵，没走大道，沿着只有他一个人晓得的林间小路，越过小山沟，穿过在凌晨的睡梦中保持警觉的树林，快步向村里走去。

走到风磨前，他本想经过侧巷拐到小街上去，可是眼前突然出现了一些轮廓模糊的骑兵。

“谁在走动？”寂静中一声惊慌的喊声。

“是我……”卢基奇低声应答着，浑身软绵绵的，战栗起来。

“什么人？口令？为什么闲逛？”

“我是磨坊主……得了本地的水肿病，需要到村里去一趟。”

“这是什么需要？好吧，那就到连长那里去一趟！前面走……”
一个人骑在马上，嚷道。

卢基奇感觉到从马嘴里喷出来的热气直往脖子上冲，他一瘸一拐地，用碎步向村里快速地走去。

他们来到一座小瓦房旁边，在广场上停下来。押送兵呼呼哧哧地从马鞍上跳下，把马拴在栅栏上，叮叮当当地碰响着马刀，走上了台阶。

“跟我走！……”

窗里亮着灯光。他们走了进去。

卢基奇被烟草味呛得咳了几声，他脱下帽子，急急忙忙向上座画着十字。

“抓住个老头儿，他想摸进村去。”

尼古拉从桌上抬起乱蓬蓬的脑袋，用充满睡意的但却严厉的声调问道：

“到哪里去了？”

卢基奇向前跨了一步，高兴得屏住了气。

“亲爱的，是自己人，我以为又碰上敌人了呢……很难为情，我是怕盘问，我是磨坊主。你们穿过米特罗欣树林到我那里去过，我还用牛奶招待过你呢，好汉，你喝了……难道想不起来了吗？……”

“喂，你说什么？”

“亲爱的，我是说：昨天天黑时，我那里来了一伙匪徒，他们让马白白地糟踏我的粮食！……他们还折磨我……他们的头目说：‘你给我们起誓，与我们一条心，’后来还强迫我吃了一口泥土。”

“那他们现在在哪儿？”

“还在那个地方。他们这些魔鬼，随身带着伏特加^①，正在我的小屋里酗酒。我跑到这里来是向你们报告，或许，你们能管教管教这些家伙。”

“命令备鞍！……”尼古拉从长凳上欠起身来，对老头笑了笑，疲倦地抓起大衣袖子。

六

天亮了。

尼古拉因彻夜未眠，脸色有些发青，他向一辆载着机枪的两轮马车奔驰而去。

“象我们一样进攻，从右翼追上去。咱们必须压住他们的侧翼！”

他又向拉成散兵线的骑兵连跑去。

在大路上，一簇干枯的小橡树后面，出现了一队骑兵，四人一排，中间是一辆机枪车。

“快跑！”尼古拉大喊一声，只听见身后得得的马蹄声越来越响，于是，他扬鞭抽了一下自己的那匹牡马。

林边响起了致命的机枪声，大路上的那些人好象操练一样，迅速地拉开了散兵线。

从山岗上被暴风刮倒的一片树林里，跳出一只沾满草屑的

① 一种俄国酒。——译者

狼。它低下前伸的脑袋，侧耳倾听着。不远处呼呼响着枪声，各种嘶叫声此起彼伏，响成一片。

嗒一！一颗子弹落到赤杨树丛中，在山岗后面，在耕地那边，迅速地响起了回声：哒一！

一次又一次地响着：嗒一嗒一嗒——！……山岗后面总是回答：哒——哒——哒！……

那只狼不慌不忙地站了一会儿，大摇大摆地钻进荒芜的田野，向虽已发黄但尚未割净的欧莞丛中走去……

“沉住气！……别叫车翻了！……拉进小树林……小树林，他娘的！”匪首站在马镫上吼叫着。

车夫和机枪手在机枪车旁砍着挽索，忙成一团，可是，被连续的机枪火力射断的锁链，却在不可遏止的溃逃中，给紧紧套在一起了。

匪首刚掉转马头，望见一个人挥着马刀，象插着翅膀一样，朝他飞驰而来。他举起挂在胸前的双筒望远镜，望见那人身披毡斗篷，看得出，来者不是一个普通的红军战士，于是他勒紧了缰绳。他远远看见，那是一张没有胡子的年轻人的脸，被愤怒胀得扭歪着，由于风吹，两眼眯成了一条线。匪首骑的马踟蹰不前，直打后坐；他从腰间宽皮带里拔出毛瑟枪，狂吼道：

“黄口狗崽！……你来呀，你敢来，我一刀劈了你！……”

匪首向越来越近的毡斗篷开了一枪。尼古拉的马跑出四、五丈远，~~并不栽倒了。~~他甩掉斗篷，一边射击，一边向匪首逼过去，越来越近，越来越近……

在小树林后边，~~有人~~象野兽似地嗥叫了几声，接着便无声息了。太阳躲进了团团乌云，随后，在草原上、道路上，在秋风掠过的树林里，投下一个个飘忽不定的阴影。

“这匹没有调教好的野马，暴躁的黄口小儿，这下死神可要把你召去啦。”这些念头断断续续地浮现在匪首的脑海里。他等那人把子弹打光以后，撒开缰绳，象鹰一样飞扑过去。

匪首从马鞍上探过身来，一马刀砍下去，顿时觉得，刀下的躯体软作一团，顺从地滚到了地上。他跳下马，从被砍者身上摘下望远镜，看了一眼那双微微颤抖的脚，环顾了一眼四周，便蹲下来，从死者脚上脱那双鞣革皮靴。他用一条腿抵住咯吱作响的膝盖，迅捷地脱下了一只。另一只，因为与长袜子粘在一块，脱不下来。他恶狠狠地骂着，连袜子带靴一起从脚上拽了下来。他看见，在踝骨上方有一块鸽蛋大的胎痣。仿佛怕惊醒死者似地，他慢慢地将正在变凉的死者的脑袋脸朝上翻转过来，这样一转，从死者嘴里缓缓流出一大滩血，沾满了他的双手。他端详再三，这才笨手笨脚地抱住死者那凸凹不平的双肩，声音喑哑地哭诉起来：

“儿哪！……尼古卢什卡^①！……我的亲人！……我的亲骨肉……”

他脸色发青，大喊大叫道：

“你哪怕说句话也好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他凝视着那渐渐暗淡下去的眼神，那淌满鲜血的面颊，微微欠起身来，摇晃了一下无力的、瘫软的身子，终于倒下去了……可是，尼古拉却紧咬住发青的舌尖，仿佛怕说出什么重大的事情来似的……

匪首将儿子冰凉的双手拉向胸前，吻着，然后用牙咬住湿漉漉的毛瑟枪，朝自己的嘴扣动了扳机……

① 尼古拉的小名和昵称。——译者

当小树林后面出现骑兵时，已经黄昏了。晚风送来嘈杂的人声、马的响鼻声和马镫的碰撞声，一只白兀鹫不乐意地从匪首蓬乱的头上飞起。它飞开了，消失在灰暗的、淡无色泽的秋空之中。

(1924年)

放 牛 娃

一

热风从被太阳晒焦的棕褐色的草原，从龟裂的白色的盐沼地，从东方刮来，刮了整整十六个夜晚。

土地被晒焦了，青草一片枯黄，稠密地散布在道路两旁的水井干涸了；还没有抽穗的庄稼，萎靡不振，象驼背老头一样，低低地垂向地面。

晌午，在困倦的村子里，响起了一阵“铛铛”的钟声。

天气炎热。鸦雀无声。只有在篱笆旁，响着沙沙的脚步声，扬起不少尘土，还有老人们用拐杖探路，敲在土坎上的响声。

村里打钟开会了。议程是讨论雇牧人的事。

执委会里人声鼎沸，烟雾腾腾。

主席用铅笔头敲了敲桌子，说道：

“公民们，老牧人不愿意再看管牲口啦，他嫌工钱太少。我们执委会提议让弗罗洛夫·格里戈里来干。他土生土长，

没有父母，又是共青团员……大家都知道，他父亲生前是个鞋匠。如今他跟妹妹一起过日子，连口饭吃也没有。公民们，我想你们只要设身处地想一想，就会同意雇他来看牲口的。”

涅斯捷罗夫老头子忍不住了，从座位上跳起，扭动着屁股说道：

“这个我们可不同意……牲口都挺壮实，怎么能叫他来放牧呢！……再说，附近没有草，得把牲口赶到远处去放，他干不了的。到秋天牛犊会少掉一半……”

磨坊主伊格纳特是个很难对付的老头子，他阴阳怪气地说：

“看牲口的人嘛，不用执委会，我们也能雇到，这完全是我们的事……应当找一个老成可靠，会疼牲口的人……”

“说得对，老大爷……”

“公民们，要是雇个老头儿，牛犊很快就会被他弄丢的……眼前时势不同，到处发生偷盗……”主席用坚决而期待的口气说。后面立即有人附合他：

“老的不中用，大家得注意，这不是母牛，都是些才满周岁的牛犊。要有狗一样的快腿才行。牛群一跑散，就得往一块轰，要是叫老头子去追，还不得丢了他的老命……”

一片哄笑声。可是伊格纳特老头子还在后面嘀嘀咕咕：

“这不干共产党的事……如今需要的是祈祷，不是别的什么……”老家伙摸摸秃脑袋。

这时，主席厉声厉色地说道：

“公民，请你不要胡来……再这样下去，我要叫你退出会场……”

天一亮，炊烟象一团团肮脏的棉絮，从烟囱里滚滚升起，低低

地铺展在广场上空。格里戈里集中了一百五十头牛，穿过村子，向一座灰蒙蒙的萧索的小山赶去。

草原上到处是一个个隆起的褐色的土拨鼠洞。土拨鼠拖长声音警觉地发出“吱吱”声。草原鸨从低矮的、杂草丛生的荒地里腾空而起，银白色的羽毛闪闪发光。

牛群很安静。小牛分叉的蹄蹄，象细小的雨点嘀嘀嗒嗒地敲打着龟裂的地面。

格里戈里的妹妹杜尼娅在他身旁大步走着，帮哥哥打下手。她那晒得黝黑的雀斑脸在欢笑，浑身上下都在笑。复活节时，她刚度过第十七个春天。人处在十七岁的年华上，总感到什么都是可笑的：无论是哥哥的愁眉苦脸，还是一边走一边倒沫的大耳朵小牛犊，甚至连第二天他们便没面包吃这种事，她也觉得好笑。

格里戈里可没有笑。在褪色的便帽下，他的额头高高突起，上面布满了皱纹，一双眼睛倦怠无光，仿佛他早已超过十九岁。

牲口三五成群，安静地在路边走着。

格里戈里向落在后面的小牛吹了一声口哨，转身对杜尼娅说：

“杜尼娅，咱们挣够秋天吃的粮食，就到城里去。我进工农速成中学，给你也找个工作……或者也去学点什么……杜尼娅，城里书可多啦，吃的面包也干净，没有草，不象咱们这里”。

“可是上哪儿弄钱呀……不是得坐车吗？”

“你这傻丫头……村里要给咱们二十普特^①粮食，这就是钱呀……咱们每普特卖一卢布，再卖点小米，干粪。”

格里戈里在路当中站住了，用鞭子在灰土上画着，计算着。

① 一普特等于16.38公斤。——译者

“格里沙^①，咱们眼前吃什么呀？面包一点儿也没有了……”

“我口袋里还有一块干面包。”

“今天吃了，那明天咋办呢？”

“明天有人打村里来，会带面来的，主席答应过了……”

正午的太阳热辣辣的。格里戈里身上那件象麻袋一样的直筒子衬衫，被汗湿透了，贴在肩胛骨上。

牛群躁乱不安地走着，牛虻和蝇子螫着小牛。在热烘烘的空气里，回荡着牲口的哞哞声和牛虻的嗡嗡声。

傍晚日落前，他们把牲口赶到牛圈前。附近有一个水塘和一个被雨水沤烂的草棚。

格里戈里小跑着追过牛群。他吃力地跑到牛圈跟前，打开树枝编成的小门。

他清点着小牛，一头一头地放进四四方方的黑门里。

二

在水塘后面，在那犹如又大又圆的豌豆一样隆起的小岗上，一座新棚子盖成了。村里人用牲口粪给抹的墙，格里戈里用茅草盖了顶。

第二天，主席骑马来了，带着半普特玉米面和一袋小米。

他在荫凉地方坐下点着了烟。

“你真是个好小伙子，格里戈里。你先照看着牲口，秋天我带你到区里去。那边也许会有办法让你学习……我有个熟人在那边教育局里，请他帮个忙……”

格里戈里高兴得脸都红了。送主席走的时候，给他抓住马镫，

^① 格里沙系格里戈里的小名。——译者

又紧紧地握了握他的手。格里戈里长久地注视着马蹄踢起的一圈圈尘土。

中午的草原热得喘不过气来，到处一边干枯，几株独活草红得好象肺病病人的面颊。格里戈里仰躺着，凝视着抹上一层淡青色的小丘。他仿佛觉得草原是一个活的生命，在数不清的大小村落和城镇的重压下，她是多么吃力呀。他又仿佛觉得，土地在时断时续的喘息中动荡，而在下面，在厚厚的岩层下，还有另一个不可知的生命在跳跃，在奔腾。

于是，在光天化日之下，他也有些害怕了。

他用目光打量着一排排数不清的丘陵，眺望着流动的雾霭，又看看在褐色草地上斑斑点点散布着的牛群，觉得自己好象一个无需照看的世外人，与世界隔得远远的。

星期六晚上，格里戈里将牛群赶进牛圈。杜尼娅在草棚旁生着了火，用小米和香喷喷的栗子熬着粥。

格里戈里挨着火堆坐下来，用鞭子挑着臭哄哄的干粪，说道：

“葛利沙家里的牛犊病了，得去向主人说说……”

“那就让我到村里去一趟吧？……”杜尼娅提议道，尽力装出无所谓的样子。

“不用了，牛群我一个人照看不过来……”他笑了笑说，“是不是闷得慌，啊？”

“是闷得慌，格里沙，好哥哥……咱们在草原上住了个把月，只见过一次人。要是在这里过一个夏天，怕连话都不会说了……”

“忍着点吧，杜尼娅……秋天咱们到城里去，等学成了再回来。咱们要按科学道理种地。要不然咱们这里的人就没文化，都睡大觉……不识字……没有书……”

“人家不会收咱们上学的，再说咱们也不识字……”

“不，会收的。冬天我去镇上，在支部书记那里看过列宁的书。书上说，政权归无产阶级所有。关于学习也写着：穷人都应该学习。”

格里戈里跪起来，火苗的红铜色的反光在他面颊上跳动。

“要管好咱们的共和国，咱们就得学习。在城里，工人掌握政权，可是咱们镇上的主席还是富农，各村的主席也都是一些有钱人……”

“格里戈里，我哪怕擦地板，……洗衣服，能挣钱，让你上学也好……”

干粪燃得红红的，冒着烟，不时窜起火苗。草原上睡意朦胧，万籁无声。

三

支部书记波利托夫委托到区里去的民警转告格里戈里，要他到镇上去一趟。

天亮前，格里戈里就动身了。到午饭时分，他从山岗上便望见钟楼和一座座盖着干草和铁皮的小房。

他拖着磨起茧子的双脚，来到广场上。

俱乐部安在牧师家里。他沿着新铺成的散发着鲜干草味的小路，走进一间宽敞的屋子。

百叶窗关着，屋里很暗。波利托夫在窗旁拿着刨子，做窗框。

“老弟，我听说了，听说了……”他伸出汗津津的手，笑着说：“嗯，一点办法也没有！我问过区里，听说榨油厂要人，可是一招募，就比原计划多了十二人……你眼下先看着牲口，到秋天我们再送你去学习。”

“哪怕在这里干活也好……村里的富农都不愿要我放牛……他们说，我是共青团员，不信上帝，放牛不做祷告……”格里戈里

疲惫地笑着说。

波利托夫用袖子拂掉刨花，在窗台上坐下来，皱起出汗的眉头注视着格里戈里。

“格里戈里，你瘦了……吃喝怎么样？”

“有吃的。”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

“喂，到我家去吧。我有新近的书报给你，从区里寄来的。”

他们沿着通向基地的街上走着，几只母鸡卧在灰堆里打滚，井架上不知什么地方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此外，只有寂静的耳鸣声。

“你今天留下吧。要开个会。朋友们都很惦记你：‘格里戈里在哪里呀，他怎么样了？’你可以看看他们……我今天要做个国际形势报告……你在我这儿过夜，明天再走，好吗？”

“我可在这儿过不了夜。杜尼娅一个人看不了牲口。我去开会，会一结束，就得连夜赶回去。”

波利托夫家的门道里很凉爽。

干苹果散发着甜腻腻的香气，墙上挂的轭和皮马套发出马汗的臭味。

杓儿里放着一桶克瓦斯^①，旁边是一张歪歪斜斜的床。

“这就是我的住处：小屋里很热……”

波利托夫弯下腰去，小心翼翼地从小布床单下抽出几张很旧的《真理报》和两本小册子。

他把书报塞在格里戈里的手里，又张开一个打着补丁的口袋说：

① 一种用面包和水果发酵制成的清凉饮料。——译者

“拿住……”

格里戈里抓住口袋头，俯下眼睛匆匆看着报上的字。

波利托夫用手一捧一捧地装着面粉，装了多半袋，摇了摇，又跑进正屋里去。

他拿来两块猪油，用一片发黄的白菜叶子包起来，放进口袋里，悄声说：

“你回家去，把这个带上！”

“我不带……”格里戈里脸红了。

“怎么不带？”

“就是不带……”

“你怎么啦，混蛋！”波利托夫气得脸色发白，两眼盯着格里戈里大嚷。“这还算同志吗？你快饿死了，却连声也不吭。带去，要不咱们的交情算完了……”

“我不愿拿走你最后这点……”

“谁对你说是最后的，”波利托夫看见格里戈里生气地扎住口袋，口气也就软了下来。

会议在天亮前结束了。

格里戈里在草原上走着。肩膀被面口袋压得酸痛，脚也磨出了血，可他还是迎着光芒万丈的朝霞，精神焕发地大踏步向前走去。

四

黎明，杜尼娅从棚里走出，拾干粪生火。格里戈里慌慌忙忙跑出牛栏。她猜准是发生什么倒霉事了。

“出了什么事？”

“格里沙的牛犊死了……还病了三头牲口。”他换了一口气说：

“杜尼娅，你去一下村里，叫格里沙他们立刻就来……就说，牲口得病了。”

杜尼娅匆匆地戴上头巾。她背着从小岗后面爬上来的太阳，翻过山岗，大步流星地向村里走去。

格里戈里送走她以后，慢慢腾腾地往牛栏走去。

牛群到山谷里去了，篱笆旁躺着三头小牛。到中午，三头小牛全都死了。

格里戈里从牛群那儿赶回牛栏，发现又病倒了两头……

一头牛倒在水塘边的淤泥里，向格里戈里转过头来，“哞—哞—”地拉长声叫着，一对饱含泪水的凸出的眼睛无神地张望着。看着这情景，格里戈里那晒成青铜色的面颊上，也流下了咸乎乎的眼泪。

太阳落山时，杜尼娅领着主人回来了……

阿尔捷梅奇大爷用手杖捅了捅一动不动的小牛，说道：

“是牛瘟，这个病啊……眼看整群牛都要倒下了。”

他们剥掉牛皮，在水塘附近埋了死牛，又用干燥的黑土堆成了一个新的土包。

第二天，一下子又病了七头小牛，杜尼娅又沿着大路向村里走去……

一串串黑影过去了，牛栏空了起来。格里戈里的心也变得空荡荡的。一百五十头牲口只剩了五十头。主人们坐着大车来，剥掉死牛皮，在山谷中挖了一些浅坑，用土盖住血淋淋的牛尸，就离去了。牛群无可奈何地回到牛栏里；小牛们闻到血腥气和感觉到无形地游荡在它们中间的死神，凄凉而悲惨地叫了起来。

每天一到天亮，面色枯黄的格里戈里，就打开嘎吱嘎吱作响的牛栏门，把牛群赶出去放牧，这时总要穿过那些泥土新干的坟

丘。

腐尸烂肉散发着臭味；狂狂癫癫的牲口扬起一条条尘幕，凄苦无助地哞哞叫着；太阳热辣辣的，在草原上空慢腾腾地移动着。

从村里来了几个猎人。他们在牛栏四周开枪放炮，要把凶险的瘟神从牛栏里赶跑。但是，牛犊仍然在死亡，牛群一天天变得稀落了。

格里戈里发现有几个坟丘被扒开了；不远的地方还丢下了一些啃光的骨头。夜里，牛群烦躁不安，变得惊恐了起来。

一连几夜，总有一阵狂野的吼叫声在寂静中突然爆发出来，接着牛群便闯断篱笆，在牛栏里乱窜。

小牛冲倒篱笆，成群地拥到草棚跟前。它们卧在火堆旁边，喘着粗气，反刍着草料。

格里戈里一直弄不清牛群为什么这样骚动，直到一天夜里狗汪汪叫醒了他，才找到了原因。他一边走，一边穿上短皮袄，窜出草棚。小牛把被露水淋湿的脊背转过来，直往他身上蹭。

他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向狗吹了几声口哨，可是，回答他的，却是毒蛇谷那边传来的一阵阴森嘈杂的狼嚎。在半山腰的荆棘丛里，还有一只发出低沉的吼声应和着……

格里戈里走进棚里，把油灯点得亮亮的。

“杜尼娅听见了吗？”

天一亮，各种各样的叫声，同天上的星星一起消失了。

五

一天早晨，磨坊主伊格纳特和涅斯捷罗夫骑着马来了。他们走进草棚，格里戈里正在补靴子。伊格纳特老头子摘掉帽子，斜射

在棚子泥地上的阳光照得他眯缝着眼睛。他举起一只手，正要向角落里的列宁像画十字，可是，举手之间仔细一瞧，又连忙把手缩回背后，恶狠狠地啐了一口唾沫。

“哦……连个神像也没有吗？”

“没有……”

“这是谁在神位上挂着呀？”

“列宁”。

“无怪我们倒霉了……没了上帝，来了瘟神……就因为这个害得小牛都一个个倒了……哎呀呀，上帝啊，我们的主啊……”

“老大爷，因为没有请兽医，小牛才死的。”

“先前也没有你说的什么兽医，还不是照样过活……你的学问太大了……只要你在肮脏的脑门上多画几个十字，就不需要什么兽医。”

涅斯捷罗夫把眼珠骨碌碌一转，嚷道：

“从神位上把这妖孽扯掉！……就因为你，因为你这不敬神的家伙，牲口都死了。”

格里戈里气得脸色发白。

“你到家里耍威风去吧……别胡言乱语……这是无产阶级的领袖……”

涅斯捷罗夫也发火了，脸胀得通红，喝道：

“你给我们干活，就得按我们的话办……我们看透了你们这些家伙了……当心点，要不，马上来收拾你。”

两人把帽子往额头上一拉，连个招呼也不打，扬长而去。

杜尼娅被吓楞了，两眼呆呆地看着哥哥。

又过了一天，铁匠吉洪从村里来看他的小牛。

他蹲在草棚边，吸着烟卷，咧着嘴笑着说：

“我们的日子可恶透了……原来的主席让撤了职，眼下是涅斯捷罗夫的女婿掌权。嗨，又念起了老经……昨天分地了；只要穷人一分到好地，就得重分。有钱人又骑到我们背上来了……格里戈里，他们把好地都抢了去，只剩下些砂土地给我们了……瞧，就是这么个曲儿……”

格里戈里在火堆边一直坐到半夜，用炭灰在黄褐色的巴掌大的玉米叶上写下了一行行歪歪斜斜的字。他写了这样的意思：土地分得不合理，牲口病了不去请兽医，却叫猎人来放枪驱邪。他把一叠写满字的干玉米叶子交给铁匠说：

“有机会到区里去一趟，你打听打听，《红色真理报》在哪儿出版。你就把这个交给他们……我都写清楚了，只是你千万别揉。不然，会把炭揉掉的……”

铁匠用烟熏火燎的黑手，小心翼翼地接过哗哗作响的叶片，揣到怀里。他在告别时，笑眯眯地说：

“我一定要到区里一趟，或许能在那里找得到苏维埃政府……三百里路，三天三夜就能赶到了。一星期后我来给你回话……”

六

阴沉沉的秋天，总是下雨。

一大早，杜尼娅就回村里拿吃的东西去了。

格里戈里在山脚下放着小牛。他披着上衣，跟在牛群后边，从路旁摘下野花，若有所思地在手掌里搓着它那枯萎的花冠。在这短促的秋天的黄昏，两个骑马的人从山岗山走了下来。

马蹄“嗒嗒”地响着，飞驰到了格里戈里跟前。

格里戈里认出来了，一个是主席，涅斯捷罗夫的女婿；另一个

是磨坊主伊格纳特的儿子。

两匹马浑身湿漉漉的。

“放牛的，你好啊！……”

“你们好！……”

“我们来找你的……”

主席在马上探过身子来，用冻僵的手解了一阵子大衣扣子，然后掏出来一张发黄的报纸。他在风里展开报纸。

“这是你写的吗？”

在格里戈里眼前，报纸上的字迹跳动起来：关于分地和牲口倒毙的话语，原来都是根据他写在玉米叶上的刊登出来的。

“喂，跟我们走！”

“到哪儿去？”

“到这儿来，到山谷里去……咱们得谈一谈……”主席发育的嘴唇抽搐着，两眼骨溜溜转动，流露出不耐烦的样子。

格里戈里笑了笑说：

“就在这儿说吧。”

“你要是愿意的话……也可以在这儿说……”

他从口袋里掏出那干式手枪……勒住挣扎着脑袋的马，声音嘶哑地说：

“毒蛇，你还向报纸告状吗？”

“你这是为什么？”

“为的是你要我吃官司！你还胡说八道吗？……你说，共产小杂种！……”

他没等回答，就对格里戈里缄默不语的嘴巴开了一枪。

格里戈里哼了两声，倒在竖立起来的马蹄下，痉挛的手指揪了一撮褐红色的湿草，就安静下来了……

磨坊主伊格纳特的儿子跳下马，抓起一把黑土，塞进了冒着血泡的嘴里。

草原辽阔无边，谁也测量不出来。草原上有许许多多大路和小径。秋夜一团漆黑，可雨又把马蹄的痕迹冲洗得干干净净……

七

黄昏。下着毛毛细雨。一条通向草原的大道。

人们要是在背囊里装着一大块大麦面包，手里拿着一根拐杖，走起路来是不会感到艰难的。

杜尼娅顺道走着。风扯着破上衣的下摆，一阵阵地推着她的后背。

四周的草原灰蒙蒙的，一片荒凉。天色黑了下来。

在离大路不远的地方，出现了一座山岗，山岗上有一个用野草搭成的棚子。

杜尼娅象喝醉一样东倒西歪地走到棚子跟前，一头趴在塌陷的坟上。

夜……

杜尼娅走在那条通往火车站的大道上。

她走得不太吃力，因为她的背囊里有一大块大麦面包，还有一本散发着草原上苦尘土味的破书，以及哥哥格里戈里的一件粗布衬衫。

每当止不住心头的悲痛时，每当眼泪从眼眶里流出时，她就远远地躲开人们的视线，从背囊里掏出那件没有洗过的粗布衬衫来……就这样一动不动地呆上好一阵。

路标一个个向后退去。狼的嗥叫从草原的峡谷里传来，表示着对生活的愤怒。可是杜尼娅沿着大道大踏步地走着，向有苏维埃政府的城里走去，在那里，无产阶级都在学习，这是为了在将来获得管理共和国的本领。

在列宁的书里就是这样说的。

(1925年)

粮食委员

一

一位州粮食委员来到了区里。

他抽动着刮得发青的嘴唇，心急火燎地说：

“根据统计材料，您主管的那个区要征集十五万普特粮食。博佳金同志，因为您是一位精力充沛、有进取心的干部，我任命您为粮食委员。我是信任您的。限期一个月……革命法庭就在这几天里来到。军队和中央需要粮食，就象这个样子……”他用手掌在长有硬毛的尖尖的喉结上比划了一下，接着咬牙切齿地说：“对存心窝藏的，就枪毙！……”

说完，点了点他那剃得光秃秃的脑袋，就离开了。

二

电线杆象蹦蹦跳跳的麻雀一样绕过全区，传送着电话：开展征粮工作。

各个村镇里，哥萨克的庄稼人把肚子上华丽的宽腰带使劲地一勒，一点也不犹豫，就一下子拿定主意：

“把粮食白白地交出吗？……不给……”

不论在场院里，还是在街道上，凡是被认为保险的地方，夜里都挖了许许多多的大坑，成十上百普特籽粒饱满的小麦被埋了起来。大家都清楚，左邻右舍的粮食藏在何处，是怎么藏的。

大家都缄默不语……

博佳金带着征粮队在区里巡查。马车轮子下的雪在吱吱作响，一道道银装素裹的篱笆向后闪去。傍黑。这个村镇也象所有村镇一样，平平常常，但它对博佳金来说，却倍感亲切。这是他的故乡呵。阔别六年了，故乡还没有变老。

曾经发生过这么回事：在炎热的七月里，有一天，田埂上盛开着黄色泡沫状的野菊，人们都在收割庄稼。当时才十四岁的伊格纳特·博佳金，正跟父亲和长工一起割麦子。因为长工折断了草叉上的一个齿，父亲打了长工一拳，伊格纳特向父亲直走过去，咬着牙说：

“你混蛋，爸爸……”

“我？！”

“你……”

父亲一拳把伊格纳特打倒在地，又用马肚带把他抽得遍体鳞伤。晚上从地里回来，父亲到花园里砍下一条樱桃枝，削光了，抚着胡子，把它塞到伊格纳特手里：

“走吧，小子，要饭去，等你变得聪明些，再回来！”说着嘿嘿地冷笑了一声。

就这么一回事。眼下，马车打蒙霜的篱笆旁轱辘驶过，茅草屋顶和油漆的百叶窗向后奔去。博佳金看了看父亲菜园子里的那

几棵白杨，还有那只站在屋顶上张开翅膀、无声啼叫着的铁皮公鸡，感到喉咙里堵住了点什么，堵得简直喘不上气来。晚上，他向房东打听：

“博佳金老头还健在吗？”

房东正在修理马具，用沾满树脂的手指往麻绳里搓着猪鬃。他眯缝着眼睛回答道：

“越来越阔了……娶了个小媳妇，老婆子早死了，儿子没影儿了，可他，老家伙，还一个劲地去找人家兵士的老婆……”

接着，他改成严肃的腔调，补充说：

“掌柜的还不错，很精明……您认识他吗？”

第二天早晨吃早饭的时候，巡回革命法庭主席说：

“昨天在会有两个富农进行煽动，不叫哥萨克缴粮食……在搜查时，他们又进行抗拒，还打死了两个红军战士。今天，我们要开个宣判大会，把他们处决……”

三

法庭主席，过去的一个箍桶匠，站在民众文娱馆低矮的台子上，就象把一个新的桶圈箍在木桶上一样，声音响亮地宣布：

“枪毙！……”

两个人被押出门外……博佳金认出，后面那一个是他的父亲。两边棕黄色的大胡子已经灰白。他目送着那被太阳晒黑的满是皱纹的脖子，随后跟了出去。

他在台阶上对卫队长说：

“你把那个老头叫到我这儿来。”

老头子垂头丧气地拱着背走过来，他一认出儿子，眼里闪出

炽烈的光，接着又熄灭了。他把眼睛躲在象两道黑麦穗一样的粗眉下，说：

“跟红党在一起吗，小子？”

“是跟他们在一起，爸爸。”

“呸——……”父亲把眼光转到一边。

沉默了一会儿。

“爸爸，六年没见了，没啥话要说吗？”

老头凶狠而又顽固地皱紧鼻梁：

“没啥可说的……咱们走的不是一条道儿。我该当枪毙，就因为我为了我的财产，为了不让别人动一动我的粮食，我这就是反革命；可你们，搜索人家的粮食，难道就合法吗？你们抢吧，你们手里有枪。”

在粮食委员博佳金瘦削的颧骨上，皮肤一阵发青，一阵发白。

“对穷人，我们是不抢的。可是，我们要铲除那些靠别人的血汗发财的家伙。你吸了一辈子雇农的血，吸得最凶！”

“我自己没日没夜地干活。可不象你东游西逛！”

“干活的人都同情工农政权，可你却拿棍棒对待它……不让人家走近你的篱笆……为了这个，你就该死！……”

老头子呼哧呼哧的喘息声，嘎然停止了。仿佛维系着他们两人的那条细线到此扯断了，他用嘶哑的嗓子说：

“你不是我的儿子，我也不是你的老子。你对老子说这种话，该天打五雷轰，畜牲……”他啐了一口唾沫，默默地走开。接着忽然回过头来，用不加掩饰的挑衅口气喊道：“哼，伊格纳特！……走着瞧，你妈的！哥萨克们会从霍普尔河那边赶来把你们的政府打垮的。如果圣母保佑，我要不死，就亲手把你的心肝掏出来……”

晚上，在村外的风磨跟前，在埋葬死牲口的土坑旁边聚集着一群人。卫队长捷斯连科敲了敲烟斗，简短地说：

“站到沟边去……”

博佳金看了看那辆把路旁淡紫色的雪地划成一块块的雪橇，
喑哑地说：

“甬生气，爸爸……”

他等待着回答。

一片寂静。

“一……二……三！……”

站在风磨后面的马向后奔去，雪橇在坎坷不平的道路上令人胆战心惊地摇晃着。融化了的蓝色雪地上，远远望见一副油漆的车轮，摇摇拽拽晃动了好一阵子。

四

电线杆象蹦蹦跳跳的麻雀一样绕过全区，传送电话：霍普尔河一带发生了暴动。执委会被烧毁。一部分干部被杀，一部分逃跑。

征粮队回到了区里。只有博佳金和法庭卫队长捷斯连科在村里停留了一昼夜。他们匆忙把最后几车粮食送到了收集站。一早就刮起了暴风雪。狂风呼啸，雪尘漫天，整个村子都没入了白色的雪的世界。傍晚，约有二十来个骑马的人向广场驰来。在雪堆累累的村子的上空，突然响起了一阵报警声。马声嘶鸣，狗吠四起，钟声颤抖而嘶哑……

暴动了。

两个骑马的人催马踹镫，努力越过山上一个光秃秃的塌陷的

墓冢。山下的桥上响起了一阵马蹄声，驰来一群骑马的人。前面那个戴军官高筒皮帽的人，向长腿骏马抽了一鞭子。

“共产党跑不了啦！……”

搭拉着胡子的乌克兰人捷斯连科，翻过墓冢，用缰绳打了一下吉尔吉斯种马。

“他们追不上的！”

捷斯连科和博佳金让马稍为喘息了一会儿，因为他们知道，山岭一直延伸有六十来里长。

追来的人在后面撒开了散兵线。夜弯腰拱背地从西方地平线上探出头来。在离村子六里左右的峡谷里，博佳金在乱蓬蓬的雪堆里发现有一个人。他策马奔过去，沙哑地喊道：

“什么鬼东西坐在这儿啊？”

一个小男孩脸色铁青，晃动了一下身子。博佳金挥鞭策马，马挣扎着脑袋，蹦跳着跑到跟前来。

“你想冻死吗，小鬼？怎么到这儿来的？”

他跳下马，弯下腰去，听到含糊不清的低语声：

“叔叔，我快要冻死了……我是一个孤儿……靠要饭过活。”他冻得直发抖，把一件撕破的女上衣蒙到头上，不吭声了。

博佳金默默地解开短大衣，用衣襟裹住瘦弱的小身体，好一阵才骑上那匹调皮的马。

马又跑了起来。那小孩把身子偎在短大衣下，暖和了过来。他紧紧地抓住皮带。两匹马都明显地减低了速度，呼呼地喘着粗气，断断续续地嘶叫着，感觉到后面的马蹄声越来越近了。

捷斯连科抓住博佳金的马鬃，透过刺骨的寒风，大声叫道：

“扔下小家伙！你不觉得他是个累赘？快扔下，不然我们会被抓住的！……”他用鞭子抽着博佳金发紫的手，破口大骂。“他们追

上来，会把咱们剥成肉酱的！……让你跟这小家伙一同给大火烧死吧！……”

两匹吐着白沫的马并驾齐驱了。捷斯连科把博佳金的两手抽得鲜血直流。博佳金却用冻僵的手紧紧抱住那弱小的身体，把缰绳缠在鞍桥上，伸手掏出那干式手枪。

“我可不能抛下孩子，他会冻死的！……老杂种，你再纠缠，我就打死你。”

“跑不脱啦！完蛋啦！……”

博佳金的手指已经冻得不听使唤了，牙齿咬得咯咯直响，他用皮带把孩子拦腰捆在马鞍上。他又试了试，看看捆结实了没有，然后笑着说：

“小家伙，抓住鬃毛！”

捷斯连科用刀鞘拍了一下汗淋淋的马屁股，接着把两个手指伸进胡子下边的嘴巴里，象强盗一样吹了一声尖利的口哨。他们长时间地目送着那两匹马轻快地跑向远方。然后，紧挨着卧倒，用单调而清脆的排射声，迎击那些从小山后面露出的高筒皮帽。

他们的尸体躺了三个昼夜。捷斯连科穿着肮脏的粗棉布衬裤，面朝天躺着，脸上凝结着从嘴里流出来的含着气泡的血块，从他的嘴巴到耳朵都被劈开了。在博佳金赤裸裸的胸脯上，有几只草原上的鹰鹭肆无忌惮地跳来跳去，它们从撕开的肚子和挖空的眼窝里不慌不忙地啄食着黑芒大麦。

(1925年)

希巴洛克的种

“你戴着眼镜，是个读过书的女人，可却不能理解这个……让我把他往哪儿送呢？……”

“我们队伍驻扎的地方，离这里八十来里路，我是双手抱着他走来的。我脚上的皮都磨破了，你没看见吗？你既然是这个儿童保育院的院长，那就得收下这个孩子！你说没有空位子？那我该送他到哪儿去呢？跟他在一起，我受够了。吃尽了苦头……真的，这是我的儿子，我的种……去年生下了他，可他没有娘呀。关于他娘，有一个特别的故事。没什么，我也可以讲给你听听。前年，我在剿匪部队里干事。当时，我们在顿河上游的几个村子里，追剿伊格纳季耶夫匪帮。我是个机枪手。有一次，我们从一个村子出发，周围的草原光秃秃的，连棵树也没有，天又偏偏热得要命。我们翻过一个山岗，向山下的小树林进发，我坐在机枪车上打前锋。忽然发现，好象有个女人躺在附近的小山丘上。我催马向她驰去。

果真是个女人，面朝天躺着，衣裙的下摆擦到头顶上。我跳下车去一看，是个活的，还在喘气……我把马刀插进她的牙缝里，撬开嘴巴，拿水壶灌进了一点水，她才清醒过来。这时，队里又有几个哥萨克策马跑来，向她盘问道：

“‘你算什么人？为什么这样不知羞耻，躺在大路边？……’

“她有气无力地哭诉着，象是个快要死的人。我们好不容易才弄清楚，原来是这么回事：阿斯特拉罕附近的一伙匪帮，抓她当向导，到这里强奸了她，然后把她扔到了半路上……我对哥萨克们说：

“‘弟兄们，她被匪徒糟踏啦，让我把她抬上车吧。

“这时全队吵吵嚷嚷起来：

“希巴洛克，把她抬上车吧！娘儿们是贱骨头，可不容易死呢，等她身体养好些，再瞧着办吧！’

“你以为怎么样？我虽说并不爱闻娘儿们的裙子边，但却很可怜她，我自讨苦吃，把她带走了。过了一段时间，她也就习惯了，有时给哥萨克们洗洗破衣服，有时给哪个人补补马裤，从娘儿们的份上照顾着全队的人。可是，在军队里留着个女人，我们总觉得有些丢人。队长也恶声恶气地骂道：

“‘抓住那娼妇的尾巴，叫她滚开！’

“我可实在太舍不得她走，但是，也只得对她说：

“‘达里娅，你趁早快点离开这儿吧，不然，子弹可会找上门来的，那时，你哭也来不及啦……’

“她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大嚷大叫地说：

“‘亲爱的哥萨克们，你们就地枪毙我吧，要不，我可离不开你们！’

“不久，我的马车夫牺牲了，她就给我出了这样一个难题：

“‘让我给你当马车夫行吗？不是吹，我对付马，决不会比别人差……’

“我就把缰绳递给了她，对她说：

“打起仗来，你要是不能麻俐地掉转车头，那你就躺在大路中央等死吧。你不死，我横竖也会用鞭子抽死你！’

“她赶车的本领，所有的哥萨克无不叫好。虽说她是个女人家，可使唤马的本事，比有的哥萨克还高一手。往往在阵地上，她来个急掉车，连马都直立起来。越往后，事情就越来越多了……我开始跟她有了关系。嗯，结果她怀孕了。娘儿们为我们男人吃的苦可真不算少。就这样，我们追剿匪帮，追了八个来月。队里的哥萨克尖嘴利舌地说：

“‘瞧啊，希巴洛克，你那个马车夫让公家饭养得可真胖啊，连车座都快装不下啦！’

“有一次，我们落到了这般境地：弹药光了，供应也中断了。匪徒们在村子的一头，我们在另一头。我们对村民们严守机密，不叫他们知道我们的弹药用光了。可是叛徒把我们给出卖了。半夜时分，我在哨所里听到，地面隆隆震响。原来敌人在村外撒开散兵线，企图包抄我们。很明显，他们发起了有恃无恐的进攻，甚至敢于对我们大声喧嚷：

“‘投诚吧，红色的哥萨克，没有子弹的弟兄们，要不，就叫你们统统完蛋啦！……’

“嗨，说着就追了上来……他们紧紧尾追着我们，逼得我们只好在小山上同他们较量一番，看谁的马跑得更快。天亮的时候，我们在离村子三十来里的树林里聚集起来，只剩下不到一半的人。有的逃跑了，有的被砍死了。我狼狈极了：没有落脚之地，可这时候达里娅又偏偏病了。她在马上跑了一夜，脸色发黑，神

色全变了。我看到她跟我们忙活了一阵后，就独自离开宿营地，向树林深处走去。我明白是怎么回事，就紧跟在她后面。她走进一条山沟，那里有一片被暴风刮倒的树木。接着，她找到一个地沟，就象母狼一样，扒拢一堆树叶，她呻吟着，开始分娩。我一动不动地坐在灌木丛后面，透过树枝缝望着她……听见她哎哟哎哟地哼 哼着，接着就叫喊起来，泪水沿两腮淌着，脸色铁青，眼睛凸起，全身用力，痉挛得身子都扭曲了。这种事可不是哥萨克干的，但是我看到，要是她生不下孩子来，一定会死的……于是，我从灌木丛后面跳出来，跑到她面前。我知道，需要给她帮忙，就弯下身去，挽起袖子。可是我紧张极了，浑身上下都被汗水打透了。我杀过人，从没有害怕过，这下子可不知如何是好了。我在她身边瞎忙了一阵子，她不再叫喊了，却忽然让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地问：

“‘亚沙，我们没有弹药，你知道是谁报告给匪徒的吗？’说完，又是那么一本正经地看着我。

“‘是谁？’我问她。

“‘是我。’

“‘什么，你个傻瓜，魔鬼附身了吧？现在可不是唠叨的时候，躺着别吭声！……’

“可她还是说她的：

“‘我死已临头啦，亚沙，在你面前我是有罪的……你还不知道，你在怀里养了一条什么样的毒蛇啊……’

“‘哼，你有罪，’我说，‘见你的鬼去吧！’

“于是，她把事情一五一十地都坦白了出来。她一边讲，一边拿自己的脑袋撞着地面。

“她说：‘到匪帮那儿去，我是自愿入伙的，并且与他们的头

子伊格纳季耶夫有过关系……去年，他们把我派到你们队伍里来，是为了让我随时给他们送情报。当时，为遮人耳目，我假装被人强奸了……现在我要死了，要不，我会把你们的全队人马统统消灭掉的……’

“听了这话，我的肺都要气炸了。我忍不住，一靴子向她踢去，踢得她满嘴巴鲜血直流。这时候，她的阵痛又发作了。接着，我就看见了一个婴儿……浑身湿漉漉的，呱呱地哭着，如同狐狸嘴里的一只小兔子……这时候，达里娅又哭又笑，向我脚边爬来，极力想抱住我的双膝……我转过身来，扔下她，向部队跑去。到了队里，我给哥萨克兄弟们讲了事情的全部经过……

“大家听了，都火冒三丈，起初要杀我，后来对我说：

“‘希巴洛克，当初是你可怜她，现在还得你去除掉她，连同那个刚生下来的孽种，要不，我们就象切白菜那样砍掉你……’

“我跪下来央求说：

“‘弟兄们，我一定去杀死她，这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出于良心，是替那些因她叛变而掉了脑袋的弟兄们和同志们雪恨。不过，我求你们可怜可怜那孩子吧。在他身上，我和那女匪各有一半。他是我的种，叫他活下来吧。你们大伙都有老婆孩子，可我除了他以外，没有任何亲人……’

“我一面央求大家，一面吻着地面。大伙终于可怜起我来，说道：

“‘嗯，那好吧！希巴洛克，留下你这颗种，让他长大成人吧，可得要他象你这样，做一个勇敢的机枪手。可是，你一定要把那婊子干掉！’

“我向达里娅跑去，她已收拾停当，坐在那里，手里抱着孩子。

“我对她说：

“‘我不准你给孩子喂奶。他既然出生在苦难的年头，就甭尝母亲的奶汁了。还有，达里娅，因为你是我们苏维埃政权的敌人，我得杀死你。背冲山沟站着！……’

“‘亚沙，孩子怎么办？是你的骨肉呀。你杀死我，他没有奶会饿死的。等我把他奶大，你再杀我，我也甘心情愿……’

“‘不，’我对她说，‘队里给我下了一道死命令，我不能留你一条活命。对孩子，你不用操心，我用马奶也能把他喂大，不会叫他饿死的’。

“我退后两步，取下步枪，她一下抱住了我的双腿，吻着靴子……

“完事之后，我转身走去，连头都没回。我的双手颤抖，两腿发软，抱着那光溜溜、滑腻腻的婴孩，直从手里往下滑……

“五天以后，我们又回到了原来那个地方。在谷地树林的上空，盘旋着一大群老鸦……我带着这个孩子，吃尽了苦头。

“‘抓住他的双脚，往车轮上一扔完事！你何苦为他受这份罪啊？希巴洛克。’一些哥萨克不断对我这样说。

“可我对这小家伙疼得要命。心想：‘让他长大成人吧。要是老子被人家打死了，儿子就能起来保卫苏维埃政权。大家会记住我雅科夫·希巴洛克的，我也不会象一根野草那样死去，我将留下后代……’你信吗，善良的女公民，当初我还为他哭过几次，尽管我以前从没有掉过眼泪。在队里，一匹母马生了马驹，我们把那马驹打死，用马奶来喂孩子。开头，他不会吸橡皮奶嘴，常常急得直哭，后来习惯了，吸奶嘴也不比别的孩子吸他妈妈的奶头差什么。

“我用自己的衬裤给他改缝了一件衬衫。现在他长大了些，不

过没什么，还能凑合着穿……

“这样，你现在该明白了吧：我能送他到哪儿去呢？你说他太小吗？可他挺乖，也会嚼东西了……求求你把他收下吧！你接受了？……那可太感谢了，女公民！……我吗，一旦打垮福明匪帮，就立即赶回来看他。

“再见吧，小乖乖，希巴洛克的种！……快快长大吧……哎哟，狗崽子！你干吗老揪爸爸的胡子啊？难道不是我看养你的吗？难道我没有给你揩屎擦尿吗？你怎么跟我打架了？哎，咱们就要离别了，让我亲亲你的小脑瓜吧……

“请您不必担心，好心肠的女公民，您以为他会哭吗？不——不会！……他有点象我们布尔什维克的样子，不瞒您说，咬人是会咬的，可泪却从他眼里挤不出来！……

(1925年)

阿廖什卡的心

一连两个夏天，干旱把农民的土地烧得净光，到处一片焦黑。一连两个夏天，酷烈的东风从吉尔吉斯草原上吹来，把庄稼的红褐色的发丝吹得颤抖着，刮干了农民们注视着枯槁的草原的双眼，刮干了农民们并不轻易流出的苦涩的眼泪。饿神跨着大步，留下了斑斑痕迹，阿廖什卡把它想象为一个高大的、没有眼睛的巨人：它不择道路地行走着，搜索着大大小小的村庄，把人们掐死。眼巴巴地，它就要用它那一双无情的手，致命地钳住阿廖什卡的这颗心了。

阿廖什卡长着一个大大的、下垂的肚皮，双腿浮肿着……只要拿手指触动一下他那紫黑色的小腿肚，就会首先出现一个发白的小窝儿，然后在小窝儿上慢慢，慢慢地鼓起一些小水泡来，而在手指触过的地方，就会长时间地渗出浑浊的脓血。

阿廖什卡的耳朵、鼻梁、颧骨和下巴，让皮肤包裹得紧

紧的，皮肤就象樱桃树的枯树皮似的。他的眼睛深陷着，仿佛是两个空眼窝。阿廖什卡今年十四岁了，他已经四五个月没有见过面包了。由于饥饿，阿廖什卡害着浮肿病。

清晨，盛开的锦鸡花在篱笆旁散发着蜜一样的甜滋滋的香味，蜜蜂在它黄色的花朵上如醉如痴地颠簸着；被露水洗涤一新的早晨，深浸在透明的寂静中。阿廖什卡被风吹打起精神来，勉强挣扎着走到沟渠边，呼呼哧哧地喘着气，爬了许久才爬过去。然后，在挂着露珠的篱笆旁坐下来。因为高兴，阿廖什卡的脑袋晕眩得有些惬意，心口窒闷得有些发痛。阿廖什卡这样高兴，是因为在他一动不动的紫黑色的腿边，躺着一匹还散发着热气的小马驹的尸体。

邻居的一匹母马怀了马驹，因为女主人没有照看好，让庄上的一头公牛在追逐中用尖角顶了母马的大肚子，这下子，母马就流产了。小马驹躺在篱笆旁边，带血的躯体还冒着气，温和和的；阿廖什卡坐在死马驹的旁边，用瘦骨嶙峋的手掌支撑着地面，他显得乐滋滋的，脸上漾着笑意……

阿廖什卡试了试，想把整个马驹搬起来，可是没有那么大力气。他回到家，拿了把刀子出来。正当他走到篱笆旁边，看见躺着小马驹的那个地方，几只狗挤在一堆撕打着，在满布尘土的地面上拽扯鲜红的马肉。“啊——”，阿廖什卡张着变了样的嘴，大叫了一声。他颠簸着身体，挥动刀子，向狗群跑去。他把剩到最后的一些肠肠肚肚之类的细碎之物，搜罗了一堆，拖拖拉拉地弄回了家。

傍晚，阿廖什卡那个黑眼睛的小妹妹，因为多吃了一些肉，被胀死了。

妈妈趴在地上，躺了好久，后来站起身，转向阿廖什卡，蠕动

着灰白的嘴唇说：

“抬住腿……”

他们把小姑娘抬了起来。阿廖什卡抓住两腿，母亲抱着毛发蓬乱的脑袋，抬到园子外边的沟渠里，稍微覆上了一些泥土。

第二天，阿廖什卡在胡同里缓慢地挪动着脚步，隔壁一个半大小子碰到他，一边挖着鼻孔，一边也斜着眼睛说：

“廖什，我们家的母马早产了一匹马驹，狗把它给吃了！……”

阿廖什卡倚在大门上，没有说话。

“狗也从沟里扒出了你们家的纽拉特卡，把她的内脏吃了……”

阿廖什卡扭转身去，一声不响地，连头也没回地走开了。

这个半大小子一边在腿上拍打出响声，一边冲他喊道：

“俺妈妈说，什么人不要神父，也不埋在墓地，这些人就要叫鬼拉到地狱！……听见了吗，廖什卡？”

过了一礼拜，阿廖什卡的牙床化脓了。每逢早晨，当他饿得难受，咀嚼着叶榆的多汁的树皮时，嘴里的牙齿就晃动起来，摇摆着，一阵阵痉挛便钳住了他的喉咙。

母亲已是第三个昼夜没有起床了，她用发哑的声音喊着阿廖什卡：

“廖尼亚……去一下，到园子里多揪些菌子来……”

阿廖什卡的腿象草杆一样，他疑虑地打量了一下两只腿，仰卧下来；由于嘴唇象撕裂一样疼痛，他拉长着话音说：

“妈呀，我走不到……风会把我撂倒的……”

这天，当富裕的女邻居——绰号叫玛卡尔奇哈的，到小河对岸菜园子里去锄草的时候，阿廖什卡的姐姐波利卡一边用眼睛盯着园子里闪闪飘动的黄头巾，一边从窗户钻进了她的农舍。波利卡搬来长凳，爬上炉灶，用手捞着土豆，喝了锅里的菜汤。因为喝得太难受，就脑袋靠着炉灶，脚放在长凳上，倒下睡着了。午饭前，玛卡尔奇哈回家来了，——这是一个身体结实，凶狠残暴的女人。她一看见波利卡，就尖叫起来，一手揪住蓬乱的头发，一手拿起一个铁熨斗，不哼不哈地往她头上、脸上、干瘪的胸脯上，一古脑儿打个不停。

阿廖什卡从他院子里望见，玛卡尔奇哈怎样小心地向四面望望，抓住波利卡的双脚，把她从台阶上拖了出去。裙子的下摆往上撩着，蒙在波利卡的头上，头发荡着院里的尘土，在地上拉出了一条血迹斑斑的道道。

透过篱笆的缝隙，阿廖什卡一眼没眨地望着，玛卡尔奇哈又怎样把波利卡扔进一眼早已坍塌的井里，匆匆忙忙地填上了土。

夜间，园子里散发着泥土的潮气、荨麻的花香和狗齿的醉醺醺的气息。沿着破旧的围墙，牛蒡昼夜守卫着一条小径。夜里，阿廖什卡来到园子里，久久地望着玛卡尔奇哈的院落，注视着她家的云母小窗和透过院内蓬乱的树叶洒落下来的细碎的月光。随后，他悄悄地走近玛卡尔奇哈家的大门。在仓房下，链子发出了哗啦啦的响声，拴着的那只公狗叫了起来。

“啧啧……塞柯……塞柯。”阿廖什卡咂着嘴唇，讨好地叫了几声，公狗便不作声了。

阿廖什卡没走篱笆门。他翻过篱笆，摸索着爬到了盖着杂草和树枝的地窖旁。他一边侧耳倾听着，一边铿锵地碰响了链子。

原来地窖没有上锁。阿廖什卡稍稍掀开些盖子，蜷缩着身体，沿梯子爬了下去。

阿廖什卡没有瞧见玛卡尔奇哈怎样从厨房中跳了出来。她撩起衣襟，一下子跳到院子中央的板车上，拔出了牵引环，——这是通向地窖的机关。她往地窖下探着蓬乱的头；阿廖什卡一边阖着模糊不清的眼睛，一边听着嘤嘤的心跳，连气也不喘地从罐里喝着牛奶。

“哎哟，是你，缺德了！你这是干什么呀，狗娘养的！……”

变得沉重的罐子，一下子从阿廖什卡冻得发僵的手中滑落下来，撞到梯子边上，一下碰了个粉碎。

玛卡尔奇哈圪蹴成一个团儿，跳进了地窖……

托着阿廖什卡的肩膀，轻轻地就把他抱了起来。她咬紧牙关，不声不响地走出小巷，从篱笆下穿过，走到溪边，把阿廖什卡枯瘦的躯体扔到了溪边的淤泥上。

第二天是三一节^①。玛卡尔奇哈家的地板上撒满了香薄荷和圣母草。从清晨起，她就给母牛挤了奶，把它赶到畜群中去。随后，取出节日的、带有图案的花披肩，披在身上，往阿廖什卡母亲这边走来。穿堂的门敞开着，从没有打扫的房间里送来一股死尸的气味。她走进屋去。阿廖什卡的母亲躺在床上，两腿蜷曲着，一只手放在眼睛上挡着亮光。玛卡尔奇哈恭恭敬敬地向薰黑的圣像画了个十字。

“你好吧，阿尼西莫夫娜！”

一片寂静。阿尼西莫夫娜的嘴巴歪斜着，张得大大的；苍蝇

^① 是每年夏季在耶稣复活节以后第五十天的一个节日。——译者

落满面颊，闷声闷气地在嘴巴里嗡嗡作响。玛卡尔奇哈迈到了床边。

“久安吧，亲爱的……我照直说吧，是来看看，你不是要卖掉房子吗？你知道，我的姑娘到出阁的年岁了，想把女婿接过门来……你睡着了，是吗？”

她触摸了一下对方的手，刺人的冰凉。“哎哟”一声，从死者身旁跑开了去；这时，门边正站立着阿廖什卡——他的脸色比白垩土还白。他抓着门框，浑身是血，还带着溪边的淤泥。

“我还活着，大婶……别打死我……我不啦！”

黄昏前，阿廖什卡象幽灵似地走过尘土飞扬的街道，穿过靠近教堂断破围墙的广场。靠学校附近，在几株阴郁的刺槐下，碰上了牧师。牧师从教堂出来，用口袋弓身背着馅饼和腌肉。阿廖什卡撇着嘴，用嘶哑的声音说了一声：

“看基督面上……”

“上帝保佑！”牧师拱背走过时，被长衣的下摆绊了个踉跄。

溪旁的砖棚和仓库里堆放着粮食。这个院子里有一座白铁皮顶的房子。这是顿河粮食委员会采购办公处三十二号。在砖棚的敞檐下是一个战地厨房，还停放着两辆弹药车。仓库旁边响着脚步声，还看得到枪上的刺刀尖在闪光。这是驻守在这里的警备队。

阿廖什卡等放哨的转过身去，一下子钻到了仓库下（还在早晨他就看清楚了，从一道缝隙里流出了一股黄灿灿的粮食）。他掬起一捧硬粮食籽，贪婪地咀嚼着。后面猛然一个声音，把他惊醒了过来：

“这是谁在这里？”

“我……”

“你是谁？”

“阿廖什卡……”

“喂，爬出来！……”

阿廖什卡惊慌地站了起来。他眯缝着眼睛，双手捂着脸，等待挨打。站了好大一会儿……后来，一个声音温和地说道：

“跟我走，阿廖什卡！我那儿有蒸熟的小麦。”

阿廖什卡这时才看清，这个人长着一个鹰钩鼻子，鼻子上架着一副不大透明的眼镜，面带笑容，全然没有生气的样子。“眼镜”象踩高跷一样，用长腿跨着步子；阿廖什卡蹒跚地、一颠一撞地紧紧跟在后面。在采购办公处走廊右边的第二道门上，挂着一个牌子：

“政治委员西尼岑在此！”

他们走进屋去。“眼镜”点燃油灯，宽宽地张开腿，坐在凳子上，把一只装着熟麦粒的沙锅和半瓶葵花子油，不声不响地塞到阿廖什卡面前。他瞧着阿廖什卡的颧骨在蠕动着，面颊上鼓起的肌肉一会儿这儿，一会儿那儿地跑动着。随后，他站起身来，收起了沙锅。阿廖什卡用长满疮疤的手抓住沙锅，颤抖着脑袋，哽咽起来。

“你舍不得，吝啬鬼？！”

“不是舍不得，你这傻脑瓜，撑坏了，会死的！”

第二天，刚一破晓，阿廖什卡就来到采购办公处的院子里。他坐在断破的门槛上，牙齿哒哒地碰撞着。他一直等到日出，那扇挂着“政治委员西尼岑在此！”的牌子的门，才吱扭一声打开，在门坎上出现了“眼镜”。

“眼镜”起来的时候，太阳已经移过砖棚子。他走出来站在门廊上，擤着鼻涕。

“你身上有臭味吧，阿廖什卡？”

“我饿得慌……”阿廖什卡嘟哝着，从下往上看“眼镜”。

“我们马上煮粥，可是……阿廖沙·波波维奇，你身上真的有臭味。”

阿廖什卡无拘无束地、一五一十地说：“玛卡尔奇哈把我打伤了，眼下天热，头上长了蛆……”

“眼镜”的脸色一下变得苍白起来，又问道：

“你身上有蛆？”

“在头上！……咬得很厉害……”

阿廖什卡从头上取下一把让血污腐熟的大麻。“眼镜”察看着阿廖什卡头上那个化脓的大伤口。白白的蛆虫在脓水中蠕动着尖尖的脑袋，看到这儿，他禁不住将身子转了过去，叹息了一声。

阿廖什卡胆子壮起来，说道：

“你给弄弄……用小棍儿把它们给抠出来，最好往窟窿里倒点火油……蛆虫碰到火油，会死吧？”

“眼镜”拿尖棍儿从伤口中往外拨弄着滑腻腻的蛆虫；阿廖什卡咧嘴尖叫着，两脚不停地乱动。从这时候起，他们两个建立起了友谊。阿廖什卡天天到采办处来磨蹭，饱吃一顿燕麦面。他狼吞虎咽地吞食着油脂，带着贪嘴的样子吃得很多。他总是惴惴不安地觉察到被一道关注的温存的目光打量着。

在一条侧巷后面，在一道簌簌作响的玉米秆的绿色屏障背后，各种谷类都谢了花。庄稼穗子鼓起来，被肥大的注满乳浆的

籽粒充得满满的。阿廖什卡天天路经庄稼地，赶着采办处的马匹到草原上去放牧。他也不用缰绳绊住马腿，就把它们撒入蒿草当中，或者放进灰白色的乱蓬蓬的茅草地里，自己走进庄稼地去。高大的庄稼棵子亲昵地偎依着，给腾出地盘；阿廖什卡小心翼翼地躺下来，尽量不压坏庄稼。他仰躺在地上，拿手掌把穗子搓碎，往嘴里填塞着，直到把绵软软香喷喷、充满着尚未变硬的白乳状物的籽粒，吃得再也吃不下去为止。

有一次，阿廖什卡将马赶到草原。他弯着腰，围着一匹爱踢人的烈马，来回走动了好半天，想从马鬃上揪下杂毛来，也把干结的疮痂从马皮上弄下来。母马龇咧着黑牙，暴怒地咆哮着。阿廖什卡敏捷地周旋着，一下子抓住了马的尾巴。这时候，一个人从后面嚷了起来：

“哎，阿廖什卡！……它会给你好瞧的呢。到我家给帮忙吧！？我包吃的。喂，我还给你打点一双象样的靴子。”

阿廖什卡放开马尾巴，环顾了一下四周。不远处站着庄上的小财主伊万·阿列克谢耶夫，他带着惯有的笑容望着阿廖什卡。

“你到工作干部那儿去说吗？我有吃的，当真，实实在在的……有奶，还有其它各种东西……”

阿廖什卡没加思索，很为能有工作和面包欢喜，就直愣愣地贸然说：

“我去，伊万·阿列克谢耶夫。”

“嗯，那你在傍晚就带着常用的东西来吧！”

伊万·阿列克谢耶夫说着离去了，他那褪色的衬衫在玉米中间忽隐忽现地闪动着。

阿廖什卡是光身子穿外衣——无亲无故，没有牵挂。家产只有一些基石。早在母亲去世时，就把农舍和栈房统统卖给邻居

了：农舍换了几捧面粉，牲口院换了一些黍米，玛卡尔奇哈用一小坛牛奶买了村边那块园地。阿廖什卡的财产，只有父亲的一件粗呢上衣和别人赠给母亲的一双毡靴。把马群从牧场赶回来，阿廖什卡就来到伊万·阿列克谢耶夫家的院子。在厨房旁边，女东家铺了厚帆布，全家席地而坐，在吃晚饭。阿廖什卡闻到一股扑鼻的煮羊肉味，他咽了一口唾沫，揉搓着便帽站在旁边，脑里闪出一个念头：“女东家能让坐下吃顿晚饭，该多好啊……”没料到，这个婆娘大发脾气，用破锅似的嗓子嚷叫起来：

“你瞧，把一个好吃懒做的给勾来了！他吃的比挣的还多。阿列克谢耶维奇，上帝保佑，送他走吧！现在可不需要！”

“住嘴，你这婆娘！放着改锥，只知道用钳子！”这是伊万·阿列克谢耶夫的声音，他边说边用袖子擦擦胡须。

话就在这儿了结了。

阿廖什卡并不是头一回干活儿。他很象父亲，对活路很严格，从七岁起，就赶牲口，掀起牛尾巴来了。

只过了两三天，就弄通了活路儿，同东家儿媳妇跑磨坊，到场院搭草垛，什么都干。住处被安置在板棚檐下。头一晚上，男东家就来到这里，打着洋葱味儿的难闻的隔，说道：

“你这个烂疮疤，要是在这儿抽烟，我可要亲手把你的脑袋给拧下来！绝对不许抽烟！”

“大叔啊，我可不干那种事！”

“嗯，你要小心！……”

东家走了，阿廖什卡不能入睡。第二天晚上，又是这样。田里的活儿把他累得手酸脚痛，背上的疮口象插着锥子，疼得不能成眠。第三天一早，他来到了采办处。“眼镜”在门廊里一边洗刷，一边哼哼咋咋地响着鼻嗤声。

“你失落到哪儿啦，阿列克谢？”

“给雇去干活儿了。”

“到谁那儿去了？”

“伊万·阿列克谢耶夫那儿，住在村边上。”

“喂，小兄弟，晚上来一下，咱们就这个聊聊天。”

傍晚，阿廖什卡给牲口饮了水，来到采办处。“眼镜”正在翻寻着书。

“你识字吗，阿列克谢？”

“在教堂附小念过书，给我登记上吧。”

“跟我走！”

他们沿着走廊向前走去。在一扇门的眉端用粉笔写着：“俄罗斯共青团俱乐部”。阿廖什卡认得出这几个字，但感到古怪，不太明白它的意思。“眼镜”走进去，阿廖什卡怯生生地跟在后边。房间里挂着几幅画像和一面褪了颜色的红旗，有一些面熟的孩子。他们都在认真地看着书，听见门的响声，瞥了一眼，又伏在桌上听讲课。阿廖什卡也注意地听着。讲的内容是，东家应当怎样雇用人和其他许多道理。阿廖什卡从俱乐部出来已是半夜了。他在槛楼的粗麻布片上翻来覆去，久久不能入睡。直到天亮，斜挂在天空的一钩弯月，还执拗地照着他的眼睑。

伊万·阿列克谢耶夫常对阿廖什卡说：

“你在我这儿可要当心，狗崽子，活儿到手上要麻利些！……只要我一瞄见你打马虎眼，就马上把你从院里轰走！……那就滚开，到外面饿死去！……”

阿廖什卡又割草又要打场，还得拾掇牲口。伊万·阿列克谢耶夫把双手往边上已经发毛的破腰带里一插，只知道洋洋自得地

在庭院里踱方步。

一次过节，邻居跟他打招呼道：

“你好啊，伊万·阿列克谢耶夫！”

“谢天谢地。”

“可别丧尽良心哪？”

“什么？”

“你干的可不叫人事儿啊……廖什卡整个儿给你执掌着大牲口……你要是把小伙子累坏了，可是罪过啊！……”

“老街坊，你积积自己的德行吧，甭净瞪着眼睛盯人家的后院。跟你说，把他妈的这一套收起来吧！……”他转身给邻居一个脊背，大模大样地、摇摇晃晃地迈步拐入棚子的一个旮旯儿。他把胡子咬在大黄板牙的牙缝里，妈妈地骂个不停，把对邻居的怨恨暂且埋到了心底。

从那时候起，他就向没有马匹的贫农邻居施展报复了：从他家的谷茬地里赶走了邻居的小牛，拴起来饿了两天两夜；往阿廖什卡身上加的活儿也越来越重，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事，就要狠狠毒打他一顿。

阿廖什卡本想去向“眼镜”诉诉苦，可是他怕伊万·阿列克谢耶夫晓得后把他撵走，也就不吱声了。在短促而闷热的夜晚，在闷热的棚檐下，他每每只能将伤心的眼泪往枕头上洒。在傍晚，他通常只要一把牲口从饮水处赶回来，就偷偷贴着篱笆，穿过打谷场，跑到俱乐部去。他天天在那儿碰到“眼镜”。“眼镜”常常是从不大透明的眼镜上沿瞧着阿廖什卡，笑眯眯地拍拍他的脊梁。礼拜天，阿廖什卡天一亮就到俱乐部来了。在一个大房间里，人很多，大家都拿着步枪。“眼镜”腰间系着一个带皮编带的手枪套，还有一个象瓶子模样的闪光发亮的玩艺儿。

看见阿廖什卡，他微笑着走过来。

“阿列克谢，一伙匪徒进了咱们区。他们只要一占领村镇，你就跑到这儿来守卫俱乐部！”

阿廖什卡本来想打听个究竟，但人很多，没有敢问。第二天早晨，阿廖什卡在给刈草机上油。他往厨房一瞧，东家正从门里出来。阿廖什卡心里愣了一下：东家眉头皱着，边走边揪着胡须，好象是出了什么烦心的事儿。阿廖什卡对东家有些畏惧，他惩罚人是很凶狠的。东家来到刈草机跟前，问他：

“小混蛋，你夜里常到哪儿去？”

阿廖什卡没作声。机油罐在他手里哆嗦起来。

“我问你：到哪儿去啦？！”

“俱乐部……”

“啊——俱乐部？你不尝尝这个，你妈的！”

东家的拳头满长着又粗又硬的黄毛，沉重得象秤砣一样。他向阿廖什卡的后脑勺只一拳，小伙子两脚一绊，就趴到了刈草机的叶片上，两眼直冒金花。

“你少闲逛去！……要不，滚你妈的蛋，别在这里放臭气！”东家往刈草机上套着马，大声嚷着：“非打发了他不可，他会同狗崽子们鬼混在一块的。日后一变天，非宰了你这个混蛋不行！……喂，你要再到那里去，我就给你记上账！……”

阿廖什卡心地憨厚，从来不计较别人的恩怨，从小就没有怨恨过什么人。以往，母亲常常对他说：

“哎哟，廖什卡，要是我死了，你也完了。连小鸡也会象粪一样把你搂走的！你这个样子长得象谁呀？你父亲因为机灵，让人家接收当了矿工……钉是钉，铆是铆……如今连小孩都能治服你，以后你一定逃不出被宰割的命……”

阿廖什卡这颗宽厚善良的心会怨恨东家吗，倘若他能给他一块面包？阿廖什卡站起身来，稍微喘了口气，东家又接着打起他来，为的是他摔倒在刈草机上，弄撒了油。阿廖什卡好容易盼到晚上，往粗麻布片里一躺，拿枕头蒙上了头……

天没亮，阿廖什卡就醒来了。胡同里嗒嗒嗒地响起了马蹄声，在大门口停息了下来。篱笆门上的铁环儿当啷响了一声。接着是脚步声和敲窗的声音。

“东家！……”悄悄的，声音很低。

阿廖什卡侧耳倾听着：门响了一声，伊万·阿列克谢耶夫走到台阶上，他们低声嘀咕了好大一会儿。

“给马加些料……”声音传到了棚檐下。

阿廖什卡欠起些头，看见两个穿军大衣的人把备好的马牵进院子，拴在台阶上。东家同其中一个人向打谷场方向走去。经过棚子时，向檐下望了望，低声问：

“你睡着了吗，阿廖什卡？”

阿廖什卡埋下头去，尽力用鼻子打出自然一些的鼾声，同时又稍稍抬起脑袋，静听着响动。

“一个小伙子住在我这儿……不大可靠……”

约摸过了五分钟，打谷场的篱笆门吱扭响了一声，东家抱进一大抱干草，后面跟着另一个人，铿啷铿啷地响着军刀，让军大衣的下摆一绊，打了一个趔趄。阿廖什卡听到一个人用沙哑的压得很低很低的嗓音说：

“他们有机枪吗？”

“哪里有！……只有两排红军驻在采办处的院里……就这些人……嗯，还有一个政治委员，几个过磅员……”

“明天半夜我们去跟客人接头……都在官林子里……要是给

他们个出其不意，就能斩了根……”

马在台阶附近嘶鸣起来，第二个穿军大衣的恶狠狠地喝道：
“去，该死的！……”

响起了打马的声音，接着是马啼声。

黎明前，在灰暗中，从伊万·阿列克谢耶夫家的院子里走出了两个骑马的人。他们沿着通向官林的道路飞奔而去。

早晨，阿廖什卡几乎没有吃饭，他坐着连眼也没抬。东家怀疑地斜了他一眼。

“你怎么不吃饭呢？”

“头疼。”

好不容易熬到吃过早饭。他偷偷地穿过打谷场，一下子跃过篱笆，奔到采办处。他一阵风似地冲进政治委员西尼岑的房间，砰一声关上了门，他站在门槛边，用手按着象打鼓一样嘤嘤狂跳着的心。

“你从哪里跑来的，阿廖什卡？”

阿廖什卡语无伦次地讲了夜间的来客，讲了他听到的片片断断的谈话。“眼镜”一字不落地仔细听着，然后站起来，向阿廖什卡亲切地点点头说：

“你在这儿坐一会……”说完，走了出去。

阿廖什卡在“眼镜”房里坐了约摸半个钟头。大黄蜂在窗上生气地嗡嗡地叫着，一束阳光在地板上颤动着。院里有说话的声音，阿廖什卡往窗外望了一眼。台阶上站着“眼镜”和两个红军战士，东家伊万·阿列克谢耶夫立在中问。胡子在他脸上颤抖着，嘴唇在不停地翕动：

“因有仇恨，说了你们的坏话……”

“我们就要知道这个！……”

阿廖什卡还没有看见“眼镜”这样严厉过：眉毛拧在鼻梁上，眼睛在镜片下闪着冷酷的光。他打开砖棚子上锁着的门，站在旁边，对伊万·阿列克谢耶夫厉声说道：

“进去！……”

阿廖什卡的东家弯着身子跨进棚子。门砰的一声把他关到了里面。

“你看，用这种办法一搞，三下五去二，枪筒子就缴出来了。瞧，这里装的是弹夹……”

步枪的枪栓在“眼镜”手里被弄得哗哗作响，他从眼镜上方瞧着阿廖什卡，露出了微笑。

晚上，村子漆黑，夜空犹如一滩凝固的焦油。在教堂围墙附近的广场上，红军士兵象链条一样撒开来，阿廖什卡和“眼镜”并排卧倒在地上。阿廖什卡的步枪上有一条香喷喷的皮带和一根被夜露打湿的潮润的枪柄……

半夜，在村边的墓地旁，有一只狗叫了起来，接着又有一只叫了起来。一阵细碎的马蹄声象波浪一样，一下子冲进他的耳鼓。“眼镜”跪起一条腿，把枪口瞄准街尽头，喊道：

“全体……开火！……”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在围墙后面激起的回声，象炒豆一样，哒哒哒地响了起来。

阿廖什卡推了一两下枪栓，弹出弹壳，又听到嘶哑的喊声：“全连开火！”

在大街的尽头，有骂声、枪声和马的嘶鸣声。阿廖什卡细听着，头顶上响着粘滞而沉闷的声音：“嗖一嗖！……”

过了一会儿，一颗子弹噗哧一声，打进了阿廖什卡脑袋上方一俄尺^①高的围墙上，砖屑四溅。街尽头有稀疏的射击的闪光，还有远去的乱成一片的马蹄声。“眼镜”弹簧似地一跳而起，喊道：“跟我冲啊……”

人们飞奔过去。阿廖什卡嘴里又干又苦，心好象要跳出胸膛。在街尽头，“眼镜”绊在一匹被打死的马上，摔倒了。同他并排跑上去的阿廖什卡，看见他们前面有两个人跳过篱笆，沿着院子在跑，接着砰地一声关上了门。门咣咣响了一声。

“那里有人！有两个人跑进屋里去了！……”阿廖什卡喊道。

“眼镜”跛着碰伤的脚，同阿廖什卡一齐冲了上来，把院子包围了。在墓地围墙后面，在潮湿的醋栗丛背后，红军战士沿着花园密密麻麻地卧倒在地上，蜷缩在一条沟渠中。起初，从房子中，从堵着枕头的窗户里射击着；在“砰砰”射击的间隙中，传出了嘶哑的谩骂声和上气不接下气的哭嚎，后来，全部沉寂了下来。

“眼镜”和阿廖什卡并排卧倒在地上。黎明前，潮润的黑暗笼罩着花园；这时候，“眼镜”头也不抬，大声喊道：

“哎，你们在这儿投降吧！要不，我们就扔炸弹了！”

从房屋里打了两枪。“眼镜”把手一挥：

“向窗子，开火！”

一阵乏味的、清晰的排射声。接二连三地射了几阵，逃进房里的那两个人，躲在厚土坯墙后面，轮番从一个窗口跑到另一个窗口稀稀落落地射击着。

“阿廖什卡，你比我个子矮，沿壕沟爬近棚子，往门里投手榴弹……要不然，我们无法很快抓住他们……你看，拉下这个导

① 一俄尺(旧俄长度单位)等于0.71米。——译者

火圈，马上就扔，慢了就炸死了！……”

“眼镜”从腰里解下那个很象瓶子模样的东西，交给了阿廖什卡。阿廖什卡弯下身，伏在潮湿的地面上，爬了过去：在壕沟上面，子弹嗖嗖地切断草茎，将冰凉的露水洒在他身上。爬到棚子附近，他揪下导火圈，对准门正要扔，可是门吱扭一声，颤动了一下，敞开了……两个人跨出了门槛；前面一个人手里托着一个约摸四岁左右的女孩，在黎明前的浅暗色中，粗麻布的白小褂显得清清楚楚；第二个人那条撕破的哥萨克灯笼裤上沾着血迹，他歪斜着脑袋，抓住门框站立在那里。

“我们投降！不要射击！你们会打死孩子的！”

阿廖什卡看见一个女人从房里破门而出，奔跑过来用身体挡住女孩，一边大喊着，一边把匪徒的双臂掰下来；阿廖什卡向后望了一眼，看见“眼镜”欠身跪起来，脸色蜡白，向四周扫视了一眼。

阿廖什卡懂得自己该怎样办。阿廖什卡的牙齿又稀又大，牙齿稀的人心肠就好。以前阿廖什卡的母亲常常这样说。他将身体伏在象瓶子一样闪光的手榴弹上，用双手捂着脸……

这时，“眼镜”向阿廖什卡飞奔过来，一脚把他踢开，嘴脸歪斜着；瞬息间抓起手榴弹掷到了一边。霎时间，花园的上空爆起一条火柱，阿廖什卡听到轰隆一声，也听到“眼镜”痛苦的喊叫声，他感到一种臭硫磺味的东西灼着他的胸脯，一团浓密的刺人的幕雾向他眼睛猛袭过来。

当阿廖什卡清醒过来时，他看见“眼镜”那张因彻夜不眠而变得苍白的脸俯在他的头上。

阿廖什卡试图欠起头来，但胸脯痛得厉害，他呻吟着，露出

了微笑。

“我活着……没有死……”

“你不会死，廖尼亚！……你现在绝不能死。这个，你瞧！……”

“眼镜”手里捏着一张带号码的卡片，他拿到阿廖什卡眼前，读着：

“俄罗斯共青团团员，波波夫·阿列克谢……明白了吗，阿廖什卡？……一块弹片炸到了离你心脏半俄寸远的地方……我们现在把你治愈了，让你的心脏为了工农政权再跳动起来。”

“眼镜”握着阿廖什卡的手，阿廖什卡在不大透明的、蒙着水汽的眼镜下面，看见两颗不大的晶莹的眼泪和一抹似笑非笑的颤抖着的微笑，——这是他从来没有看到过的。

(1925年)

道 路

第 一 部

一

格特曼大道沿着顿河在草原上伸展开来，一直通到海边。左边是微微倾斜的奥布东沙滩，一片蒸腾着雾霭的黄绿色的水草地，间或闪耀着无名湖泊的淡白色光点；右边是层岩叠嶂的山峦，山峦后面，在格特曼大道的烟灰色的镶边后面，在一连串低矮的象警戒哨似的山岗后面，散布着一条条河流，大大小小的哥萨克村镇，和一片灰色的乱蓬蓬的茅草的海洋。

今年秋天来得很早，草原一片枯黄，初来乍到的严寒一下猛袭了大地。

早晨，父亲在毡靴作坊翻拣着羊毛，对彼得说：

“喂，儿子，如今咱们的活儿可得加快点啦！冷天到了，

哥萨克女人正在梳羊毛，我们就得把袖子卷得高高的，弹起羊毛来，要不，会流大汗的！……”

父亲稍微抬起头来笑了笑，褪色的灰眼睛眯缝着，长满乱蓬蓬灰色硬毛的脸颊上，显露出一条条弯曲的黑色皱纹来。

彼得坐在桌子上装着鞋楦子；看见父亲疲劳的脸上失去了笑容，没有作声。

毡靴作坊里闷热得很，从倾斜的顶棚上向下有节奏地滴答着水珠，苍蝇在满是蝇屎的云母片小窗上爬来爬去。透过小窗，罩着一层白霜的篱笆、柳树和井上的吊水杠，仿佛是蒙在镀着一层褐绿色的朦胧的彩虹当中。彼得向院子里望了一眼，目光移到了父亲佝偻着的光脊梁上。他蠕动着嘴唇，数着一节节脊椎骨，久久凝视着，看见父亲两边的肩胛骨上下起伏，松弛的皮肤在背上结起一个个带皱折的疙瘩。

父亲的骨节粗大的手指以习惯的敏捷的动作，从羊毛里挑拣着牛蒡、荆棘和麦秸。他的头发蓬乱的脑袋和映在墙上的影子，和着手的动作，一摇一晃地来回摆动。冒着热气的羊毛，散发着刺鼻的腥臭味。汗粒象一颗颗小珠子似地，从彼得的脸上淌下来，潮润的头发垂到眼睛上。他在额头上擦了一把汗，把鞋楦头扔到了窗台上。

“爸爸，咱们吃饭吧？你看，日头都快当头了。”

“吃饭吗？等一等……你说说看，有多少牛蒡！……我趴着拣了整整一个钟头了。”

彼得从桌子上跳起来，向炉子里望了一眼，一股热气一下子冲到他那汗淋淋的面颊上。

“爸爸，我去打菜汤来吧。饿得要命，真想吃啦！……”

“嗯，去吧，活儿等一等再说。”

父子俩在桌边坐下来，也没穿汗衫；不慌不忙地大口大口地喝着素油烧的菜汤。

彼得斜视了父亲一眼，一边嚼着，一边说：

“你瘦了，好象是病把你折腾的。你不是在吃胖，而是在变瘦！……”

父亲动了动颧骨，笑嘻嘻地说：

“你真可笑！拿你自己跟爸爸比：我到圣母节^①，就是进入五十七岁的人了，可你还不满十八岁呢。年纪不饶人哪，不是病！……”他说着叹了口气。“要是你妈妈能在世看到你就好了……”

父子俩沉默了一阵，静听着苍蝇的嗡嗡声。狗在院子里狂叫了起来。隔窗传来了脚步声。门砰的一声开了，撞在浸羊毛的桶上，接着，铁匠西多尔倒退着身子进了土屋。他也不脱帽，往脚下吐了一口唾沫。

“你们可得把这只狗关关！真可恶，它不咬别的地方，偏要咬大腿上面的地方。”

“它知道你是来拿毡靴的，可还没做出来，所以挡你的驾了。”

“我不是来拿毡靴的。”

“要不是来拿毡靴的，那就过来坐坐，请坐在桶上吧，你是客人呀！”

“一辈子难得来做这么一趟客，就让人家往湿处坐！彼得鲁哈，你可不能象你老子这么坏！……”

西多尔从浓密的小胡子里发着吃吃的笑声，在门边蹲下来，用不易弯曲的手指卷了好一会儿烟卷。接着，一边吧嗒着嘴抽起

① 圣母节在旧俄历十月初一。——译者

来，一边咕噜着说道：

“你一点也不知道吧，福马大爷？”

父亲卷起羊毛往口袋塞着，摇头笑了笑，但看见西多尔眼睛里射出俏皮的高兴的火花，便警觉了起来。

“怎么回事？”

西多尔的面庞被一层薄薄的烟幕缭绕着，他的嘴唇笑得象兔子似地瑟缩着，眼睛在浅色的眉毛下轱辘轱辘转动着，快乐而又带着些警觉。

“红军打过来了，到顿河对岸了。据说我们镇里的这些就要撤走了……今天早晨，我在铺子里忙着活儿，忽然听到骑兵在胡同里嗒嗒奔跑。往外一望，他们向我铺子奔来。‘铁匠在这儿吗？’他们问。‘在。’我说。‘马上给我这匹马打上掌，要是误事，可要吃我的鞭子！……’我从铺子里出来，当然啰，脸上满是煤灰儿。我看见一个上校，——从肩章上看出来的，——随身带着一个副官。‘对不起，’我说，‘大人，这是我精通的行当。’我给他们的马钉起前掌来，一边敲打着锤子，一边留神细听。这时我才明白，他们的事情并不太妙！……”

西多尔吐了一口唾沫，用脚踩灭了烟头。

“喂，再见！有空儿再来闲聊。”

门砰的一声关上了，水蒸气在毡靴作坊湿津津的墙上飞起来。老头儿沉默了好久，然后搓搓手，走到彼得跟前。

“唉，彼特鲁哈，咱们可盼到自己人啦！哥萨克在咱们头上拉屎拉尿的日子不会太久了！”

“爸爸，我担心西多尔又是在扯谎……每一次，他都给我们送消息来，说快来了，快来了，可是连他们的影子也没有见到……”

“时间一到，就会见到影子的，会把哥萨克弄得措手不及哩！”

老头儿紧握青筋突露的拳头，在皮肤松弛的颧骨上，透过憔悴的肤色泛起了一片红晕。

“儿子，咱们从小就给有钱人干活儿。他们住着别人用双手给他们盖的房子，吃着别人用汗水给他们种的粮食，可是如今，可得请他们滚蛋了！……”

从父亲的喉咙里，突然爆发了一阵猛烈的咳嗽。他默默地摇了摇手，佝偻着身躯，用手紧按着胸口，在旮旯里的一只木桶边站了好大一会儿。随后，用围裙擦了擦嘴唇上淡红色的唾沫，微微地笑了。

“儿子，不能脚踏两只船，走两条路啊！咱们走了一条路，就得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一直到死，不能动摇。如果说我们生来就是毡靴工人，那我们就应当支持我们自己的工人政府！”

弹毛的弓弦在老人的手中鸣响起来，发出拖长的颤抖声。灰尘象蛛网织成的帷幔一样，使窗子变得迷蒙起来。太阳向窗子里窥视了一会儿，就匆匆滚下了斜坡。

二

第二天，一个军官携同镇公所的值班员，来到毡靴作坊。这个年轻的脸部浮肿的哥萨克少尉，用鞭子敲打着崭新的皮绑腿，问道：

“你就是克列姆涅夫·福马吗？”

“我就是。”

“奉镇长和军需处长的命令，我来征收你库存的所有毡靴。你的毡靴放在哪里？”

“大人，我跟儿子干了整整一年，你要是把这些靴子都拿走，俺们就要饿死了！……”

“这不干我的事儿！我的职责是没收你的靴子。我们的哥萨克在前线没靴穿。我问你：你的毡靴藏在什么地方？”

“少尉先生！……要知道，俺们这些靴子，不光是用汗水，而且是用鲜血浇成的呀！这是俺们的口粮啊！……”

少尉的满是脓疱的脸颊上，露出了阴险的冷笑。几颗金牙在胡须下闪闪发亮。

“有人说，你是布尔什维克？这是怎么回事？红军来了，他们给你付买靴钱呗！……”

他一边抽着不时冒出几缕烟的烟卷，一边碰得马刺“叮当”作响，走到角落里，用鞭杆拨开一块粗麻布。

“啊哈，我就拿走这些毡靴了！舒斯特罗夫，拿到外面去，大车马上就来了。”

父亲和彼得肩并肩地站着，用身子挡着堆在角落里的毡靴。

少尉暴怒得满脸通红；唾沫星子从他颤抖着的嘴唇里迸溅出来，但他压抑着怒气，嘶哑地说：

“我明天再跟你算帐，老狗，要把你揪到军法处去！……”

他把老靴匠一把推开，用脚胡乱地把熨平烘干的毡靴踢到门口。值班员抱起一摞毡靴，扔到了敞开的房门外。

篱笆外面响起了轱辘轱辘的马车声，在大门口停下来。屋角的毡靴一双双地减少着。老人没有作声，但是，当办事员顺手从炉子上把他那双穿旧了的灰毡靴也拿走的时候，他冲过去，用突然变得严厉的手把办事员按到了炉子上。迟钝的麻脸办事员猛力一挣扎，身上穿的衬衫就“嚓”的一声，从领口撕裂开来，他伸手给老人一个耳光。

彼得大喊一声，向父亲急扑过去，可是扑到半路，太阳穴被手枪托猛地一击，双手伸开倒了下去。

少尉转过两只充血的眼睛，向老靴匠冲过去，又“啪”地扇了他一个耳光。

“劈了他，舒斯特罗夫！……我负责！……打啊，管他妈的犯法不犯法！……”

办事员左手紧握毡靴，右手去摸军刀。老人双膝跪下去，垂下了脑袋，肩胛骨在干瘪的、黑褐色的脊背上颤抖着。办事员看了看老人耷拉到地上的灰白脑袋和包着筋骨的松弛的皮肤，望着军官后退着，走了出去。

少尉用鞭子抽打着老人，嘶哑地、断断续续地痛骂着……鞭子沉重地落在拱着的脊背上，肿起了一条条紫红的伤痕，皮肤绽开了，血一道道渗出来；老靴匠没有呻吟，但是血淋淋的脑袋越来越低地垂到了地板上……

等到彼得神智清醒过来，摇摇晃晃欠起身来的时候，毡靴作坊外已经空无一人了。寒风卷着灰尘，把一层枯黄的白杨树叶撒进了敞开的门里。在门槛旁，邻居的一只母狗在匆匆舔食着一大滩凝固了的浓黑的血。

三

一条通衢大道从村镇中间穿过。

在小教堂附近的牧道上，通往邻近各村和乌克兰各地的道路交汇到了一起。哥萨克团队、辎重队和讨伐队，正通过村镇向北方战线开拔。广场上经常人群熙攘。在镇公所旁边，信差们的汗淋

淋的马匹，啃着被雨水淋成赤褐色的篱笆。村镇的马厩变成了第二顿河军的军需仓库和炮兵仓库。

哨兵们用腐烂的罐头喂着肥猪。广场上散发着月桂叶和战地医院的气味。这里也有一座监狱，四周围着仓促做成的生锈的铁栅栏。大门旁边站着警卫，还有一辆底朝天的行军炊车和一个电话亭子。

在村镇里，在偏僻而平坦的小巷里，秋风沿着用干树枝编织的篱笆，扫着金褐色的槭树叶子，吹乱了板棚檐下的芦苇。

彼得走到监狱跟前。大门口站着哨兵。

“哎，你这小家伙，不许过来！……告诉你，站住！……你要找谁？”

“看我父亲……他叫克列姆涅夫·福马。”

“有这样一个。你等一等，我问一下长官。”

哨兵走进岗亭，从凳子底下滚出一只开着小口的西瓜，接着不慌不忙地用马刀把它切开，呼呼噜噜地吃了起来，把棕褐色的瓜子吐到彼得的脚边。

彼得望着哨兵那张颧骨高高的、被晒成青铜色的脸，一直等他吃完西瓜。哨兵把手臂一挥，把西瓜皮扔给了一头蹒跚走过的猪，接着，又一本正经地从它后面望了好大一阵，这才连连打着呵欠，拿起了电话话筒来。

“这里有一个小伙子要见克列姆涅夫。让他进去吗，大人？”

彼得听到电话听筒里响着一个沙哑的骂人的男低音，但听不清话语。

“在这儿等等，要搜查你一下！……”

过了一会儿，从铁栅门里走出了两个哥萨克。

“谁找克列姆涅夫？是你吗？举起双手！……”

搜了搜彼得身上的口袋，摸了摸他的破帽子和夹克的里子。

“把裤子脱下来！喂，混蛋，害臊嘛……你怎么啦，是个大姑娘吗？……”

铁栅门在彼得背后砰的一声关上了，门闩格唧唧发出了响声。他们经过一个个铁窗，向警卫室走去。各种各样的眼睛，从各个缝隙里向彼得张望着。

长长的走廊上散发着人粪和霉烂的气味。石墙上长满潮湿的青苔和腐烂的野菌。油灯发着昏黄的光。在尽头的一扇门口，哨兵站住了，他抽开门闩，一脚把门踢开。

“进去！”

彼得用脚探索着满是窟窿的地板，向前伸出两手，往墙边走去。从靠近顶棚处凿开的一个小窗洞里，透进了一束秋天的蓝色的光。

“彼佳什卡！……是你吗？！”

父亲发出了断断续续的声音，象是一个久病不起的人。彼得一下子向前扑过去，光脚踏着地板上的毛毡，蹲下身去，默默地用手抱住了父亲扎满绷带的脑袋。

哨兵靠在敞开的门扇上，一边玩弄着马刀上的皮带，一边哼哼着粗俗不堪的《忧伤曲》。

回声在拱形的顶棚下胆怯地退到了一边。彼得的父亲喘息着，发出了一阵兴奋的狂笑。彼得从地板上仰望着圆眼睛似的小窗洞，看见半空中飘动着一团团褐色的云，在云团下，两群叫彻云霄的仙鹤划破了天空。

“他们提审过我两次……审判员用脚踢我，逼我在我从未交待过的口供上画押。不，彼佳什卡，他们从我克列姆涅夫·福马

嘴里，任凭什么混帐话也逼不出来的！……让他们打死我吧，他们这样做会得到赏钱的，可是要我离开我从小选定的这条道路，办不到！

彼得听着这熟悉的、有些沙哑的笑声，带着难以抑止的愉快的满足，仔细端详着父亲这被打肿的黑土色的脸。

“唉，可如今怎么办呢？你还得在这儿蹲好久吗，爸爸？”

“我不会这样蹲狱的！今天或明天就会放我出去的……他们这些畜牲，恨不得一下子把我枪毙才好呢，可是，他们害怕非哥萨克的农民闹罢工……哼，他们最怕这一手！”

“就这样放你出去了吗？”

“不。他们会委派出一个本镇的老人法庭，装装门面。来个村民大会审判……到那时再瞧吧，看哪一边占上风！……现在说不定哪！……”

哨兵在门口吧嗒吧嗒地弹着指头，顿顿脚，嚷叫道：

“喂，你这个乐天派，快让儿子出来吧！你们的会面现在截止了！……”

四

傍晚，邻居的小伙子跑到毡靴作坊里来找彼得。

“彼得！”

“什么事？”

“快到村民大会上去吧！……你爸爸在广场上要让人家打死了，就在镇公所旁边！……”

彼得顾不得戴帽子，拔腿就向广场跑去。

他用尽浑身力气，沿着河边弯曲而隐蔽的小巷飞奔而去。邻居

小伙子的玫瑰红衬衫，在前面红柳的篱笆边晃动着；他那被夏日烤晒得发黄了的头发，被风吹拂得向后掀动着。他在各家门口用尖嗓子拼命喊道：

——快到广场去！……靴匠福马要让哥萨克打死啦！……

一群群的孩子从大门和篱笆门里跑出来，他们光脚板在小巷里急急奔跑着。

当彼得跑到镇公所的时候，广场上已经空无一人了，散去的人们都走进了大街小巷。

在牧师家的大门口，胖胖的牧师太太把手撮成一个 小船 形，遮在眼睛上望着奔跑的彼得。牧师太太穿一身印花布连衣裙，上面罩着披肩，在她两片尖薄而阴险的嘴唇上，泛着一丝令人不解的微笑。她站了一会儿，望着彼得的后影，用一只脚搔搔肥胖的、象肉冻一样颤动的小腿肚，便转身回家去了。

“菲克露莎，他们到底在哪儿打毡靴匠呢？”

“我可是说实话呢！我亲眼看见了，我的妈呀，他们是怎样打他的啊！……”门廊口啪哒啪哒地响起了脚步声。一只眼的厨娘蹒跚地向牧师太太跑过来，边跑边摆动着手，气喘吁吁地用尖嗓门说：“我看着人们把他从监牢里带到了会场上。哥萨克们吵吵嚷嚷，一片喧闹，可他倒满不在乎！这老畜牲，一边走，还一边嘿嘿笑，凶得可怕！……在这以前，他还让军官先生们打过……把他带到台阶上，又打了起来。我只听见嗖嗖地打过去，一下子摔倒了！……他拼命叫喊，喝，立时就把他结果了……有人用木棒，有人用铁棍，大多数都是用脚踢。”

镇文书摇摆着屁股，从镇公所的台阶上走下来。

“伊万·阿尔谢尼耶维奇，请您来一会儿！”

文书整了整肥大的马裤，欣赏着擦得明光雪亮的靴尖，迈着

细碎的步子向牧师太太走去。走到离她七八步的地方，他把微驼的背向后仰了仰，极力模仿着军需上校的样子，把两个指头随随便便举到了帽檐边上。

“日安，安娜·谢尔盖耶夫娜！”

“您好，伊万·阿尔谢尼耶维奇！你们的人命案是怎么回事？”

文书轻蔑地鼓起了下嘴唇，说道：

“毡靴匠福马因为加入布尔什维克，被哥萨克打死了。”

牧师太太耸了耸她那胖鼓鼓的肩膀，叹息道：

“啊呀呀，真可怕！……难道说您也参加杀人啦？”

“是啊……怎么说呢……您知道吗，动手打这个坏蛋的时候，他躺在地上大嚷大喊：‘你们打吧，至死我也不离开苏维埃政府！’当然啰，这时候我也踢了他，——真后悔，我也牵扯了进去。只是有失体面……靴子和裤子都弄上了血……”

“我可没想到，您是这么残酷的一个人呀！”

牧师太太眯缝着一对小眼睛，向衣着讲究的文书卖弄出一种媚笑；在镇公所的台阶上，彼得蹲在血迹斑斑的沙地上，他被五颜六色的一大群孩子包围着，久久地呆望着一个似圆非圆的、血肉模糊的人团儿。

五

在村镇上空飞翔着一群仙鹤，它们向渐趋寒冷的大地上撒下一片召唤似的叫声。彼得从毡靴作坊的窗洞里向外眺望着，一连几小时也不移动一下视线。

铁匠西多尔来到毡靴作坊，看见彼得用两块砖头在辗着玉米，他叹息了一声：

“唉呀，好可怜的孩子，你真是苦命啊！……嗯，不要紧，甭泄气，很快咱们的人就来了，日子会好些的！明天你到我那儿去，我给你倒两斗面粉。”

他坐了一会儿，从薰黄的牙齿中吐着一团团下等烟草的青烟，在炉子边吐了一口唾沫，叹息着，没告别就离开了。

可是，彼得的日子一点也没好过些。第二天日落前，他从广场上穿过；从监狱的大门里走出两个骑马的哥萨克，西多尔穿着一件长过膝盖的粗麻布衬衫，走在他们中间。衬衫的领口一直到腰间都被撕破了，从破缝中裸露着长满卷曲的硬毛的胸脯。

跟彼得走平肩的时候，他踉踉跄跄地回头说：

“他们押去枪毙我，彼佳什卡，好孩子，永别了！……”

他挥了挥手，哭了起来……

时间象在让人窒息的恶梦中一样过去了。彼得长了浑身虱子，黄黄的脸颊上布满了纤细的黄毛，看上去比他十七岁的年岁要大得多。

愁苦的日子慢悠悠地移动着，从容不迫地离去。随着黄昏的落日在栅门外一次次离去，红军越来越逼近了村镇；哥萨克心中的担忧，象水肿病一样一天天鼓胀起来。

早晨，当娘儿们赶着母牛向牧场走去的时候，听得见谢戈利斯克区后面的大炮在隆隆轰鸣。低沉的轰隆隆的炮声，掠过在绿色晨光中微睡的院落，透过毡靴作坊的土墙，令人心悸地震动着云母片的小窗户。彼得从炕上爬下来，披上粗呢上衣，走到院子里来，躺在一棵满身打皱、老态龙钟的柳树旁，耳朵贴在刚刚结了一层薄冰的地面上，听着大地如何在大炮的轰鸣声中呻吟、叹息，象老人一样发着哼哼声，而在那丛白杨树后面，机枪又掺杂着白嘴鸦的叫声，在上气不接下气地哒哒作响。

这天，彼得比往常更早地走到院子里来，耳朵附在冻结的地面上细听着，浑身感到一阵刺骨的寒气。大炮发出萎靡、沉滞的轰隆声，机枪却象年轻人一样，在寒冷的空气中低声喧闹着：

哒哒，哒哒哒哒……

起初，枪声稀落落的，后来密集了些，经过一分钟的间歇，又隐隐约约地响了起来：

哒哒哒——哒哒哒……

为了不让膝盖冻僵，彼得把上衣垫到腿下，躺得更舒服一些。这时，从篱笆外传来了伤风的嗓音：

——听音乐的，小伙子？这音乐吸引人哪……

彼得惊得一抖，一轱辘爬了起来。一个老头隔着篱笆，用一双盖在浓眉下的眼睛直望着他，在浅黄的胡须下藏着满意的微笑。

彼得从声音中辨认出是亚历山大老大爷，一个外号叫亚历山大四世的。他极力克制住话音的颤抖，生气地说：

“老大爷，走你自己的路吧！这里不干你的事！……”

“不干我的事儿，看来干你的事儿吧？”

“老大爷，别纠缠我，要不，我扔石头砸你了，以后你会后悔的！”

“够机灵了！我说，够机灵了！你这牛皮鬼，你这样对待老人，我会用拐杖教训你的！……”

“我不动你，你也甭来动我！……”

“你这胎毛没掉的小子，认真分辨清楚，再来玩刺儿头！”

老头抓住篱笆桩子，将他青筋外露的干瘪的身体，轻轻地一下翻过了围墙。他走到彼得跟前，整了整褴褛的花条裤子，在旁边蹲了下来。

“听得见机枪吗?”

“有人听得见,有人听不见……”

“咱们可听得见哪!……”

彼得斜着眼睛,对身子平躺在地上的老头儿瞧了好一会儿,然后踌躇不定地说:

“要是躺在柳树后面,就听得清楚。”

“咱们就去柳树后面听听!”

老头儿手脚并用,爬到柳树后面,用好象树根一样的双臂,抱住露出地面的褐色的树根,默默地、一动不动地听了约摸两分钟。

“有意思!……”老头儿欠起身,抖掉膝盖上蓬松的白霜,转过来对彼得说:“小伙子,你听我说:我可是连地下的东西都看得见。我一瞧你,就知道你脑袋里转的什么。听这样的音乐,咱会是个不够的,不过,我可跟我的儿子另有盘算了……你认得我的雅什卡^①吗?就是因为拥护布尔什维克,让镇里哥萨克打过的那个。

“认得。”

“喂,我同他拿定主意了,不等红军来,就接他们去!……”

老头儿向彼得俯下身来,胡须刺得他的耳朵痒痒的,用酸里酸气的耳语说道:

“小伙子,我怜惜你。多可怜呀!……咱们一块离开这儿。离开顿河哥萨克军吧!你干不干?”

“你不是胡说吧,老大爷?”

“你这样说我,还太年轻啊!这么不懂规矩,可真该好好揍你一顿!……只有小狗才胡说八道,我可是在说实话。我无须同

① 雅什卡是雅科夫的爱称。

你讨价还价，你愿意的话，就留在这儿吧！……”说完，闪动着花条裤子，向篱笆走去。

彼得赶上去，抓住了他的袖子。

“等一等，老大爷！……”

“不必了。你乐意同我们走，很欢迎；不乐意，那就娘儿们下车——母马轻松！……”

“我去，老大爷。什么时候走呵？”

“随后再定。你今天晚上就到我家来，我跟雅什卡在打谷场上。”

六

亚历山大四世一向是个好说爱动的老头儿，喝醉时脾气很坏，平日却是一个第一流的好人。他原来的姓氏谁也记不得了。许久前，他从住扎在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的哥萨克团队退伍回来，一次醉酒时，曾在村镇大会上向老人们宣称：

“你们的沙皇是亚历山大三世。我虽说不是沙皇，但我是亚历山大四世，呸，你们的沙皇见鬼去吧！……”

根据村镇大会的决定，因为他对陛下不敬，剥夺了他的哥萨克称号和份地，并且被判在镇集上赤身鞭笞五十下。这桩案子本来就可以这样了结了，但是，亚历山大四世一边提着裤子，一边向四周的镇民低低地鞠了一个躬，他扣着最后一个扣子说：

“各位老先生，我非常、非常感激你们，不过这一点吓不倒我！……”

镇长敲了敲权杖说：

“要是说吓不倒，那就再打几下！……”

又挨打之后，亚历山大不再言语了。人们把他抬回了家，可是打这以后，亚历山大四世的外号就一直保留了下来。

傍晚，彼得来到亚历山大四世家里。农家小屋里空无一人。只有一只黑褐色的山羊在过道里啃白菜头。他穿过院子，向打谷场的小门走去——门敞开着。从谷仓里传出了老大爷伤风的嗓音：

“到这儿来，小伙子！”

彼得走到跟前，打了招呼，可是老大爷对他连瞧也没瞧。老头儿正在制做脱谷用的石臼，跪在地上凿着缺口。灰色的石屑和绿莹莹的火花，从铁锤下飞溅起来。老大爷的儿子雅科夫，在风车旁头也不抬地忙碌着，正在敲敲打打，钉两边破裂的铁皮。

“眼瞧着就入冬了，还收拾这个干什么？”彼得心里这样想。老大爷拿锤子敲了最后一下，眼睛抬也没抬地说：

“想给老太婆留下的所有活儿都拾掇利索。她这个人很难说话，稍不称心，就嚷叫个没完没了！本想把这些家什都照样留给她，可又怕她怨气满多的，乱嚷嚷。她会说，你们都这样走了，可家里连一棵草也别长了！……”

老头儿的两眼笑咪咪的。他站起来，拍了拍彼得的脖子，对雅科夫说：

“别再敲打了，雅什卡！你同毡靴匠的儿子聊聊别的事情吧。”

雅科夫从嘴里往手心吐出几颗小钉子，把铁皮钉上风车，接着向彼得走过来，咧开嘴巴笑道：

“你好，红小鬼！”

“你好，雅科夫·亚历山德罗维奇！”

“嗯，怎么，你想跟我们一块走吗？”

“我昨天对亚历山大爷爷说了，我也去。”

“这还不够……当然啰，可以带着个糊涂的脑袋瓜，在夜里只跟镇里说声再见，就走掉！可是，咱们总应该尽量记住一些事。咱们在这儿看到的好事太多啦！我爸爸挨了人家的打，我因为不愿上前线，也几乎被打得半死，还有你爸爸……唉，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雅科夫向彼得俯下身去，贴近他耳朵，高高扬起他那两条弯眉，咕哝着说：

“小伙子，这些事你知道吗：他们那些立宪民主党分子，把炮兵仓库都设在镇上的马厩里了？你看见过没有，他们把炮弹和别的东西都运到这里来了？”

“看见过。”

“那比如说，要是给这些仓库放把火烧了，会怎么样呢？”

亚历山大爷爷用肘子从旁边碰了一下彼得，笑着说：

“那可不得了啊！……”

“我爸爸总说不得了，我看没什么了不起。红军不是已到谢戈利斯克区了吗？”

“昨天已经占领了克鲁坚庄，”彼得说。

“喂，要是在这儿搞它一个爆炸，给哥萨克的粮食和军火收拾个净光，那他们准会抱头而逃，一直退到顿河去！哈，好！……”

亚历山大爷爷摸了摸胡子，说道：

“明天天一擦黑儿，你再到这儿来……在这儿等我们，把路上用的东西随身带来，吃的别操心，我们会给你准备的。”

彼得走到打谷场的门口，可是老大爷又把他叫了回来：

“别穿过院子，街上有行人。翻过篱笆墙，走草原……时刻要小心！”

彼得爬过篱笆，跃过冰块点点的沟渠，很快走过镇里的打谷

场和盖着霜的灰蒙蒙的草垛，大步往家走去。

七

夜里，刮着东风，大片大片的雪花，纷纷扬扬。在每座院落、每条胡同里，黝黑的夜色渐渐变得灰蒙蒙的。彼得裹着父亲的粗呢上衣，走到街上，在栅门旁站了一会儿，静听着河上的柳树怎样在劲风中弯下腰，发出“呼呼”的响声，接着他慢慢地沿着街道，大踏步向亚历山大四世家的院子走去。

黑暗中，从谷仓里传出一个声音：

“是你吗，彼得？”

“是我。”

“到这儿来，往左边走，这边放着耙。”

彼得走到跟前，亚历山大爷爷和雅科夫正在谷仓旁边忙碌着。

准备妥当了。老大爷画了十字，叹了口气，大步向门口走去。

他们走到教堂附近。雅科夫用沙哑的嗓子咳嗽着，悄声说：

“彼特鲁哈，我的好朋友，你比我们灵巧，也不惹人注意……你不会被人发现的……你爬过广场，挨到仓库跟前。你看到过墙边堆的那些子弹箱吗？”

“看到过。”

“给你火绒跟火镰，这是蘸过煤油的大麻……你爬到跟前，用上衣遮起来，打着火石。只要大麻燃起来，往箱子中间一扔，就赶快……往我们这儿跑。喂，去吧。甭害怕！……我们在这儿等你。”

老大爷和雅科夫蹲在围墙附近；彼得把肚皮紧贴在盖着一层松软的厚霜的地面，向仓库爬去。

风拂着彼得的上衣，一股股刺骨的寒气透过他的脊背，刺着双腿。他的两手被结冰的地面冰僵了。他摸索着爬到了仓库旁边。在约摸十五步以外的地方，哨兵的烟卷象红煤块一样闪亮。风在板棚的木檐下怒吼，一块刮断的木板在啪啦啪啦地发响。风从亮着烟头的地方送来了低语声。

彼得蹲下去，用上衣蒙住头。火镰在手里哆嗦着，火绒从冻僵的手指间直往下掉。

嚓！……嚓！……火镰擦着火石的边缘儿发出轻轻的响声，可是彼得仿佛觉得，整个广场都听得到这种声音。恐惧犹如一条纠缠不休的毒蛇，缠着他的喉咙。火绒在他手里弄湿了，没有燃着……又打了两三下，才升起了一个红闪闪的火花，接着，一串大麻轰地烧了起来。彼得用颤抖的手把它塞到了子弹箱下面，瞬息间，闻到了一股焦木的味道。他站起身，就听见了脚步声和消失在黑暗中的低语：

“天啊，着火了！啊呀呀，你瞧！！！”

彼得这才省悟过来，向戒备森严的黑暗中猛冲过去。从他背后啪啪地响起了枪声，两颗子弹在头上啾啾地掠过，第三颗子弹在右边远远的地方，嗡嗡地划破了黑暗。彼得将要跑到围墙旁边，后面有人声嘶力竭地喊道：

“失一火一了！……失一火一了！……”

枪声“啪啪”地响着。

“只要跑到转角处就好了！”彼得的脑海里跳动着这样一个念头。

彼得用尽全力，拼命跑着。一个尖利的声音刺着耳朵。“只要跑到围墙那里就好了！……”

彼得觉得一条腿热辣辣地象火烧一样，他跌跌撞撞地跑了几

步，感到有种暖烘烘、湿漉漉的东西在小腿上流着……彼得倒了下去，一瞬间又跃起来，绊着上衣的前襟打了一个前栽，双手按到了地上。

老大爷跟雅科夫坐等了好一阵。风吹动围墙里系在大钟上的绳子，摇晃着几只小钟里的摆锤，发出各种低沉的叮叮当当的声音。

在黑暗里，在小山包一样突兀在广场上的仓库旁，起初是被风吹得断断续续的低低的说话声，接着，红色的火舌舔着黑暗，啪地一声响起了枪，一声，两声，三声……围墙边传来了脚步声，随后是上气不接下气的喘息声和压低嗓门的叫声：

“老大爷，帮下忙！……我的腿……”

老大爷同雅科夫一块搀住彼得，一下子钻进黑洞洞的胡同里，跑了起来。他们跑着，绊在土坎上摔倒了，爬起来又跑。等跑过两条街，钟楼上突然响起了警钟，钟声划破寂静，回荡在沉睡的村镇的上空。

亚历山大老大爷在彼得旁边呼哧呼哧地喘着气，急急忙忙地奔跑着。彼得的面颊被他蓬乱的大胡须搔得痒痒的。

“爸爸，往花园跑！……向花园那边去！……”

他们跳过沟渠，停下来喘了喘气。

在村镇上，在广场的上空，地面仿佛爆炸成了两半。一根红彤彤的大火柱，窜得比钟楼还高，一团团的浓烟升腾了起来……又是一声声爆炸……

寂静了片刻。接着，全镇的狗都一下子狂叫了起来，原先沉寂下去的钟声又“当当”地响了。女人们的嘶叫声荡漾在一些院落的上空。在广场上，黄色的火焰象波浪一样，舔光了轰然倒塌的仓库的断垣，它又宛如一条长臂，伸到了牧师家的房上。

雅科夫坐在枝条光光的荆棘丛后面，悄悄地说：

“现在跑出去根本不行了。你看，火光冲天，全镇亮得针都能拣到！……况且，也得瞧瞧彼特鲁哈的腿怎么样了……”

“得等到天亮，人们才会安静下去，到那时再往公树林里跑吧。”

“爸爸，您是上岁数人了，可见识怎么还象小孩一样！这时候镇里到处都在追寻咱们，咱们还呆在镇里，这怎么能行？咱们要是再回家去，那会立即被捆起来的。在镇里，咱们是会首先被怀疑的。”

“对……你说得对，雅科夫。”

“或者到我们家里去，在牲口圈里躲过白天？”彼得疼得皱着眉头问道。

“嗯，这倒合适。那里有什么破烂儿东西没有？”

“堆着干粪。”

“咱们悄悄挪动吧！……爸爸，您怎能走前街呢？咱们得悄悄地从后面胡同走！”

八

黎明前，雅科夫和彼得在干粪堆里挖了一个深坑。为了暖和一些，他们在坑底和四周铺了些干杂草，然后爬进去，在上面盖了些干牵牛花藤和从瓜田里拿回来作燃料的西瓜秧。

雅科夫撕下身上的衬衣，给彼得包了包被子弹打穿的腿。他们仨在里面一直蹲到天黑。早上有人到院子里来过。听见低低的话声，门锁咔嚓的响声，接着有一个声音在很近的地方说：

“毡靴匠家这小子可能在村里干活儿。老兄，别拧这锁了！”

拧这锁对你有什么用？毡靴匠家有的是虱子和羊毛，你进去是发不了财的！……”

脚步声在板棚后面消失了。

夜间寒气袭人。从黄昏时起，就听得见胡同里地面冻裂的声音，因为这里的泥土，从秋天以来就浸饱了水分。在飘着朵朵乌云的天空，一轮斜月在夜航。群星在暗蓝色的天穹下诱人地眨巴着眼睛。透过牲口圈屋顶的破洞，望得见夜的天空。

干粪坑里暖和和的。亚历山大老大爷把下巴扎入膝盖间，颤动着两腿，在拉着鼾声打瞌睡。彼得跟雅科夫在低声交谈着。

“爸爸，醒一醒！您要睡到啥时候呀？该走了！”

“什么？该走了？行啊……”

他们用了好一阵功夫，小心翼翼地干粪拨开。随后轻轻地打开一道门缝，——院子里、胡同里，没有一个人。

他们经过村镇尽头的一个院子，穿过小树林来到草原。他们在雪地上向前爬了百十俄丈，来到一条野草丛生的深沟。在后面，村镇用它闪着橙黄色光点的窗子注视着草原。他们沿着深沟，静悄悄地、小心翼翼地走向公树林走去，仿佛猎兽时那样。冰块在脚下格格作响，雪发出吱吱的声音。沟底的裸露的石头上堆着一大堆雪，雪堆上留下了兔子的蓝色的脚印。

深沟的一个沟岔正靠着公树林的边缘。他们爬上一个 小土丘，向四周望了望，不慌不忙地走进了树林。

“咱们不熟悉路，到谢戈利斯克那边很危险。火线快到了，咱们说不定会碰上白军呢。”

雅科夫把头钻进短大衣敞开的前襟里，用火镰打了好一阵火。火星飞溅出来，钢碰着火石，发出单调的嚓嚓声。用向日葵灰揉制的火绒发红了，冒出了臭烟。雅科夫抽了两口烟，回答父亲说：

“我看咱们不如到看林员丹尼拉家去吧，他是咱们的老熟人。咱们向他打听一下，看怎样穿过阵地，顺便也让彼特鲁哈暖和暖和，要不他会冻坏的！”

“雅科夫·亚历山德罗维奇，我不要紧。”

“别说了，小伙子！没功夫说废话。你那件上衣只能遮遮太阳，挡不住寒气。”

“动身吧，雅什卡，动身吧！……你瞧，北斗星的勺子朝上了，快半夜了。”老大爷说。

他们走到离看林员的小屋约摸五十俄丈远的地方，停了下来……丹尼拉的小窗亮着灯火，看得出，烟从烟囱里懒洋洋地升起来。月亮挂在森林上空，令人讨厌地窥视着地面。

“大概没有其他人，咱们去吧。”

小棚下的狗汪汪叫了起来。结冰的台阶在脚下吱吱发响。他们敲了敲门。

“主人在家吗？”

大胡子贴在看林员的小窗上。

“在家。上帝把谁送上家门啦？”

“自己人，丹尼拉·卢基奇。看在基督面上，让我们进去暖和暖和吧！”

里面的门吱扭一声，门闩发出了格唧唧的响声。门槛上站着看林员，他把右手遮在眼睛上，打量着客人，左手握着步枪，藏在背后。

“好象是你呀，亚历山大老大爷？”

“是我……能让我们借宿一夜吗？”

“难说……嗯，进来吧，也许住得下！”

屋子里烧得很热。火炉边的毯子上躺着三个人，脑袋旁放着

鞍子，角落里立着步枪。雅科夫退向门口。

“东家，你这里是谁呀？”

毯子上一个声音说道：

“难道连同乡都不认识了？从昨天起，我们就一直在恭候你们哩。我们想，公树林和丹尼拉的小屋他们是绕不过去的……喂，亲爱的客人，脱脱衣服住一宿吧，明天就一直给你们送到沙皇的秋千架上去！……绳子早就在等你们啦！……”

哥萨克从毯子上一轱辘爬起来，抓住了枪。

“谢苗，把放火犯的手捆起来！……”

九

两个哥萨克睡在铺上，另一个坐在桌子边垂着头，两腿中间夹着步枪。看林员丹尼拉把一件粗布衣服扔在地板上。

“铺上吧，亚历山大老大爷，铺上睡着舒服一些！”

“瞧你这个可怜虫，还是你自己铺上吧……听见了吗，看林的？拿起你的衣服！……他们烧了仓库，就是让他们跟你的狗睡在冰地上，也不算罪过！……”

天亮前，老大爷要求到外面去：

“小伙子，放我小便一趟去……”

“不要紧，老头子，就尿到裤子里去吧，或者撒到靴子里！……明天我们把你吊起来，就会晾干的！”

冬日的淡淡的晨曦划破了窗纸。哥萨克们起来洗好脸，坐下来吃早饭。雅科夫在他们没觉察的当儿，悄悄对父亲和彼得说：

“绳子让我在夜里给磨断了……咱们一到镇边，就分开往小树林跑，再从那里上山……跑进我们挖石头的洞里……在那里，

他们一辈子也抓不住咱们！……”

三个人被一条麻绳捆着手，往前走。彼得跛着受伤的腿，痛得把牙齿咬得格格作响。

村镇到了，四周披散着小树林的灰色枝条，象患热病女人的乱发。他们一拐进头一条胡同，雅科夫就把嘴巴扭得苍白，一下挣断绳子，在雪地上摇晃着身影，往小树林飞奔而去。亚历山大老大爷和彼得接踵而逃。三个人分散开来。后面大声叫喊：

“站住，站住，他妈妈的！……”

一阵枪声和马蹄声。彼得跃过沟渠，向后一看：亚历山大老大爷倒下了，中弹的脑袋一下子栽进了雪堆里，两脚高高地蹬了一下。

一座峰顶积雪的山头迎面而来。哥萨克的采石坑象一个个黑眼窝似的，出现在面前。雅科夫首先钻进去，彼得也随后跑了进去。

他们在潮湿、窒闷的黑暗中弯弯曲曲地爬来爬去，身体碰在尖突的石头上，挂破了衣服，划出了血痕。有时候，彼得的脑袋让雅科夫的靴子碰得直发疼。石洞分成两个岔，他们向左边爬去。彼得的两手沾满了冰冷的泥巴，水从头顶滴进了衣领。

脚下遇到一个大坑。他们爬下去，并排坐下来。

“我好苦啊！……爸爸想必让他们打死了。”雅科夫喃喃地说。

“他倒在渠沟边了……”

声音嗡嗡的，象别人的嗓音似的。漆黑粘住了眼睑。

“哎，彼得，他们如今只能围起来抓咱们。咱们象黄鼠狼一样落在洞里了，不过也说不定！……他们不敢钻进来追咱们。这些洞还是在对德战争以前我跟爸爸挖的。所有通道我都熟悉……咱们再往前爬吧。”

他们继续爬着。有时候进到死胡同里，只得退回来，再找别

的通道。

他们在漆黑、粘湿的洞穴里蜷缩了两昼夜。

寂静在耳边鸣响。他们几乎连句话也不交谈，就是在睡觉的时候也机警地听着响动。水在上面什么地方钻着泥土。他们醒来许多次，都又睡着了……

后来，他们象没有眼睛的小狗儿似的，跌跌撞撞地碰着洞壁，往洞口爬去。他们寻了好半天的路，突然眼前一亮，现出了一道刺目的光。

石洞的入口处，有一堆青灰和烟头，还有一些弹壳和许多人的脚印。他们往外一望，看见一队骑兵骑着秃尾巴的马，沿着大道，弯弯曲曲，向镇里奔来；后面跟着拥来一大队灰色的步兵；风卷着红旗，远远送来说话声、哄笑声、口令声和雪橇滑木的嘎吱声。

他们一下跳了出去。跑着，跌倒了。雅科夫挥动着手臂，扯着嗓子高喊道：

“弟兄们！红军们！同志们！……”

骑兵队犹如一群枣红马似的聚集在路上。

步兵蹒跚在泥水里，啪唧啪唧地拥挤在后面。

雅科夫摇晃着脑袋，哽咽起来，扑过去亲吻着红军的马镫和钉掌的靴子。彼得让红军抱起来，被转手传接过去，放在雪橇里一堆香喷喷的干草上，盖上了军大衣。

雪橇摇晃着。军大衣散发出亲切的汗酸味，象父亲的汗衫曾有的气味那样……

彼得的脑袋直打转转儿，感到胸口一阵恶心，可是心里却象是五月雨后的禾苗，绽开了快乐的花。不知是谁的手掀开军大衣，一张没有胡须的饱经风霜的面孔，嘴角挂着微笑，向彼得俯下来。

“活着吧，好朋友？要面包干吗？”

他们往彼得不听使唤的嘴里塞着嚼碎的面包干，又拿粗线手套磨擦着他那冻僵的手指。彼得想说什么，可是嘴里含着黑麦面糊糊，喉咙也哽噎着。

他抓住一只又黑又硬的手，紧紧、紧紧地按在他的胸口上。

第 二 部

一

一幢洋铁皮顶的大房子，面街是六扇带着天蓝色百叶窗的令人赏心悦目的窗子。以前镇长住在这里，如今成了共青团支部俱乐部的所在地。在一九二〇年阴郁多雨的九月，漆黑的夜幕笼罩着花园和小巷。

俱乐部里正在开会，烟气缭绕，人声鼎沸。桌子边坐着支部书记彼得·克列姆涅夫，旁边坐着支部委员格里戈里·拉斯科夫。会议正在解决一个重要问题：关于把耕种地划给团支部作示范田的问题。

经过半个小时的酝酿，作了如下记录：

“全体听取了拉斯科夫同志关于在克鲁坚区测量土地问题的报告。

“全体决议：指派拉斯科夫和克列姆涅夫两同志立即前往察看并丈量土地。”

他们熄了灯。杂乱的脚步声在台阶上响了起来。彼得在角落旁边站了一会儿，看见拉斯科夫的白衬衫在星光中晃动着，打破

沉睡中的村镇的寂静，喊了一句：

——格里戈里，听见了吗？大家都在耕地，你再借庄户们的大车了！咱们走着去吧！

二

天空现出一抹淡淡的曙光。一条光溜溜的硬道上，不多久前走过了一群马匹。灰尘还罩在艾蒿的顶梢。小山岗上出现了一片耕地。人黑压压地在耕地上蠕动，套着犁的公牛在慢慢腾腾地爬行。风卷起赶牛的吆喝声，也传来鞭子的清脆的响声。

彼得和格里戈里默默地向前走着。太阳当头时分，他们来到了克鲁坚区。在这个草原上的小山沟里住着十户乌克兰移民。在河堤附近，有个女人把衣襟掖在腰间，啪啪地抡着洗衣槌。几头花牛半浸在水里，从对岸游过来。它们竖起耳朵，傻头傻脑地盯着这两个小伙子，望了好一阵子。领头的那头牛，象害怕什么似的，尾巴一翘，径直往堤上窜去，后面的一群牛也跟着跑了过去。留灰白胡须的牧人，在空中打着一个个响鞭；小牧童闪动黝黑的脚后跟，跑去把牛赶了回来。在打谷场上，在蒸汽打谷机的突突的响声中，一个姑娘用动听的声音叫道：

“加尔皮什卡，咱们去瞧瞧吧，红军到咱们这儿来了！……”

傍晚，两个小伙子找到了区主席。他俩在他家里吃着香喷喷的甜瓜，决定明天去看地块。女主人给他们在门廊里铺了床。格里戈里一下子就睡着了，彼得却好半天翻来覆去，在羊皮大衣下捉跳蚤，心想：这个滑头的主席，会给拨块什么样的土地呢？

半夜，主人响动着门闩，来到台阶上，望了望星斗满天的夜空，到马厩给马拌草料。井上的吊杆“吱扭吱扭”地响了起来，一

匹马驹在草原上拖长声音嘶鸣着。院子里传来低低的说话声。彼得醒来了。

格里戈里在梦中格吱吱咬牙，翻了一个身，用清清楚楚的声音伤心地说：

“死呀，老兄，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门廊里响着靴子，主席走了进来。

“小伙子，小伙子，听到了吗？”

“什么？”

“真见鬼……刚从韦任斯克庄上来了一个老乡，他说，那里被马赫诺占领了。小伙子们，你们得跑了！……”

彼得在半睡半醒中嘟哝着：

“嗯，可土地怎么办呢？你明天丈量出一块，我们就走，要不就白跑一趟了！”

黎明时，彼得梦见他正在区里开会，可是却不知是谁重重地踩在房顶上，接着，铁皮咕咚一声弯了下来，发出咕咚咚、格吧吧的声音。

一醒过来，他才明白是炮战。他担忧得心紧缩了起来。他们匆匆收拾好东西，抓起木丈尺，轰开狂叫的狗，离开了这里。

“这里离韦任斯克有多少里路？”格里戈里问。

他默不作声地跨着大步，若有所思地把路边飞廉的红花瓣撕得粉碎。

“大概三十俄里左右吧。”

“咱们来得及！”

他们走过瓜园，登上了山岗。彼得把弹药盒弄掉了，回头去拾，不禁啊的一声，大吃一惊：从他们来的那边正走来一队整齐的骑兵。领头的的一个骑兵打着一面随风飘动的黑旗，那旗就象受伤

的乌鸦的翅膀。

“哎呀，他妈的！……”

“真见鬼！”格里戈里暗自说。他的嘴唇抖动了一下，脸刷地变得灰白了。

主席扔掉了丈尺，莫名其妙地伸手去口袋里摸着烟荷包。彼得飞步跳进山沟，格里戈里也跟着滑了下去。

腿不听使唤，古怪地老是跌跤，跑得象乌龟一样慢；心要急裂了，嘴巴呼呼地喘着热气。山沟底上流过水，湿得很难行走。淤泥散发着腥臭味，常被脚粘起来。彼得一边跑，一边甩掉靴子上的泥巴，灵便地抓住步枪；格里戈里脸色发青，嘴唇抽搐着，“呼哧呼哧”地直喘气。他摔倒了，把枪扔得老远。

“彼得，扔掉吧，被他们抓住，就没命啦！……”

彼得发火了。

“你发疯了？！快拾起来，混蛋！”

格里戈里无精打彩地抓起了枪带。他两个用严厉的、异样的目光对望了一阵。

他们又往前跑去。在山沟的一端，格里戈里一跤摔了个面朝天。彼得咬咬牙，把同志的枯瘦的身体夹在腋下，拖着他走。山沟分成了几个岔，堆着马骨头和白蒿的那条沟岔，一直通到耕地。一个老农在大车旁正把两匹马往犁上套。

“借马到镇上去一趟！……马赫诺匪帮追来了！”

彼得一把抓住了马颈圈，老农抓住彼得不放。

“我不能给！……马怀驹了，怎么能骑啊？！”

强壮的老农用粗硬的手指死死抓住枪筒；彼得闪过一个念头：拔出枪，打死他，夺出马来。

他注视着面前这双可怕而尖利的眼睛，面颊上棕色的硬毛和

嘴角上微微的颤抖，猛然托起枪来，把枪栓拉得“哗哗”作响。

“走开！”

老农弯下腰去拿大车旁的斧头；彼得感到喉咙中一阵恶心，用枪托照准凸出的后脑勺只一敲，他那穿着带褶的靴子的两腿，便象蜘蛛爪子一样，痉挛得抖动起来……

格里戈里砍断马套，跳上母马；彼得也骑上一匹黑斑的乌克兰灰骟马。他们穿过耕地，往大路上奔去。马蹄和谐地“得得”作响。彼得回头一看，只见山沟上灰土飞扬。追赶的人马分散开，拼命扬鞭追来。

他们跑了十来里路，追赶的人马越来越近了。看得见，前头的那匹马高高地昂起头，猛然向后退了一俄丈来远，毛茸茸的黑毡斗篷在骑者身上翻卷。

格里戈里骑的那匹母马，脚步明显地慢下来，呼噜呼噜地喘着气，一声声急促地嘶叫着。

“母马要下驹了……我完了，彼得！”格里戈里透过刀割似的寒风喊叫着。

在墓冢附近的转弯处，格里戈里飞马一跳，马栽倒了。彼得暴怒地疾驰了几俄丈远，可是猛一省悟，又急速地勒转回了马头。

“你这是干什么呀？！”格里戈里用哭丧似的声音喊道，可是彼得却满怀信心，灵巧地压上弹夹，一下子跃下马，跪下一条腿，向逼近的黑斗篷射了一枪，接着，退出枪膛里的弹壳，笑着说：

“死呀，老兄，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他又射了一枪。远处那匹马跃着立起来，黑斗篷滚到地上，可是那人的脚却卡在马镫里。马跑离路面，在团团灰尘中飞奔而去。

彼得心不在焉地目送着它，叉开两腿，在路上坐下来。格里戈

里用汗津津的手掌揉搓着香气扑鼻的薄荷花，怪模怪样地笑了起来。

彼得严肃地低声说：

“哎，现在完了，”说完，一头趴到了地上。

三

在执委会的院子里，工作人员们正把缝在口袋里的文件掩埋起来。雅科夫主席在台阶上修理着一挺上了锈的、残缺不全的机枪。从早晨起，人们就在等待外出侦察的民兵回来。中午，雅科夫把从旁边跑过的共青团员安托什卡·格拉乔夫叫到跟前，笑眯眯地说：

“到马厩牵一匹精壮的马，往克鲁坚区跑一趟。或许你能碰上咱们的侦察队，那就转告一声，让他们返回镇里来。你有枪吗？”

安托什卡闪动着光脚跟，边跑边嚷：

“有枪，还另有二十发子弹！”

“好，那就去吧，快点！”

五分钟以后，安托什卡象一阵旋风似地从执委会的院子里冲出来，他用老鼠一样闪亮的小眼睛向主席瞧了一眼，身边扬起一团团灰尘。

站在执委会的台阶上，雅科夫看得到马脖子匀乎的晃动和安托什卡长卷发的脑袋。他在门槛上站了一会儿，走进罩满灰蛛网的走廊。工作人员和共青团员们都集合起来了。他用疲倦的眼睛向大家扫视了一下，说道：

“安托什卡跑去侦察了……”他沉默了一会儿，若有所思地用指头敲打着桌子，补充道：“彼得和格里戈里在区里……不知他们

能不能逃出马赫诺的手?……”

人们在执委会的瓮声瓮气的空房间里走来走去，对着褪色的标语画读着已读了千百遍的杰米扬·别德内依的流行短诗。过了约摸两个钟头，外出侦察的民兵飞身冲进执委会的院子。他们连马也顾不得拴，就跑上台阶。前面一个浑身沾满一层厚厚的灰土，大声问道：

“主席在哪儿?”

“他这就来了。哎，怎么样，你们看见了吧?人很多吗?他们在钟楼上躲得过去吗?……”

一个民兵绝望地挥了挥鞭子。

“我们跟敌人的先头骑兵连撞上了……好不容易才逃了回来!他们总共有万把人。黑压压的，象一群乌鸦，蜂拥而来。”

主席皱着眉头，问：

“没有碰见安托什卡吗?”

“我们不认识这个人，只看见克鲁特峡谷后面，有个骑马的人向草原方向跑去。他大概落在马赫诺手里了……”

人们围得水泄不通，相互嘁嘁喳喳地交谈着。主席捋了一把蓬乱的胡须，不得不说出心里的话来：

“彼得和格里戈里去区里量地，显然是完了……安托什卡也是……咱们只能藏到芦苇丛中去了……对付马赫诺，咱们的力量太小了……”

征粮员张着嘴巴，想说什么，可是只惊慌失措地向门里结结巴巴地吐出了一句话：

“快跑吧，同志们!小山上骑兵来了!……”

一个喊声，象一阵风似的，把人们吹散了。刚才人们还聚拢在一块，可转眼一个不见了。镇上人迹全无，家家户户都关上了百

叶窗。村镇的上空一片寂静，只有执委会篱笆旁的杂草丛中，有一只受惊的母鸡，咯咯哒咯咯哒地使劲叫。

四

风吹起安托什卡背上的衬衫，一鼓一鼓地砰砰作响。骑着没有鞍子的马很难受。马一路小跑，上下颠簸着。他轻轻勒住马缰，从克鲁特峡谷登上山去，蓦地看见两里外有上百个骑兵，后面跟着两辆机枪车。他顿时闪出了一个念头：“马赫诺匪帮！”

他勒了勒马，背上感到一股刺骨的寒气。马象故意为难他似的，懒洋洋地、四平八稳地迈着徐缓的步子，不肯飞步疾驰。

敌人看见他了，大声喊叫起来，砰砰地乱开了一阵枪。风抽打着他的脸，眼泪遮蔽了眼睛，耳边响着尖利的呼啸声。回过头去是很可怕的。只是跑到镇边的有几户人家的地方，他才回头望了一眼。他边跑边跳下马，弯着腰，跑到了围墙边，心想：“要是打广场上跑，敌人就会看见，追上来的……不如进围墙，上钟楼去！……”

他左手紧抓住步枪，右手推开栅门，光脚踩着地上的落叶，飒飒发响。他踏上教堂的旋梯，迎面扑来一股神香、霉烂物和鸽粪的气味。

他在顶端的平台上站住，直挺挺地平躺下来，侧耳倾听着。一片寂静。镇里只有公鸡的啼叫声。

他把枪放在身旁，卸下弹药盒，擦了擦额头上粘湿的汗。他的念头在脑袋里一个个变换着，翻腾着。“反正我会被他们打死，那不如我先报销他们……彼得·克列姆涅夫说过：马赫诺是资产阶级的爪牙……”

安托什卡突然想起来，上星期瞄着河对岸一辆相距一百来步的大车射击，他比其他小伙子射中的都多。他这时感到喉咙里一阵刺痒，心跳得慢了下来。

六个骑兵小心翼翼地来到广场上，下了马，把马拴到学校的篱笆上。

安托什卡的心又猛地一惊，蹦蹦跳了起来。他咬紧牙关，抑制住颤抖，用哆嗦的指头压上了弹夹。

从胡同里又窜出了一个骑兵，在疯狂跳跃的马上直打转转儿，他用鞭子一抽，又向后面疾驰而去。从放荡不羁、剽悍骁勇的骑姿上，安托什卡认出是一个哥萨克。他目送着在马臀上飘荡的绿军服，长叹了一口气。

机枪车轱辘而过，无数的马蹄声嗒嗒作响，炮车轰隆隆地跟在后面。镇里到处是黑压压蠕动的步兵，象腐尸上的蛆虫一样。街道上挤满了机枪车、炮车和弹药车。

安托什卡微微打了一个寒噤，他用冰冷的、不听使唤的手指动了一下枪闩，接着侧耳倾听着。上边，在横梁中间，有只鸽子在“咕咕”地叫。

“再稍微等一下……”

在围墙附近，马赫诺的骑兵在喂马。有一些人三三五五地躺在马匹中间，他们穿着五颜六色的灯笼裤，扎着鲜艳的宽腰带，象色彩斑斓的河卵石。一片说话声和阵阵爆发起来的哄笑声。在大路上，机枪车两辆一列地向前行进着……

安托什卡拿定主意，瞄准了一个机枪手的灰毛皮高帽。吧——咚——，一声枪响，机枪手的脑袋一下栽进了两膝中间。又是一枪，一个车夫丢开缰绳，不声不响地滚到了车轮下。枪声接二连三地响了起来……

拴在马桩上的马暴跳起来，尖声嘶叫着，踢着想骑马的人。在大路上，一匹拉边套的马受了伤，在套索中拼命挣扎着；在学校附近，一辆机枪车在飞跑中猛一颠，撞翻了个个儿，罩着白套的机枪，头朝下，无可奈何地插进了泥里。在钟楼的上空，马嘶声、叫喊声、口令声和杂乱的枪声，翻腾着响成一片……

炮车咣咣当当地向后倒退。安托什卡被人发现了。一颗子弹砰的一声打在木梁上。广场空荡荡了。在学校的台阶上，一个马赫诺匪帮的水兵，灵巧地操纵着机枪。子弹从一只泛着铜绿的古钟上掠过，发出叮叮当啷的哀鸣。一颗子弹反跳过来，正好打在安托什卡的手臂上。他爬开去，欠起身来，贴在一个砖柱子边，继续射击；水兵两手一伸，打了个旋转儿，扑倒在腐烂倾斜的台阶上。

在镇外的墓地附近，一门三吋口径的大炮从前车上卸下来，钢铸的大口对准了泥灰剥落的教堂。全镇隐蔽起来的人，被隆隆的炮声震惊了。

炮弹打到了圆顶下面。一大堆砖屑粉尘撒到了安托什卡身上，也飞溅在古钟上，敲打得发出了嗡嗡的怒号。

五

彼得趴在地上一动不动，闻得到薄荷的浓郁的清香，听得到清晰的“嗒嗒”的马蹄声。

一阵猛烈的翻肠滚肚的恶心，从胸口里涌上来。他摇了摇脑袋，略微欠起身，看见在格里戈里帆布衬衫的旁边，有一张口吐白沫的马脸，一件蓝色的哥萨克长衣，还有一张被太阳晒成褐色的脸，脸上有一双加尔梅克人的斜眼睛。

在一里来远的地方，另有几个人围着一匹马转来转去，那匹

马拖着一个身披破斗篷、被撕得残缺不全的人体。

格里戈里一边象孩子似地呜咽着哭起来，一边气喘吁吁地用撕裂的声音喊着什么。面对这情景，彼得的心直打哆嗦。他一眼不眨地望着，加尔梅克人半立在马镫上，斜挂着身子，挥动了一下雪亮的钢刀。格里戈里拙笨地蹲下去，双手抱着被砍成两半的脑袋，随着一声惨叫，倒了下去。血在他的喉咙里咕嘟咕嘟地发响，象潮水一样涌了出来。

在彼得的记忆中，只留着格里戈里抽动的两腿，还有那个加尔梅克人脱皮的面颊上那条血红的刀疤。后来，马掌的尖刺扎进他的胸脯，他昏厥了过去，毛拧的套索又套住了他的脖子。于是，一切都在火星燎乱和热辣辣的雾霭中狂烈地旋转起来……

彼得清醒了过来，他忍不住眼睛的剧烈的刺痛，大声呻吟着。他用手摸了一下脸，大吃一惊，觉得眼皮下一团粘糊糊的东西流到了脸颊上。原来是一只眼睛掉了出来。另一只也肿得高高的，淌着眼泪。透过眼睛的一条细缝，彼得勉强分辨得出面前的马脸和人脸。有一个人向他俯下身来，说道：

“站起来，小家伙，要不，我要你的命！……到司令部受审去！……喂，你起来不？……反正不经审判，我可以枪毙你！……”

彼得欠起身来。周围是各种颜色的人头的海洋，车声隆隆，马声嘶鸣。戴着灰羔皮毛高帽的押送兵走在前面，彼得一摇一晃地跟在后头。

他的脖子被毛套索勒得灼痛，脸上的擦伤凝着斑斑血迹，他感到浑身剧痛，仿佛他被毒打了好大一阵。

在去司令部的路上，彼得不断向四周张望着：眼睛所到之处，不论是广场、街道，还是弯弯曲曲的小胡同，到处是人、马和机

枪车。

司令部设在牧师家。从敞开的窗户里迸发出吉他的嘶哑声和杯盘的叮咣声。看得出，牧师太太正在厨房里忙碌着，招待尊贵的客人。

押送彼得的士兵在台阶上坐下来抽着烟，嘴里嘟囔着说：

“在台阶边站一会儿，司令部正办事儿！”

彼得靠在吱吱作响的栏杆上，口干舌燥，吃力地转动着破裂的舌头说：

“喝点水吧……”

“到司令部给你水喝！”

台阶上走出来了一个麻脸的水兵。蓝色的长衣上束着一条大红的宽腰带，衣服上的毛线头一直垂在膝盖上。头上戴着一顶无沿的海军帽，上面标着褪色的番号：“黑海舰队”。水兵手里拿着一只扎着飘带的漂亮的手风琴。他用一双苦闷的绿眼睛，上下打量了彼得一番，露出了笑容，接着，懒洋洋地拉起了手风琴：

年轻的共产党员，
你结婚干什么呀？
马赫诺大人一来，
你往何处逃呀？……

水兵的声音醉醺醺的，但很响亮。他又唱了一遍，闭着的眼睛连抬也没抬：

马赫诺大人一来，
你往何处逃呀？……

押送兵抽完了最后一口烟，头也没回地说：

“喂，你这个独眼龙，跟我来！”

彼得走上台阶，进入屋内。外间的墙上挂着一面黑旗，旗上有一行被皱折折断的白色字母：“第二大队司令部”，稍靠上面一点写着：“大乌克兰万岁！”

六

在牧师的卧室里，响着打字机的嗒嗒声。从敞开的门扇里，传出了说话声。彼得等了好半天，在光线幽暗的外间，他被弄得有些打不起精神来。连续不断的钻心的疼痛，消耗了他的意志和理智。彼得禁不住想：马赫诺匪帮把他支部的团员和工作干部都砍死了，眼下在牧师这间神香缭绕的卧室里，死神又向他眨巴着眼睛。可是，这个念头并没有把他的心吓冷。彼得均匀地、不间断地呼吸着，双眼紧闭，只是沾满血污的脸颊不停地抽动着。

卧室里充满着说话声、打字机的嗒嗒声、女人们的笑声和碰杯的叮当声。

牧师太太从彼得身边跑进了外间。一个腰带紧束、长着浅色胡子的马赫诺匪徒，跟在她后边，把马刺踢得叮当响，边走边捻着胡子。牧师太太手里拿着长颈瓶，眼睛笑成一条缝。

“这是藏了六年的陈果子露，专为应付万一的。哎哟，您可得知道啊，同这些野蛮人住在一块多可怕呀！……经常受欺压。支部甚至下令强抢我们的钢琴。您倒是想一想啊，在我们家拿走我们自己的钢琴！啊？”

她一边走，一边用令人厌恶的目光，直勾勾地盯着彼得，嫌恶

地皱了皱眉头。后来她认出了彼得，低声对马赫诺匪徒说：

“这就是共青团支部主席……凶恶的共产党员……你们可得把他……”

因为裙子的窸窣声，彼得没有听清后半句话。

过了一分钟，他被唤了进去。

“快到拐角的房里去，你妈的……”

那个长着浅色胡子的匪徒，戴一顶银灰色的羔皮高帽，坐在桌子后面。

“你是共青团员吗？”

“是的。”

“对我们的人开过枪吗？”

“开过……”

马赫诺匪徒若有所思地咬着胡子尖，一边审问，一边望着彼得脑袋的上方。

“我们枪毙你，你不感到委屈吧？”

彼得用手掌擦了擦嘴唇上的血，斩钉截铁地说：

“你们枪毙不了所有的人。”

马赫诺匪徒在椅子上急转过身来，大喊道：

“多尔贝舍夫，把这家伙带出去，交二排毙了！……”

彼得被带了出去。押送兵在台阶上用皮条捆了彼得的双手，打紧结子，问道：

“不疼吗？”

“别废话了，”彼得说着，走出了大门，不谐调地摆动着被捆住的手。

押送兵随手掩上栅门，从肩上取下了步枪。

“等一等，排长来了！”

彼得站住了。他感到很难受，因为下巴痒得难以忍受，可是搔痒又不可能——手被绑着。

矮个儿的瘸腿子排长走了过来。高高的英国皮绑腿，散发着焦油的臭味。他问押送兵：

“是带给我的吗？”

“是的，关照说要赶快些！”

排长用惺忪的眼睛瞧了瞧彼得，说道：

“真是个怪人……同一个小家伙儿泡蘑菇，让他受苦，我们也自讨苦吃。”

他皱着火红的眉毛，又打量了彼得一眼，骂着娘，大声喝道：

“蠢货，滚到棚里去！……喂！……告诉你，去，脸对墙站住！……”

留着浅色胡子的马赫诺匪徒，从司令部走到台阶上，把身子倚在雕花的栏杆柱子上，说道：

“排长，听到了吗？……不枪毙这家伙了，让他到我这儿来吧！”

彼得走上台阶，站住，靠在门边。浅色胡子向他走近，端详着他那血迹斑斑的狭小的眼缝说：

“你很刚强，小伙子……我饶了你这条命，把你编到马赫诺大人的队伍里来，你愿干吗？”

“愿干，”彼得闭着眼睛说。

“你不逃跑吗？”

“你们给吃、给穿，我就不逃……”

浅色胡子笑了，皱了皱鼻子。

“想逃你也逃不了……我会派人盯着你呢。”他向押送兵转过脸去，说：“多尔贝舍夫，把这小伙子带到你们队去，给他一些日

用的旧东西。就让他坐在你们车上。好好看住他，暂且不要发枪！”

他拍拍彼得的肩膀，摇摇晃晃地回屋里去了。

第二天中午，他们离开了镇上。彼得坐在垂着胡子的多尔贝舍夫旁边，在马车前座上摇摇晃晃，没完没了地想着自己苦恼的心事。

雨后，泥泞的路面让人一蹶，到处高低不平。马车颠簸着，摇来晃去。电线杆在路旁大步向后退去；道路蜿蜒着，没个尽头。

在大大小小的村庄里，到处是一片喧叫声，到处是男人的皱着眉头的目光和女人的悲惨的哀号……

第二大队同军团失去了联系，向米列罗沃的方向进发。实际上军团是在左边移动。

傍晚，多尔贝舍夫从车座下取出一个揉皱的面包，又切开一个西瓜。他一边啃着，一边给彼得扔了一些去：

“吃吧，老弟，你如今是我们的人了。”

彼得大口大口地吃了一块熟透的西瓜，还吃了一大块带有马汗味的面包。

多尔贝舍夫用短剑又胡乱切下一块西瓜，塞到彼得手里。

“不过我还信不过你呢！我总这样想，你会逃跑的！最好砍了你，就安生了！”

“不，大叔呀，你可别这样想。我干么要逃跑呢？或许，你们是为正义打仗……”

“嗯，是的，是为的正义。你怎么想的呢？”

彼得整了整眼上的绷带，说道：

“可是，既然为的是正义，那你们为什么要欺侮老百姓呢？”

“我们欺侮他们什么呀？”

“欺侮什么？什么都欺侮！你看，过村走店，你把庄稼人最后一粒大麦都拿来喂马了。可他们的孩子却没有吃的啦。”

多尔贝舍夫卷了一支烟，抽着说：

“这是大人下过的命令。”

“可是，要是他下命令吊死所有庄稼人呢？”

“嗯……看你把话头胡扯到哪儿啦！……”

多尔贝舍夫往头顶上喷出一大团烟雾，不再作声了。

宿营的时候，队长基留哈，就是那个拉手风琴的麻脸水兵，把彼得叫了去，挥舞着毛瑟枪说：

“你这个狗崽子，妈的不要命了，你要是再胡拉漫扯政治上的事，我就命令把你倒吊在车辕上……明白吗？”

“明白了，”彼得回答。

“得啦，快给我滚！你可得记住，独眼龙，再稍微有些什么，我可要剜出你另一只眼，再吊死你！……”

彼得这才明白，进行鼓动得十分小心。后来一连两三天，他竭力改变自己的行动：向多尔贝舍夫询问马赫诺大人的事情，打听他们到过哪些地方，可是多尔贝舍夫却守口如瓶，一直皱着眉头，用怀疑的目光看着他，只从咬紧的牙缝里迸出几个字来。可是，彼得的殷勤和恭敬感动了多尔贝舍夫（他本人也是古梁依波列人，跟马赫诺还是近邻），他开始高兴同彼得谈话了。过了一天，他就发给了彼得一支卡宾枪和八十发子弹。

这天傍晚，他们的连队停在科沙拉镇附近歇息。多尔贝舍夫从车上卸下马来，把一只水桶递给彼得，说道：

“小伙子，骑上马到柳丛那边去。那里有个池塘，打点水，咱们煮粥！”

彼得竭力克制住剧烈的心跳，骑上马，一路小跑，向池塘奔去。

“跑到池塘边，从那儿上山，很快就能逃走，”他闪了这样一个念头。

他跑到池塘边，绕过狭窄的、半倒塌的堤岸，把水桶轻轻扔下，用鞋后跟踢了踢马，飞快向小山上跑去。在宿营地附近砰地响了一枪，子弹从他头上掠过，好象警告他似的；彼得在暮色中目测了一下离宿营地的距离，大约有一里多路。

他心里想：“要是跑上山，准会吃子弹的。”他不得不调转马头，又从原路骑了回去。

多尔贝舍夫把一只盛着土豆的小铁锅，吊在车辕杆头上，瞧了彼得一眼说：

“你要是胡闹，我打死你！好好记住！”

七

天刚亮，一片闹哄哄的喧嚷声就吵醒了彼得。他一醒来，就一下把盖着过夜的马衣掀到了车下。在秋日的淡蓝色的天空下，滚动着断断续续的叫嚷声。

“大叔，这是什么闹声呀？”

多尔贝舍夫直挺挺地站在车座上，挥动着毛茸茸的高筒皮帽，涨红着脸大喊：

“大人万岁！……乌——啦——！……”

彼得欠起身，看见一辆套着四匹黑马的轻便敞车，在大路上奔跑着。马喷着一团团白色的涎沫，周围都是骑兵；在车尔尼雪夫斯克附近受伤的马赫诺本人，腋下支着拐杖，紧抿嘴唇——不

知是忍着疼痛，还是在微笑。一条毯子从车后面一直拖到地上，灰尘象乱蓬蓬的头发，挂在马车的后轮上。

马车一闪而过。一分钟以后，只有灰尘在远处的道路上飞扬着，嘈杂的喧闹声已经消逝了。

八

过了三天，第二大队向铁路进发。沿途没有发生过战斗。小股的红军部队向顿河退去。彼得跟整个连队的人都认识了：在一百五十来个人中间，有六十多个人是投降过来的红军，其余都是胡乱拼凑起来的。

一次在宿营的时候，人们聚集在篝火边，在手风琴的伴奏下跳起了快步的顿足舞。刚结上薄冰的地面，在脚下发出咯嚓咯嚓的单调的声音。

多尔贝舍夫沿着圆圈蹲腿蹦跳着，用手掌把落满灰尘的皮靴筒拍得“啪啪”作响，他呼哧呼哧地喘着气，象一匹被赶得累坏了的马。

后来，大家把大衣和皮袄铺起来，围着篝火躺了下来。机枪手曼茹洛一边拿起一块烧着的木头对火抽着烟，一边说：

“在我们中间有这样一种说法：大人要带领我们通过矿区，到罗马尼亚边界上去。在那里，他要扔下部队，一个人跑到罗马尼亚去。”

“这是胡说八道！”多尔贝舍夫嘟哝着。

曼茹洛发火了，大骂起了多尔贝舍夫，用手指着他大嚷道：

“瞧他，傻娘儿们的姘头，对他有什么办法！你这条猪尾巴，你以为，他会让你坐他的车吗？……”

“他不会扔下部队的！……”多尔贝舍夫愤怒地大声嚷道。

“死榆木疙瘩脑袋！……烂婊子养的！……要知道，罗马尼亚皇帝是不会放你两万人马过境的！”机枪手气得脸色发白，大声嚷道。

他的话得到了大家的支持。

“你说得对！……”

“说到点子上了，曼茹洛！……”

“咱们只要能为大人和他带着的那些婊妇们流血，他就需要咱们……”

“呵——呵——呵！……哈——哈——哈！……再给他来几句，老兄！”篝火的上空腾起一片喧嚷。

多尔贝舍夫站起身来，匆匆向连长的炮车走去。人们在他后面吹着刺耳的口哨声，嘘嘘地戏弄着他，不知是谁，还向他投去了烧红的劈柴。

“他去拨弄是非去了……哼，好吧，一打起来，咱们给他后脑勺一枪！”

彼得看见，连长基留哈向篝火走来。他走到火堆旁，又向后退了一些。

“小伙子们，你们怎么啦？谁想绞索呀？……哪个人想在电线杆上打秋千啊？喂，说说呀！……”

曼茹洛从地上欠起身来，走到连长对面，气喘嘘嘘地说：

“你啊，基留哈，别做得太过分了！过分了，可是祸福难测啊！……还是夹住你那下流的舌头吧！”

“喂，到司令部去！”

基留哈抓住了机枪手的袖子，周围哄哄喧嚷了起来。人们一咕噜从地上爬起，一下子把连长围了个水泄不通，在他身后形成了一道毛茸茸的皮高筒帽的墙。

“不准动！”

“我们揍你个七窍出血！”

“我们把你跟司令部掀个底儿朝天！”

人们动手推搡基留哈，不知是谁挥起手臂，响亮地打了他一个耳光。连长的蓝长衣的领子，咔嚓一声，给扯破了。步枪的枪闩咔嚓地响了起来。连长拼命挣扎，发出了呻吟一样的叫声：

“造反了！……叛变……”

机枪手伸手捂住他的嘴，小声在他耳边说：

“滚开，闭嘴……当心背后吃子弹！”

他推开挤成一堆的人群，把他带到第一辆马车前，又回到了篝火旁。

又爆发了一阵哄笑声。手风琴尖叫着，跳舞的人嘤咛嘤咛地顿着鞋跟。在马车旁边，人们把多尔贝舍夫掀倒在地，用宽腰带塞住他的嘴，又是枪托打，又拿脚踢，折腾了他好一阵子。

第二天，从司令部跑来一骑传令兵，交给连长一张油渍斑斑的便条。便条上用黑铅笔潦草地写着十来个字：“命令你连攻取苏维埃农场。”

九

从小山岗上望得见苏维埃农场。在蜿蜒的白色石头围墙后面，是一座座浑砖的建筑物和一个高大的砖瓦厂的烟囱。

这个连把马车扔在路上，成链条形撒在田野上，向农场包抄而来。

连长基留哈脸上包扎着女人的绒毛头巾，骑马走在前头。他骑

的这匹黑母马老是颠蹶着。他不时回头望望默默走在后面、变得越来越稀的队列。

彼得走在左翼第七排。不知为什么，他总觉得今天马上就要出现什么重大事情似的。由于这种期待，他感到喜滋滋的，越来越高兴。

当他们靠近农场，听到迎面枪响的时候，连长跳下马来，喊道：“卧倒！”

他们在一条小山沟附近疏散开来，卧倒在地上。大家七零八落地向着石头围墙射击。一挺机枪在农场的屋顶上嘶哑而迟疑地响了起来。院子里站立着一些人。子弹落在包围圈的后面，在地上掀起了一团团渐渐消失的灰尘。

这个连三次进攻，三次都被打退到了小山沟里。最后一次，当彼得跑回来的时候，看见多尔贝舍夫仰面躺在土拨鼠洞旁边。他弯下腰一看，发见多尔贝舍夫的前额上，在高筒皮帽下边，有一个洞。彼得一下明白了，这是自己人开的枪：几乎是顶着脑门，射在眼睛上方的。

第四次进攻时，连长基留哈从刀鞘里抽出弯曲的高加索马刀，用草黄色的眼睛扫视一圈连队，嘶哑地喊道：

“小伙子们，前进！……跟我来！……”

但是，小伙子们在原地一动没动，却低声嘀咕了起来。机枪手曼茹洛拉出枪闩，大声喊道：

“你带我们去屠杀吗？我们不去！……”

彼得感到手指冰冷，浑身冒出了粘腻的汗液，他用撕裂的声音喊道：

“弟兄们！……你们为什么要流血啊？……是为了去送死，去杀害象你们一样的劳苦人民吗？……”

人声平息了。彼得一下子感觉到他手中的枪带让汗浸湿了。

“弟兄们！……让我们都放下枪吧！……每个人都有家……难道你们都不可怜老婆孩子吗？你们想一想吧，要是你们被打死了，他们该怎么办呢？……”

连长从皮套里抽出了毛瑟枪；彼得提防着他这一手，端起步枪，几乎没瞄，对着他那件敞怀的蓝长衣就是一枪。基留哈象陀螺似的，一旋转，手抱着胸脯，躺到了地上。

人们围住彼得，从后面用枪托打他，推搡他，把他掀翻到了地上。可是，机枪手曼茹洛伸开双臂，向他俯下身去，厉声喝道：

“站住！……不要把小伙子打死！……站住，让他把话讲完，再干掉他！……”

他把彼得从地上拉起来，摇了摇他：

“你说吧！”

地面和乱蓬蓬撮成一团的天空，在彼得眼前飘浮着旋转起来。他提起劲头，说道：

“你们打死吧！……反正一死！……”

后面的人们厉声喝道：

“大声些……什么也听不到！”

彼得拿袖子擦了擦流到太阳穴上的鲜血，提高嗓门说：

“你们想一想道理吧。马赫诺把你们带到罗马尼亚边境，就会扔下的！……他只是现在用得着大家！……谁愿意当奴隶，那就跟他去吧，剩下的人也会让红军消灭掉的。可要是现在我们就投降，那就什么事儿也不会有了……”

山沟里很湿。一片寂静。大家费力地喘着气，好象缺乏空气似的……

风在地面上空把乌云低低地铺展开来。一片寂静……寂静

.....

机枪手用手擦了擦前额，低声问道：

“喂，怎么样，小伙子们？……”

一个个低垂着脑袋。在旁边，连长基留哈在打穿的胸膛上撕着衬衫，最后蹬了一下脚，就哆嗦着，安静了下去。

“谁乐意投诚，靠右边走！谁不愿意，向左边去！”彼得喊了一声。

机枪手决绝地把手一挥，跨到了右边。跟着他，一大批人慌慌忙忙地涌了过来。只有七八个人留在原地没动，他们犹豫了一会儿，也走了过来。

五分钟以后，他们通过狭窄的山沟，向农场走去。彼得和机枪手曼茹洛走在最前面。彼得在生锈的刺刀上挑着一件撕破的白衬衣，当作旗子。

从农场的大门里涌出了一群人。他们端着步枪，不信任地望着走来的人。

在离农场大约三百步的地方，前去投诚的这连人停了下来。彼得和曼茹洛放下步枪，单独向农场走去。有两个农场的人也向他们迎面走来。双方在半路上会合了，稍微谈了一会儿。一个大胡子的农场人员拥抱了彼得。曼茹洛擦了擦胡子，同另一个人交叉地接了吻。

两边都发出了喝采声。全连把步枪哗啦啦地扔作一堆，三五成群地走进了农场敞开着的的大门。

十

肃反委员会的特派员，乘马从区里来到了苏维埃农场。他识

问了一番彼得，把口供记入本子，握了握他的双手，便离开了。

一部分原来的马赫诺分子，编入了追剿马赫诺的红军骑兵团，剩下的人到区军事委员部去了。彼得留到了农场。

经历这一切事件之后，安静地躺在病床上是多么惬意呵。仿佛空眼窝里刀割一样的疼痛减轻了。仿佛彼得从来没有被人用套索拖过似的，也从没有被人打得死去活来过……不久前发生过的事情，不知怎的竟没有留在记忆当中，彼得也不想再去回忆这些事情了。

可是，在农场俱乐部里，当彼得从一面破碎的镜子跟前走过时，无意中看见自己这副土灰色的，残损不全的面孔时，他伤心得抽搐着嘴唇，呼吸也变得吃力了。

星期二傍晚，农场的支部书记来到彼得的房里。他在床上靠着彼得坐下来，盘起穿着皮靴子的长腿，咳嗽了两声，说道：

“过一个钟头到俱乐部去开大会。”

“好吧，我去。”

书记坐了一会儿就走了。一个钟头之后，彼得坐在俱乐部里。他听着农场主席、农艺师、砖瓦厂经理和兽医等人的报告。通过各种统计数字，在彼得眼前展现出了一幅秩序井然的、象钟表一样有节奏的生活的图画。

作记录，制订决议，表示愿望。

在讨论当前工作时，支部书记请求发言：

“同志们，共青团员克列姆涅夫·彼得现在就住在 我们农场里。大家都知道，我们很感激他，因为他保全了我们农场，避免了一场破坏。支部建议送克列姆涅夫到区里去治疗，然后安排在我们工厂工作。让我们来表决，谁赞成？”

一致同意，没有人持反对意见。但是彼得从凳子上站起来，禁

不住一滴滴浑浊的眼泪，从空眼窝里流到面颊上来。彼得抽动着嘴唇，站了一会儿，用眯缝着的一只眼环视了一下会场，吃力地转动着不听使唤的舌头，说道：

“谢谢同志们，但是我不能留在你们这儿……我很高兴能同你们一块工作……可是，问题是……问题是，你们这里的生活已经走上轨道，可是在那边……在我来的那个镇上……生活还没有就绪，事情才刚刚办起来，组织了支部，现在或许有许多人牺牲了……被马赫诺匪徒杀害了……我还想到那里去……那里非常需要干部……”

大家都沉默了。所有的人都没有异议。俱乐部里一片寂静。

十一

农场几乎所有的人都来给彼得送行。当彼得同大家道了别，爬到山上的时候，天色已经昏黑了。夜幕渐渐罩住了道路的上空，渐渐升上了一排排沉默不语的电线杆子的梢头……

格特曼大道沿着顿河，在层峦叠嶂的群山之上蜿蜒着。彼得默不作声地跨着步子。

在粘滞的黑暗中，在深夜的空旷的寂静中，脚步声显得格外响亮。霜在脚下飒飒作响。马蹄踩成的坑坑洼洼，已经结了一层薄冰。冰在脚下断裂开来，发出清脆的响声，冰下的积水噗哧噗哧，飞溅起来。

桔红色的月亮，从守候在大道旁的墓冢后面，冉冉升起。投撒在草原上的阴影歪歪斜斜，飘忽不定。大道上一片银白，薄冰上泛出蓝黝黝的反光。

彼得默默地迈起步子，张大口贪婪地吸着空气。路旁枯萎的

艾蒿，散发着苦涩而刺鼻的臭味……

道路弯弯曲曲地延伸着，没有尽头。但是，彼得迈着坚定的步伐，迎着越来越深的夜，大踏步向前走去。在暗蓝色的天穹中，一颗五星向他闪烁着晶亮碧透的光。

(1925年)

“两个丈夫”

在山岗上，在由电线杆组成的稀稀落落的栅栏后面，树林在上面象长着鬃毛的脊椎骨一样，控背拱肩地蜿蜒着。这里的树林有卡恰洛夫村的，阿塔曼村的，还有罗戈任村的。一条干涸的山谷，一坡长满毛蓬蓬的荆棘，这面坡正靠着卡恰洛夫村。村子里低矮的房屋延伸开去，几乎紧挨着卡恰洛夫集体农庄的建筑物。

卡恰洛夫农庄主席阿尔谢尼·克柳克温，站在土拨鼠山旁边，两腿撇得宽宽的，身体微微向前弯曲着。风吹动他身上没束腰带的衬衫，细小的汗珠不住从前额往鼻梁上淌。站在旁边的阿尔乔姆大爷，把粗糙的手掌架在前额上，望着拖拉机怎样在散发着泥土香的土拨鼠洞后面，把黑土的处女地翻成光闪闪的土块。从早上起，转眼之间已耕完了四俄亩。今天是第一次试耕。阿尔谢尼因为高兴，喉咙里象梗着一块甜滋滋的树脂一样。他望着拖拉机的弓起的背影，一直把它目

送到地段的尽头，这才舔着热得发干的栗褐色嘴唇，说道：

“你瞧，阿尔乔姆大爷，真是拖拉机行呀！……”

老大爷哼哼哧哧地呻吟着，在高低不平的垅沟里磕磕绊绊地走着，一边走，一边把一块黑油油的泥土捏在深褐色的骨节粗大的拳头里，又在手掌里研成碎末，向阿尔谢尼转过头去，把帽子往犁过的地上一摔，用哭样的声音大喊着：

“我太受不了啦！整整五十年来，我干活儿靠牛，牛过活靠我……白天耕地，夜间喂牛，连睡觉的工夫也没有……还得照料干瘦的牲口过冬……可如今让我怎么忍受得了？”

老大爷用鞭竿指了指拖拉机，痛苦地摇了摇头，把帽子一戴，头也不回地走了。

太阳落到小山岗后面过夜去了。春日的暮色，匆匆罩上了草原。司机从拖拉机上跳下来，用袖子揩了揩脸颊上的灰白色的尘屑。

“该吃晚饭了。回家吧，阿尔谢尼·安德烈耶维奇。这工夫娘儿们都挤好奶了，你去把鲜奶拿来吧。”

阿尔谢尼沿着低矮的冬麦田向住区走去。一从山沟里往小岗上登去，他就听见大车的吱扭声和一个女人的哭诉声：

——戛，该死的！叫我拿你们怎么办，这些魔鬼？戛，戛！
……

两头套在大车上的公牛，站在路旁被晚露打湿的粘土地上，一动不动。汗淋淋的牛背上冒着热气。一个年轻女人在四周急得跳来蹦去，无济于事地挥动着鞭子。

阿尔谢尼走到了旁边。

“过得好吧，嫂子。”

“谢天谢地，阿尔谢尼·安德烈耶维奇。”

一阵快乐的热流涌上阿尔谢尼的心头，他的两膝嗦嗦颤抖了

一下。

“是你呀，安娜？”

“是我。这些牛折腾得我好苦啊，怎么也不肯走……真倒霉死了……”

“你从哪儿来？”

“从磨坊那儿来。装的是黑麦，可牛就是站着不走。”

这对阿尔谢尼来说，不费吹灰之力。他把大衣从肩上一扯，扔到这女人手里，笑着说：

“帮你赶车，肯酬谢吗？”他直勾勾地盯着她的眼睛瞧了瞧。

这女人避开他的眼睛，把头巾往前拉了拉。

“看在上帝面上，帮帮忙吧！……以后好说的……”

阿尔谢尼今年二十六岁，有的是力气。他把六袋黑麦扛到山岗上，大汗淋漓地走下山沟来，坐在大车上，喘着气。

“喂，要是听不到丈夫的消息，怎么办呢？”

“那些从海外，从弗兰格尔那儿回来的哥萨克念叨，他死在土耳其了。”

“那你打算怎么过呢？”

“还是这样吧……嗯，我该走了，耽搁晚了。谢谢帮忙，阿尔谢尼·安德烈耶维奇！”

“光谢谢管什么用……”

阿尔谢尼的嘴唇上漾着微笑；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弯下腰去，用左手紧紧抱住蒙着白头巾的脑袋，用嘴唇紧紧压到了颤栗着的有些发凉的唇上，一只带着刺人的老茧的手灼烫着她那羞涩的发痛面颊。安娜挣脱了出来，整理了整理歪斜到一边的头巾，用哭丧的尖嗓子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你真不害臊，下流痞！”

“嗨，嚷嚷什么呀？”阿尔谢尼压低嗓子说。

“我是有男人的呀！这太丢脸啦！你找别人去吧！……”

安娜扯住牛的缰绳，在路上大声吆喝了一声，——可声音里满含着泪水：

“你们这些公狗，都是一类货色！……喂，戛，该死的！……”

花园披上了一身新娘的浓装，盛开的粉红色鲜花吐着醉人的芳香。在卡恰洛夫的池塘里，在越冬的芦苇丛中，在一堆赤褐色的滑溜溜的木块旁，每逢这醉人的春夜，青蛙在咯咯地合唱，鹅群在哦哦地低诉爱情，水面上也拉起了一面雾霭的帷幙……白天，天气很晴朗。卡恰洛夫农庄主席阿尔谢尼高兴得象春日的阳光，因为土地不会再白白荒芜下去了（有了拖拉机），——可是寂寞的烦躁仍然箝制着他的心，使他难以忍受……已是第三天不等公鸡报晓，阿尔谢尼就起身了。他来到风磨跟前的牧道上，在轧轧响的码头旁坐下来。让婆娘们明天说长道短去吧，让农庄的孩子们向他恶毒地挤眉弄眼，当面嘲笑他吧，只要能见到她，只要能向她诉说一下心事：自从秋天在打谷时候同她一块用叉子打麦垛起，不论工作，不论世界，对他都再也没有吸引力了……

他从老远处就发现了那条白色的三角头巾。

“你好，安娜·谢尔盖耶夫娜！”

“你好，阿尔谢尼·安德烈耶维奇。”

“有几句话想跟你说说。”

她扭过头去，生气地揉着头巾。

“当着人也该知道羞耻啊！……在牲口道上有什么话可说的？……娘儿们见了，脸往哪儿放呀！……”

“让我说说吧！”

“没工夫：母牛跑到玉米地里去了！”

“等一等！……我求求你，天一黑，到赤杨树林来，有事情……”

她把脑袋埋在肩膀里，连头也不回地走开了。

……赤杨在不停地拥抱，繁茂的黑莓在交钩着枝条的臂膀。就在这赤杨林旁边，每逢夜晚，大雷鸟在发出求雌的啼叫，雾霭在青草上编织出曲曲弯弯的花边。阿尔谢尼一直等到天黑下来。当泥土在山上沙沙作响，从来人的悄悄挪动的脚步下撒落下来的时候，他感到一阵手指发冷，额上也冒出了粘湿的汗液。

“那一回我欺负你了吗？甬这样了，别生气了，安娜！”

“没有丈夫的，老让人这样……”

“嗯，我这会儿想同你谈件事……你守着寡，不需要个老爷们儿……或许，你就嫁给我吧？我会心疼你的……嗯，瞧你真怪，哭什么的？对你们娘儿们，真没办法！……要是你还怀疑你丈夫的消息，那要是他回来，我也绝不会强迫你……你要是乐意，就跟他去……”

安娜坐在旁边被露水打湿的泥土地上。她低低地垂头坐着，用一根干枯的草秆在地上划着看不见的花纹。

阿尔谢尼怯生生地搂抱着她。他害怕象上一回在田野里那样，她会挣脱出去，叫喊着，骂一些难听的话；可是，当他往她眼睛里一瞧，在她头巾的阴影下，看到的却是未干的泪痕和微笑。

“嘿，什么都甬管啦！……咱们去登个记，你就到我们集体农庄干活来吧！……要不，你的苦日子要熬到何年何月呢？”

干旱。在村边的草地上，镰刀嚓嚓发响，惊起了布谷鸟。实实

在在的人们不是在割草，而是把草连根啃掉。在阿夫久什金凹地后面，集体农庄的拖拉机正拖着两台刈草机。尘土飞扬。天气炎热。一堆堆干草散落在草原上。太阳当头了，阿尔谢尼扔下草叉，抖掉衬衫上刺鼻的灰尘，走到田间宿营站去洗脸，正望见妻子安努什卡^①迎面走来。在二里外，从摇摇晃晃的，急匆匆的步伐里他就认出她来了。她是给刈草人送饭来的。走到跟前来，她的脸颊上泛着被太阳吻遍的红晕。

“累坏了吧，姐拉^②？……从家里到这儿二三十里路呢。”

“不，不很累。要不是天热，走这些路不算什么。”

他俩并排坐在草垛下面。阿尔谢尼用被草叉磨硬的手抚摸着安娜的手，他那笑咪咪的面容照亮了她的眼睛。

傍晚，她在门廊旁边迎接他，两手牢牢抓着栏杆，仿佛生怕摔倒似的。她从变得苍白的嘴唇里，艰难地挤出了一句话：

“阿尔休沙^③！……男人……亚历山大从土耳其寄信来了……说要回家了……”

世界上人各有命，有的人幸福无边，有的人命薄如纸……

卡恰洛夫的庄稼全给晒焦了，在黑褐色的田野上，庄稼穗子稀零零的，简直到了一竿子打不着的地步。而且完全不象是庄稼穗，就仿佛干草棵子一样，又矮又空，轻飘飘地在风中摇曳作响。可是，在卡恰洛夫村和阿塔曼村的树林中间，在沿着道路的那片集体农庄的楔形土地上——在那里，入秋以前，风一直在戏弄着一块写着“样板田”的松木牌子——库班小麦却长得有大种马的肚子那么高。人都各有自己的路线……卡恰洛夫村的小财

① ② 安娜的爱称。——译者

③ 阿尔谢尼的爱称。——译者

主亚舒罗夫(他有十二对耕牛、一群马、一架蒸汽脱粒机和一双什么都不放过的小耗子眼),打一开春,当卡恰洛夫的土地上落了一场雨,却只有很少一点雨水落到集体农庄的庄稼上时,他就用大黄板牙咬着长得象黑麦一样的大胡子尖,幸灾乐祸地说:

“上帝,他是睁着眼睛的呀……谁顺从他,信奉耶稣,谁就会得到雨,真真是这样的啊!……可你瞧瞧集体农庄的共产党员,活该受到惩罚!……太好了!……真是象人们说的,没有上帝,寸步难行!……”

他还说了其他一些不三不四的怪话。每当他在卡恰洛夫树林上面的路上走过,总要勒住他那光溜溜的花斑骟马,用鞭子指着那块被风吹得在木桩上跳动的木牌,齜着他那猪样的黄板牙,抖动着肚子,笑着说:

“样——板——田!……让它到秋天来作作样板吧!……”

拖拉机耕的地达到一膝盖深,卡恰洛夫村的人却照祖祖辈辈的老办法,马马虎虎地翻翻土了事。卡恰洛夫村的人每亩只能收八斗麦子,集体农庄却打到四担。卡恰洛夫村的人掩饰着心中的嫉妒,笑着说:

“真是人们说的,没有父母的孩子好养活……”

在九月的一个节日里,卡恰洛夫村的人开完村民大会,来到集体农庄的院子里。大家在堆满粮食的仓廩旁喧嚷着,围着拖拉机拿眼瞧瞧,用粗手摸摸,不时哼哼喀喀地咳嗽着,好久没有离去。阿尔乔姆大爷,这个地地道道的庄稼汉,在临走之前把阿尔谢尼拉到一边,将薰满烟草味的大胡子扎到他的耳边,咕哝着说:

“阿尔谢尼·安德烈耶维奇,我们对您提个请求。请您行行好,让我们大家都一块加入集体农庄吧!我们二十户都是贫穷人家呀……”

阿尔谢尼高兴地向老人们鞠了一个躬。

“欢迎，欢迎！……”

集体农庄的活儿忙得不可开交。这是一个干旱的年景。周围的村镇都出现了粮荒。卡恰洛夫村边的路上，成群结队地过着乞丐。他们也拐到卡恰洛夫村来。在描花的百叶窗旁，拉着有气无力的声音：

“行行好吧……”

一扇爬满苍蝇的窗户打开了，一个留着大胡须的脑袋向骄阳似火的街上瞅了一眼，嘟哝着说：

“过路的，都好好走开吧，要不我就放狗出去啦！‘积极’（集体）农庄就在那边，去向他们要吧！……他们成立了这个政府，他们就应当养活你们！”

集体农庄的木板大门被刨得光溜溜的，散发着树脂的香味。每天都有零散的和成群的人向这里涌来。

瘦削黝黑的阿尔谢尼绝望地摆着手说：

“我把你们往哪儿搁啊？到处人都满了！要知道，我也无法供养你们呀！”

可是，集体农庄的娘儿们却象受惊的蜂群一样，向阿尔谢尼嚷嚷着，往往弄得阿尔谢尼和庄稼汉们无可奈何地摇摇手，只好到打谷场脱粒去。这时，娘儿们就把客人们领到住区附近的长排仓廩里，于是，锅盆碗碟的叮当声不断从大厨房的窗子里传出来，直到掌灯时分。

有时候，仓库保管员阿尔乔姆大爷气喘吁吁地跑到打谷场上，丧气地啐着吐沫，用嘎哑的声音说：

“我可对付不了这些娘儿们啦！……阿尔谢尼，你可得想办法管管她们。她们领了一群老头来，从我身上把仓库的钥匙也给抢

走了！……她们做饭，拿去的麦子八个人也吃不了！……”

“大爷，管她们也没用！”阿尔谢尼笑着说。

集体农庄庄员增加了一倍。孩子的数量也多起来了。一部分劳力打完场，耕休闲地去了；另一部分在修建学校。

集体农庄的院子里，从早到晚熙熙攘攘。

机器在板棚里咝咝地响。电灯向扫得干干净净的院子里喷射着黄灿灿的亮光。月亮斜挂在卡恰洛夫村的上空，在电灯的亮光中变得白惨惨的；它这时仿佛蒙着一层绿幽幽的阴影，显得那样渺小而无用。

安娜是第二个礼拜轮班在牲口院里干活儿。她跟别的六个娘儿们一起给母牛挤奶、赶牛犊，然后回家睡觉。她往往不能很快入睡，总是翻来覆去，静听着阿尔谢尼均匀的呼吸，想到过去，也想到她目前在集体农庄里的生活。

从早晨起，天空就罩满一层瓦灰色的浓云。雷不时隆隆作响。在村边的草地上，白嘴鸦在啊啊喧叫，柳树在飒飒鸣响；在房边的小花圃里，狗尾巴花散发着醉醺醺的气息，尖叶子的荨麻低垂在地面上。在板棚顶后面，天空掠过了一个蜥蜴样的闪电，接着嘎巴巴响了一个炸雷，雨点打在棚顶，象跺脚似的咚咚咚响了起来。风在院子里卷起了黑褐色的尘柱，被旋风扯掉的百叶窗噼噼啪啪地发响；七月的暴雨，在一汪汪水洼里跳跃着，敲打起飞溅的水泡。

安娜披上头巾，跑到院子里取下晾干的衣物。风卷着雨在院子里奔腾，抽打在安娜的脸上。安娜跑到仓房附近，在她头顶上空炸了一个响雷，接着，轰隆隆细碎的雷声，一直传到卡恰洛夫村后面老远的地方。安娜惊恐地蹲下来，习惯地划了个十字，小

声祷告着。当她欠起身，向后一转，看见敞开的大门旁，停着一辆大车和一个身穿雨衣的人。这个人向后折回身来，露出白皙的牙齿笑着，透过风向安娜喊道：

“你怎么了，嫂子，叫先知伊里亚吓坏了？”

安娜拢起裙子；一边取下衣服，一边生气地大声说：

“龇出牙来卖的！谁也不买！”

穿雨衣的人象要滑倒似地，走到安娜跟前，带着讪笑说：

“看来你生气了，可生气生得没道理呀！……难道还要用祷告从雷电中得救吗？哎呀你，还加入集体农庄了呢？……”他说着，又把嘴唇收拢成了讪笑的样子。

安娜仿佛被这令人难堪的讪笑灼烫了一下。不知为什么，她感到有些害臊。于是，好象辩解似地回答道：

“我是不久前才加入的……”

“要是刚刚不久，那还罢了！”这人挥着从头上摘下来的便帽，走上了台阶。

安娜匆忙收了衣物，快步往房里跑来。她进了房，坐在穿雨衣那人旁边的阿尔谢尼说道：

“这是从城里到我们这儿来的老师。他要教所有不识字的人学文化呢。”

老师闪动了一下明亮的微笑的眼睛，安娜又感到一阵羞窘，她赶忙放好衣物，走了出去。

晚饭前，阿尔谢尼对她说：

“明天午饭后，去学文化吧。我也给你报了名。咱们这里总共有二十个文盲。你们都在俱乐部上课。”

“我可觉得害羞，阿尔休沙……要知道，我年纪很大了。”

“没有文化更害羞！……”

第二天，安娜上俱乐部去了。在长条桌后面，人坐得严严实实。阿尔乔姆大爷张大嘴巴，前额上渗出了汗珠。达里娅大婶把针线活儿搁在一旁，也在听讲。

老师一边讲解着，一边在黑板上写着又粗又大的粉笔字。

大家向吱扭响的门边斜了一眼，又俯到了桌上。安娜轻轻地走到窗跟前，在一条长椅头上坐下来。开头，她总觉得有些古怪，常常躲开别人暗自发笑；第二天就较能用心听了，竟执拗着性子在一张纸上写下了一个歪歪扭扭的、拱肩驼背的“B”字。

后来，俱乐部老是吸引着她，她常常急忙吃过午饭，腋下夹着识字课本，几乎一溜小跑，沿着走廊向课堂跑去。桌子后边坐得更拥挤了，因为新添了学生。阿尔乔姆大爷小声骂骂咧咧的，叉开胳膊肘，把达里娅大婶挤到了桌子的紧边上。从中午到天黑，俱乐部里总是一片低语声和压低嗓门的嗡嗡声。

用来作俱乐部的是一所宽敞的、有六扇窗户的房间。墙边立着一张桌子，上面蒙着一块红色的印花布；房脊里竖着一些画像和旗帜。

阿尔乔姆大爷到底把达里娅大婶从长椅上挤走了。她不得不从桌子移到了窗台上。房间里热烘烘的，好奇的太阳窥探着窗户。穿着花衣衫的苍蝇在玻璃上跳着舞，嗡嗡作响。房间里一片寂静。阿尔乔姆大爷一边往剩下的铅笔头上舔着唾沫，一边歪扭着张大的嘴，在用力写字。安娜被人们挤得紧紧的，给推到了一边。安娜旁边坐着玛尔法，这是一位四个孩子的母亲。她知道，孩子们在幼儿园里被照看得很周到，因此，两眼全神贯注在识字课本上，大粒大粒的汗珠象豌豆一样，从鼻梁往上嘴唇上直滴；她拿袖子抹抹，有时还用舌头舔舔，再动动嘴唇，把死乞白赖的苍蝇轰跑。

安娜的心不时突突直跳。现在，她第一次能整个词儿整个词儿地读出来了。她把字母一个、两个、三个地拼在一起，由先前不明白的弯弯曲曲的笔画组成一个词儿。她从旁边推了一下邻座：

“你瞧，成了个‘农—民’。”

老师用粉笔敲了敲黑板。

“肃静！读时别出声！喂，阿尔乔姆大爷，给我们读一遍今天的课！”

老大爷用手掌把识字课本紧紧地按在桌子上，清了清嗓子：

“我—们……稀—饭……”

玛尔法忍俊不禁，噗哧一声捂住嘴笑了。

阿尔乔姆大爷恶狠狠地瞟了她一眼。

“我—们……稀——饭……好——……”他又从头读了起来。刚读了几个音节，两手往外一摊，说道：“请说说，这怎么拼！”

老人乱翻着书，低声对玛尔法说：

“不行了，老嫂子，我老不中用了！……年轻时候，我平常使唤槌枷，能连打三场谷，一点也不在乎，可如今，你瞧瞧，只念了一会儿书，就累得要命。气喘吁吁的，象往高山上拉车！”

安娜对工作已经习惯下来。她按周轮班，一星期在厨房，一星期在畜栏。在打谷场上，脱粒机突突突地发着响声，工人们忙得东奔西跑。阿尔谢尼蒙着一身麦芒和灰尘，正在堆麦垛；中午，他跑到厨房，大声喊了一声安娜：

“安娜，你身体好些了吧，去打谷场上帮帮忙，替换一下玛尔法·伊格纳托夫娜”。

他一边帮着安娜往麦垛上爬，一边照她背上啪地拍了一下，笑道：

“好啦，胖子，赶快接叉！……”说着，他又了一叉脱过粒的、散发着清香味的麦秸，猛一用力，扔了上去，安娜顺手接了去。阿尔谢尼往她身上扔着麦秸，起初埋到膝盖深，后来加到齐腰深；他嘴合不拢地笑着，从下面往上望望，喊道：

“给这儿加一叉！往那里垛！……看出毛病了吗？……”

安娜的创痛在日常的工作中平息了下来，时日一久，也渐渐愈合了。她不再去思索一个丈夫会不会回来的事和以后会发生什么……夏天象短暂的闪电一样，一闪而过……秋天已弓腰驼背地来到集体农庄的门口。每天早晨，孩子们象一群撒出去的小马驹，抱着蹶子向学校跑去。

在一个寒冷的蛛丝飘动的秋日，一大清早，安娜的丈夫亚历山大用榛树枝轰开狗，走上了台阶。他高高的个子，黑黑的皮肤，穿着一件破大衣。咔嚓咔嚓地响着鞋跟，走过门廊，推开门，也不问一声好，就站到了门口。他简短地、开门见山地说：

“安娜，我来叫你回去。收拾收拾吧！”

安娜从柜子边跑到床跟前，用不听使唤的手指一会儿抓抓这个，一会儿拿拿那个；她从衣架上扯下冬用头巾，沉重地坐下来，把目光从阿尔谢尼身上移到丈夫身上，然后费力地蠕动着嘴唇说：

“我不走！”

“你不走？……咱们走着瞧！……”亚历山大歪着嘴冷笑了一声，耸耸肩，走了出去。随手小心地、紧紧地掩上了门。

在漫长而阴郁的秋天里，安娜常常病恹恹的，脸色萎黄，不知道是由于病，还是为着心事。礼拜六晚上，安娜同娘儿们一起挤完牛奶，把小牛赶到棚里，一数，发现少了一头小牛，便出去寻找。她走过村边的草地，路经在雾霭中打盹的风磨，来到草原

上。在古老的被遗弃的墓地上，在长满青苔的十字架和散发着腐烂气味的下陷的坟墓中间，集体农庄的那头小花牛正在吃草。她在浓重的暮色中仔细辨认着道路，把牛赶回家来。走到沟渠旁，她坐下来，双手紧紧按住胸脯。伴随着怦怦的心跳，听到腹内一个东西的撞击和骚动……她费力地站起来，嘴角泛着疲惫和期待的微笑，向前走去。

花园全都光秃了，风在杨树梢下掠过，在脚下吝啬地铺了一些泛红的叶子。安娜走到亭子跟前，看见一个人从荆棘丛中出来，站着挡住了道路。

“是你吗，安娜？”

她从嗓音上听出来是亚历山大。他佝偻着腰，张开两臂，向她走来。

“咱们那六年一锅吃、一床睡的日子，看来你全给忘了吧？……大兵老婆的苦日子，倒让你丧了良心啦？唉呀，你这不要脸的！”

安娜满以为，他会马上把她掀翻在地，用钉过掌的军靴踢她，就象他们当年一块过日子时那样。可是，亚历山大突然跪倒了。跪在散发着泥土香的湿泥地上，两手向前伸着，瓮声瓮气地说：

“安努什卡，可怜可怜吧！……难道我没有疼过你吗？我不是象照顾小孩一样照顾过你吗？……你还记得吧，经常是，我妈妈骂你，我还用难听话说她呢？难道忘记咱们的恩爱啦？我从国外回来，只有一个念头：想看到你……可你……唉呀呀！……”

他吃力地站起来，挺直腰身，沿着荆棘丛头也不回地走了。在拐弯处，他回过身来，嘶哑地叫道：

“可要记住我的话！……要是你不回到我身边来，不抛掉你那

个野汉子，那我可要给你好瞧的啦！……”

安娜站了一会儿。她在心里对他，对这个与她在同一个屋檐下过了六个年头的人，产生了怜悯之心……从那时候起，这种心思就与日俱增。安娜常常沉思默想，回忆起往事，她不愿意从记忆中翻寻丈夫把她打得死去活来的那些争吵不休的日子，而只是回忆着微微溅起欢乐的浪花、值得高兴愉快的那些事情，因此，她的心不禁对往昔的日子和亚历山大倾注着一股感情的暖流，而阿尔谢尼的形象却渐渐退到后面，变得暗淡模糊了……

阿尔谢尼从她身上已经认不出原来的安娜了。她开始对他少言冷语，总是仰着腰身进去，挺着肚皮出来，默默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也回避着外面的娘儿们。阿尔谢尼越来越多地发现，她在用憎恨和痛苦的目光注视着他。

半夜间，在阿夫久施金谷地附近的草原打谷场上，集体农庄的三堆干草让人烧掉了。头遍鸡叫之后，鞋匠米特罗哈只穿着一件衬裤，从厢房里向阿尔谢尼的住处跑去，咚咚地敲着结满冰花的窗子：

“起来吧！……干草失火了……有人放火啦！”

阿尔谢尼没有穿衣，就一跃而出，跳到了台阶上。他透过参差不齐的樱桃林，瞭望着草原，咬牙切齿地痛骂着。在山岗后面，在一片蓝色的雪地上，一根血红色的火柱在风里摇拽着，一直升腾起来，触到了天上的月亮。阿尔乔姆大爷从马厩里牵出一匹小母马，套上笼头，用肚子紧压着尖尖的马脊梁骨，气喘嘘嘘地跨上去，一溜烟地向失火的地方跑去。他路过台阶时，向阿尔谢尼大声喊道：

——这是在发泄仇恨呀！……我那匹灰斑马，还有别的牲口

……现在要饿死了！……只能把尾巴扎个结，赶到外面放去了！

……

赶天亮，阿尔谢尼来到了失火现场。在一堆烟雾腾腾的灰烬周围，光秃秃的地面上冒着水汽；青青的小草无所顾虑地东张张西望望。

阿尔谢尼蹲下来，仔细察看着地面：在潮湿的土地上，在消融的雪面上，留着打过掌的英国皮靴的痕迹，钉帽压出来的小坑，象黑麻点似的，密密麻麻。阿尔谢尼一边抽着烟，一边仔细观察着草原上一行零乱脚印，迈步向卡恰洛夫村走去。脚印先兜了几个圈子，接着就消失了；后来，在一块长条形凹地上，有人蹭着冰面滑行的痕迹，——阿尔谢尼循着人的脚印，象追踪野兽似地，默默地、满怀信心地向前走去。在尽头的打谷场附近，在亚历山大家的篱笆边上，脚印消失了……阿尔谢尼用舌头啧啧了两声，把父亲传给他的后膛枪换了换肩，顺路向集体农庄走去。

接生婆在滑溜溜的小身体上拍打了一下，在水桶里洗了洗手，向隔壁喊道：

“阿尔谢尼，听到了吗？你女人生了个小共产了！……过来吧，你不给他洗礼吗？……”

阿尔谢尼默默地拉开了印花布床帐，脸色发青的安娜，用充满憎恶的目光从沾着血污的被子下望了他一眼，吞着眼泪，怨声怨气地说：

“走开，讨厌的！……我看不见你才好呢！……”

她转向墙去，哭了起来。

生活本来象铺好的大路一样平坦，可如今一个苦咸苦咸的硬

块梗住了喉咙，痛苦象狼爪似的紧紧抓着阿尔谢尼的心。

过了两三天，阿尔谢尼到谷仓去打剩余的黍子。大家忙着装机器，一直忙到傍晚，等机器开动的时候，夜已从黑魆魆的白杨树后面降临了。

“阿尔谢尼·安德烈耶维奇，出来一会儿！……”

他走了出去。在板墙旁边，他看见安娜蒙着披肩在等他。

“你怎么啦，纽拉？”

从陌生而嘎哑的声音里，他几乎听不出是妻子的嗓音：

“我用基督的名义，求求你……放我回丈夫那儿去吧！……他叫我回去呢……他说，让我带上孩子……可你，阿尔谢尼·安德烈耶维奇，甭记恨我，也别强留我！……我反正要走，我不再爱你了！”

“先把孩子奶大，然后你再走，我不强迫你……可孩子我不给你！我为苏维埃政府拼死拼活，打了四年仗，弄得浑身是伤，可你的丈夫是个立宪民主党分子……从弗兰格尔那里回来的……我的小子长大了，去给他扛长活儿……我可不答应！……”

安娜走到紧跟前，热气呼到了阿尔谢尼的脸上：

“你不给孩子？……”

“不给！……”

“不给吗？！”

阿尔谢尼的心被怒气胀得鼓鼓的，他同安娜同居以来第一次握紧了拳头，想向那双对他燃烧着仇恨的眼睛一拳打去，但他压制住了自己，只低声说：

“等着瞧吧，安娜！……”

晚饭后，安娜给孩子喂过奶，就包上头巾出去了。好半天不

见回来。阿尔谢尼俯在凳子上，修着马颈圈。听见门吱扭一声，他连头也没回，凭着脚步声，听出是安娜。她走到摇床边，换了尿布，不声不响地躺下睡觉。阿尔谢尼也躺下了。他翻来覆去地睡不着，只听见妻子断断续续的呼吸声和不均匀的心跳。半夜，他才入睡。梦魇把他窒息得喘不气来……他没有听见，鸡叫头遍后，安娜怎样象猫一样从床上爬起来，黑着灯，穿好衣服，用头巾把孩子包上，没让门出声，便走了出去。

安娜在亚历山大家庭里过了一个多月的日子。起初是怯生生的快乐，只是偶尔偷偷掉几滴泪，怀念集体农庄那无拘无束的生活。后来，公公就恶声恶气地抱怨起来：

“引回来一个荡妇……我们家里还没有过共产党的臭气……接回来一个白吃饭的，还带一个小野种！……得抓住脖子把他们轰出去！……”

亚历山大只是头几天还算温存些。可是，装点着温存的那些日子一过，让人喘不过气的劳累就来临了。丈夫把全部家务活儿堆在安娜身上，自己却经常到村边酿私酒的那个女商贩卢什卡那里去鬼混。从那里醉醺醺地回来，往往把墙壁和地板吐得不堪收拾。他把高加索毛皮高帽推到后脑勺上，四肢伸开，懒洋洋地半卧在长凳上，一直躺到天亮；还不断打着酒隔，得意洋洋地捋着胡须，用浓重的鼻音说道：

“你以为你自己怎么样，安娜？没有受过教育，一摸黑儿，傻头笨脑。咱可见过世面了，到过外国，知道上等人的礼节！……难道我真的非要你这样的女人作老婆吗？……对不起……哼，随便哪个将军的女儿都肯嫁我呢！……有好几次，在……嗨，说这干什么！……反正你不明白！……那些赤色匪徒，最好到外国去

瞧瞧，那里才真正有出色的人才呢！……”

说着就在长凳上睡着了。早晨一醒来，就哑着嗓子大喊大叫起来：

“婆娘呢！……脱靴子！……你这个贱货，应当尊敬我，因为我养活着你和这个小崽仔！……你哭丧什么？……要挨抽吗？……当心些，要不，我马上给你个厉害瞧瞧！……”

二月的一个融雪的阴沉沉的日子，警察局的人敲了敲亚历山大家的小窗：

“主人在家吗？”

“在家，进来吧。”

警察局的人走了进来，把被狗咬坏了的一根拐杖放在柜子上，从怀里掏出一张沾着油渍的纸，小心地把它铺展在桌子上。

“马上到会场去！……我在编花名册，赶快签名！……”

安娜走到桌子跟前，在警察局的纸上签了名。丈夫惊异地扬起眉，问道：

“你是啥时候学会写字啦？”

“在集体农庄的时候。”

亚历山大默不作声，等警察局的人走后掩上门，厉声说道：

“我去听听苏维埃的鬼话，你拾掇拾掇牲口，安娜。别去揪黍秸，让我看见了，就抽你嘴巴！……养成什么习惯了……冬天还有两个月呢，可你已把那堆草喂了一半了！”

他哼哼着鼻子，扣上短大衣。从毛蓬蓬的浓眉下，露出怪吝的当家人的目光……安娜在炉子边迟疑了一阵，侧着身走到丈夫身边。

“沙尼亚^①……或者，我也去……开会吧？”

“上——哪儿？”

“开会。”

“干什么去？！”

“听一听吧。”

亚历山大的面颊渐渐胀得红彤彤的，嘴角颤抖着，右手向墙伸去，摸索着挂在床头的鞭子。

“你干什么，丧家的母狗，想让丈夫在全村面前丢人吗？……你啥时候才能从脑袋瓜子里丢掉共产党那一套？”他把牙咬得咯嘣响，握着拳头，向安娜跨过去……“你，捏在我手心里！……妈的！让你犟嘴！”

“沙尼亚！……女人都去开会呀！……”

“住嘴……贱货！你别在我这儿赶时髦！去开会的都是那些没丈夫的野鸡！……哼，亏你想得出：去开会！……”

凌辱象针一样刺着安娜。她脸色惨白，用嘎哑的颤抖的声音说：

“你不把我当人看吗？”

“母马不算马，女人不是人！”

“可在集体农庄里……”

“你跟你那个小杂种，吃的不是集体农庄的粮，是我的粮！……你靠我养活，就得听我的！”亚历山大大嚷大叫着。

这时，安娜感觉自己脸色发白，血直往心头涌来，热辣辣地冲击着脉管，她咬牙切齿地说：

“是你自己劝说我回来的，还答应疼我！可你的诺言到哪儿

① 亚历山大的别称。——译者

去了？”

“就在这儿！”亚历山大扯着嘶哑的嗓子，挥起胳膊，一拳向安娜的胸口打去。

安娜摇晃了一下，大叫着，想抓住丈夫的手，可是他哑着嗓子，“妈妈的”大骂着，揪住她的头发，一脚向她的肚子踢去。安娜重重地摔倒在地板上，张大嘴吸着气，严重窒息得喘息起来。她感到打痛的地方已经麻木，仿佛只是透过一层薄雾，看见上面丈夫那张胀得紫红的歪斜的脸。

“喏，喏，给你！……不想要吗？……啊哈，揭你的皮……叫你给我唱反调儿！……给你好瞧的！……让你瞧瞧看！……

安娜的身体一动不动地蜷缩在地板上。亚历山大照她每踢一脚，火气就冒高一丈。他东一脚，西一脚，踢得很均匀，尽量踢到她的肚子上，胸脯上和双手捂着的脸上。他一直踢得汗水湿透了衬衫，脚也累了，然后才戴上帽子，吐了口唾沫，砰地一声关上门，走了出去。

他在大门外的街上站了一会儿，想了想，就穿过隔壁菜园倒毁的篱笆，向私酒贩子卢什卡家走去。

安娜在地板上一直躺到晚上。傍晚，公公来到房里，用脚尖踢了踢她，嘟哝道：

“喂，起来吧！……甭这样了，装够了……男人刚动一指头，就直挺挺躺着不起了！……到苏维埃去告吧，请便……起来呀，怎么了？……叫谁替你收拾牲口呢？难道你让我们去雇人吗？”他用脚沙沙擦着土地板，向厨房走去。“她一个人顶得上四个人吃，可干起活儿来……嗨，人都得有良心！……你啐她一脸，她会当作仙露呢！……”

公公穿上衣服，收拾牲口去了。摇床里动了动，孩子哇哇哭

了起来。安娜神智清醒过来，欠身跪起，从破裂的嘴里啐了一口掺沙带血的唾沫，吃力地动弹着嘴唇，说道：

“我苦命的孩子……”

在卡恰洛夫村后面，山岗上装点着光秃秃的融化着的雪堆。在这里，黄昏最先迎来了夜晚。兔子沿着一个个松软的、孔洞累累的雪堆，到村子里去觅食。在卡恰洛夫村里，撒着稀零零的黄橙橙的灯火。风把干粪块的气味吹散在街上。

亚历山大在晚饭前才回家。他在床上一倒，拉长着沙哑的腔调说：

“安娜！……靴——子……”话音刚落，就拉起鼾声睡着了，粘糊糊的唾液流湿了半边枕头。

安娜等公公在火炕上安静下来，抱起小孩，跑到了外面。她站了一阵儿，静听着自己突突的急促的心跳。夜在卡恰洛夫上空大步降临了。屋檐上滴着水，粪堆冒着气。脚下的雪湿漉漉的，泥泞得很。安娜把孩子紧紧抱在怀里，沿着小巷磕磕绊绊地向卡恰洛夫池塘走去；肮脏的积冰在那里泛着蓝光。在池塘边，蓬松的芦苇在风中簌簌发响，用它那毛茸茸的脑袋向安娜傲慢地点头。

她向冰窟窿走去。黑魆魆的水面刚刚结上一层薄冰，冰窟窿旁边积着一堆堆碎冰块和冻结的牛粪。

安娜把孩子更紧地贴在胸口上，向黑洞洞的张着大嘴的冰窟窿望了一眼，跪下来。可是突然间，婴儿在襁褓和小被子下低声哭了起来。羞愧象热浪拍打 to 安娜的脸上。她一跃而起，头也不回地向集体农庄跑去。喏，这就是那扇刨得光溜溜的、冬天发黄了的大门，这就是板棚里那台发电机的熟悉而亲切的隆隆的轰鸣声……

安娜摇摇晃晃地跑上了台阶，走廊的门吱扭响了，她的心和

着脚步声噔噔地跳得直响。走到左边第三道门边，敲了敲。鸦雀无声。她更用力地敲了敲。有人走到门边，开了门。安娜用模糊的眼睛望了望，看见阿尔谢尼憔悴而消瘦的脸，便软弱无力地靠到了门框上。

阿尔谢尼用手把她搀扶到床边，解开襁褓，将婴儿放到空了两个月的摇床里，又跑到厨房去煮牛奶。他亲着儿子胖鼓鼓的小脚丫子和安娜那被泪水打湿的脸颊，说：

“我连去找你也没有……就因为我知道，你会很快回来，会回到集体农庄来的！……”

(1925年)

委 屈

炽热的干风从东方吹来，吹遍整个草原，刮倒了低矮的令人忧心的庄稼。天空昏暗得死气沉沉，草木散发着热气，灰白色的尘土在道路上滚动着，象是从地上卷起的雪粉。地皮被太阳烤晒得爆出了一道道裂缝；这些裂缝又深又干，如同让干渴折磨死的人的嘴唇一样。大地蒸发着浓烈的咸盐味。

从黑海岸边蔓延过来的歉收，象铁蹄一样在各种庄稼上面践踏而过。

在收获新的粮食之前，人们已经住到了杜勃罗维斯克田庄，大家在期待着，焦虑着。看着这玻璃似的湛蓝的天空，看着这象麦穗一样多刺的太阳，看着它那刺人的光束，陷入了深沉的忧虑。

希望同庄稼一起枯萎了。

八月间，人们就动手剥榆皮，采橡子，把它们磨成面，然后在橡子面中掺上一捧黍子面，混合着吃。

在圣母节前^①，斯捷潘精疲力尽地把牛赶到自己的耕作区，累得呲着牙，咬着干嘴唇的黑边，把牛套在犁上，默默地握住犁把。

四俄亩地耕了一星期了。细小的犁沟镶在漏耕的褐色地块中，弯弯曲曲，显得很象样子。长满荒草的耕地好象没有被犁铧划过的似的，倒仿佛让什么动物拿弯曲而无力的爪子抓破了一般……

斯捷潘向不讲信义的土地这样俯首哈腰，是因为他家里除了老太婆以外，还有儿子留下的八张嘴。儿子在国内战争中牺牲了，家里唯一能干的人就是他自己，可他已经五十来岁了，并且还有点驼背。他以后不能再耕地了，——第二对耕牛已经卖掉了。不是卖掉，而是为了换取四十普特土里巴拉的粮食，送给了一个好心肠的人。

就在圣母节刚过不久，村苏维埃主席当众宣布说：

“国家要发放种籽贷款了。棉花从中部起运，快到车站了。谁没耕地，就赶快耕吧！哪怕是用牙啃呢，也要把地翻出来。”

“骗人！才不信会贷给种籽呢……”一些哥萨克听了，气得呼哧呼哧直喘气。

“有指示。都是真的，不是耍滑头。”

“拉我们一把吧。就给……”斯捷潘在焦虑和高兴中带着苦恼。他抱着将信将疑的态度。

秋天过去了。村庄里覆盖着一层雪。在变得荒无人迹的菜园里，布满了兔子的脚印。

“怎么样啊，贷的种籽呢？……”斯捷潘没好气地说。他的话引起了苏维埃主席的讨厌。

① 圣母节日即旧俄历十月一日。——译者

这位主席不耐烦地摆了摆手说：

“别纠缠，斯捷潘·普罗科费奇！暂时还没有指标呢。”

“以后也不会给贷的，甭等了！……可要防备着饿死人哪，他们还让人抱着希望呢……就象是给狗投一块骨头一样。”斯捷潘恶狠狠地挥动着他那骨节粗大的拳头说：“他们已经完蛋了，狗……狗……狗崽子们！……粮食都让城里人吃了，他妈妈的……”

“别说不三不四的话了，普罗科费奇。说话可要当心呵！”

“唉！……”斯捷潘摆着手，没把话说完，就迅速地移动着他那骨头裸露的粗大的身躯，离开了村苏维埃。他象常年害病的公牛一样，从打满补钉的男上衣下往外凸露着两块大肩胛骨，在两根长长的枯瘦的小腿上，晃荡着一条破烂不堪的带镶条的灯笼裤。苍白的头发盖着他那红黄色的胡须。他用因饥饿而变得粗野的目光望了望旁边，为自己瘦骨如柴的庞大的躯体感到害羞。他回到家里，就倒在一条大板凳上。

“去照料一下牲口吧。别躺下睡觉了，土拨鼠！”妻子唠叨着。

“瓦丽卡照顾得满好的。”

“她没什么可穿的，怎么到牲口院里去呢”。

“让她穿上我的毡靴吧。”

小姑娘瓦丽卡从爷爷脚上脱下毡靴来，穿到自己脚上，去照料牲口去了。斯捷潘仍然躺着，他斜伸着长长的光脚板，不时地抽搐着紧闭的一双眼皮，长吁短叹地喘着气，脑子里萦绕着漫无尽头的愉快的思绪。吃饭时，他坐在上座^①，就象一个筋骨突出的庞然大物，耸立在桌子上边，不住地环顾坐满长凳的小孙子们。他看到，那个最小的男孩，三岁的季莫什卡，有些贪食，

① 上座——桌子上对着门口的坐位。——译者

带着嬉皮笑脸的样子，竭力去抓碗里漂动着的那一小块土豆。于是，他用小勺在季莫什卡的脑门上响亮地敲打了几下。

“别捞着吃！……”

村里许多人都象干面包一样死去了，他们简直就象是被虫子蛀坏的枯树一样。这种让人焦心的忧虑弄得斯捷潘整夜整夜睡不着觉：唉，没法给耕地播种了。

牲畜简直是一钱不值了。一头母牛仅顶五至八普特掺秕子的粮食。在圣诞节期间^①，人们又谈论起似乎要发放种籽贷款的事，可是传了一阵子，又渐渐平息了。这传闻熄灭得就象深秋时节草原上的花草一样，只有到了来年春天才能复活。晚上，在教堂更房里的一个会议上，苏维埃主席宣布：

“文件收到了。”他用手指揉了揉咽喉，最后说道：“明天我们就可以去拉粮食了。对我们的事，同样，他们是不会忘记的……”说到这里，他因激动而突然中断了话声。

从村庄到火车站共三百来里。从出发的第一夜起，他们就分成组集体住宿。骑马的走在前边，牛车稀稀拉拉地撒开来，就象一根长长的圆木滚动着。斯捷潘是同邻居阿丰卡一块走的，这是一个年轻的骨节粗大的哥萨克。路上经过乌克兰的大村镇。直到夜里才翻过七八十里路的山梁。因为饲料不足，瘦得象堆骨头似的公牛，把骨头突出的肋部紧靠着辕杆，懒洋洋地移动着脚步。

一路上，斯捷潘都是步行的，为的是回来的路上能给公牛留些力气。在最后一夜，等到新月升起，从赤杨角村出发，直到中午时分才赶到火车站。

① 圣诞节期间——由圣诞节到主显节。——译者

在一个大粮仓旁边，一些卸辕的马在撕打，发出尖叫声，公牛哞哞地叫着，同乱糟糟的人的喊声交织在一起。

傍晚，从大粮仓的大门口跑出来一个满身灰尘的过磅员。他环视了一下周围的车辆，喊道：

“赶车的，走近一点！你们的苏维埃主席在哪里？”

“在这里呵！”苏维埃主席履行公事地大声答应了一句。

“单据在您那里吗？”

“是呵，在我这里。”

先到的人还在套车的时候，斯捷潘跟阿丰卡赶到了大门口。一个黑黑的大个子哥萨克横站在道上，他戴着一顶哥萨克军官帽子，农民上衣上扣着一个长耳风帽。他轰赶着一头摇摆着脑袋的公牛：

“戛，戛，黑头精……喔……喔，喔……站住！……”

“让让路，哥萨克，”斯捷潘央求道。

“绕绕道不行吗！”

“想叫在这里绕道？你瞧，这不是要我们大卸八块吗？”

“把雪橇拉开！”阿丰卡喊道。“象水鸭子挡道一样，横站在路上……哎，这汉子……”

哥萨克长官^①用又粗又大的拳头揍了一下执拗的公牛，那头公牛一双充血的眼睛瞪得鼓鼓的，把满是皱纹的脖子从牛轭里伸出来。

“把车赶到跟前来……赶到跟前来……”过磅员在门口挥动着单据，大声地叫喊着。

斯捷潘轰着公牛跑了几步，第一个赶到磅秤附近。

金黄色的麦流，顺着铁皮包成的管子沙沙响地淌进口袋里。斯

① 长官——在禁卫军长官团服役的哥萨克。

捷潘紧紧地抓住口袋边，呼吸着温馨的尘土，高兴得喘不过气来。看着过磅员用靴子毫不在意地踩在撒了的种籽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而脸上带着漠不关心的样子，他感到很惊愕。

“过磅，二十一普特。”

斯捷潘把肩胛骨一晃，试图象往常一样，把五普特的麻袋扛起来，可是出乎所料，他感到膝盖不可抑制地颤抖起来，摇摇摆摆，一歪一瘸地走了两步，一下子靠到了门上。

“快过去！……挡住门口了！……”挤在门口的一群哥萨克催促着。

“身体太弱了，大叔。”

“他的衣服已经湿漉漉了。”

“站稳脚跟！要不就摔倒了！”

“哈—哈—哈……”

“扔下袋子，让我扛，我行。”

在门口套车的哥萨克长官，帮助斯捷潘把袋子搬到车上。斯捷潘等阿丰卡赶到，便把车赶到了广场上。这时，天已黑了下來。

“你去请人家安排过夜吧。”冻得瑟瑟缩缩的阿丰卡提议说。

“你怎么不去呢？”

“你上年岁了，普罗科费奇。你这把胡子就是证据。”

斯捷潘走过了一整条大街——但是，没有一家肯收留他们。

“天天都有你们这些人住在这里。”

“没地方，太挤了。”

“你们在大街上也能过夜呀。”

斯捷潘笨嘴拙舌地一直央求说：“留下我们吧，难道这地方我们会用多久吗，莫非你们不敬上帝吗？……”

“如今过日子不靠上帝，我们只靠白铁皮房子。”

“走开吧，老头儿。”有人挥手赶他。

斯捷潘从街尽头的院子里出来，用鞭子狠狠地抽了一下无辜的公牛。

“你瞧，阿丰卡，这里的人真是……看来，要在外边过夜了。”

“从四面放一把火，把他们烧了！这些没有人味的家伙，简直不是人！……冬天也休想要出他们一点雪！”

在大粮仓的广场上，人们把牛车卸下来，伴随着火车气笛的吼声，躺在堆满袋子的雪橇上。广场上吵吵嚷嚷，几个年轻的哥萨克，聚集在尽头的一辆大车上，唱着悦耳的歌曲。有一个用带些嘶哑但却很有力的声音唱道：

哥萨克，归来吧，
退役后，快回家。

接着，一些在风和严寒中变得粗犷的声音，随着和唱了起来：

膀上闪着肩章，
胸前佩着十字架——……

斯捷潘一边听着歌曲，一边不放心地摸着满袋粮食上的扎绳，于是，在他眼前浮现出了阿塔曼墓冢附近的一小片被开垦出来的黑土地，还有他，斯捷潘，在撒播着一把把不缺斤两的种籽……

半夜里，突然刮起寒冷的北风。从莫斯科开来的一列列车厢顶上，白雪闪着水晶似的亮光，路旁因为融化了雪而裸露出来的土地，显得黑糊糊的，开始结出一层薄薄的冰，散发着秋天的气息。

大粮仓如同一块影影绰绰的玫瑰色的方形巨石，悬挂在城市的上空。牛耷拉着脑袋，蹒跚在木板围墙边；风在广场上旋转着，发出一阵阵尖细的哀嚎，把冰凉的尘土卷扬在电线上。

黎明前，当大熊星座的“辕杆”扎到大粮仓的平屋顶时，斯捷潘醒来了。他翻转了一下麻木的双腿，从雪橇上站起身来。附近卧着几头披着白霜的牛，在呼呼地喘着粗气；车辆象翻乱的干草垛一样，黑糊糊一片；一只野狗被冻得把背佝偻了起来。

斯捷潘叫醒了阿丰卡。他们套上了车，在黎明前浓密的黑暗中离开了城。

他们翻到了山后。火车在城市的上空吼叫着。阿丰卡走在斯捷潘的旁边，向后挥了一下鞭杆。

“嘿，叫起来了，该死的公马！它身上拉几千普特的东西，还叫得那么欢呢。可这里，只往身上加二十普特，一路上就走得吃不消了。你至少有两头公牛，可瞧我这儿，右套是什么牲口：一头小牛犊和一头母牛。你打它一鞭子，这个下作的东西，就歪起尾巴，扭屁股吊腰，胡来……走呵，你这城市小姐！……”他瞪着发肿的怒冲冲的眼睛，用鞭子狠狠地抽了一下母牛，接着便倒进雪橇里，高高地跷着二郎腿。

中午，斯捷潘和阿丰卡来到了杨角村。街上满是穿着五颜六色的节日盛装的人们。这时，斯捷潘才记起，今天是礼拜日。他们走到教堂跟前，停了下来。

“嘿，我们快走出山岗了……你瞧，道路平坦坦的。”

“差不多是……”阿丰卡赞成地说，“是沙地，没有雪了。”

“咱们得租马车往山梁上运了。”

“你是说，咱得给人家交粮食吧。”

在院子附近堆着一堆木料，上面有七八个乌克兰人，带着假

日的困倦在嗑向日葵子。斯捷潘走到跟前，摘下毛茸茸的高皮帽，打招呼说：

“你们都好吧，乡亲们。”

“你好，老乡。”一个胡子花白的长老回答道。

“你们没有人给打个短，帮我们把东西运过岗去吗？你们这里全是沙，很少有雪，我们的雪橇都给堵住了……”

“没有人。”一个乌克兰人简单地回答了一声，把葵花子皮吐上了胡须。

“我们出钱，看在基督的份上，救救急吧！”

“没有马。”

“那怎么办呢？大慈大悲的，难道我们就完了？”斯捷潘摊开两手，苦苦哀求起来。

“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另一个戴兔皮风帽的人，冷冰冰地答了一句。

大家沉默了一会儿。阿丰卡走上前来，鞠躬哈腰道：

“请各位行行好吧！”

“不是没有，得破破财呵。”

一个身材高大的乌克兰年轻人，穿着一身结实的皱皱巴巴的短皮大衣，走近斯捷潘，拍了拍他的肩膀说：

“就这样办吧，大叔：让我跟你摔一跤。要是你摔倒我，我就给您送过岗，要是摔不倒我，那就告吹。喂，怎么样？”他那对灰色的圆眼睛带着嬉笑，在油光光的绯红的面颊上骨碌骨碌地直转动。

斯捷潘看了看满脸堆笑的乌克兰人，戴上了皮高帽。

“怎么，老兄，就是说，讥笑人吆……看来，别人有难，没能动你们的心啊。”

“就让我们试试吧！”年轻的乌克兰人眉飞色舞地笑了起来。

斯捷潘扔下手套，打量了打量对手那把短皮大衣撑得鼓鼓的肩膀。

“要小心啊！”

“来吧——有种的！”

他们抱住了腰。乌克兰人把手伸进斯捷潘红腰带里面，轻松而愉快地呼吸着，提醒对方说：

“当心肚子。”

他们慢慢地转来转去，正在运力气。斯捷潘缩紧眼睛，转过肩膀，顶住对手的胸口。对手抬脚退了老远，把斯捷潘拽过来，猛力往下折打。他们兜了三个圈子。斯捷潘觉得这个吃得饱饱的乌克兰人比他有力气，于是，便对结局毫不抱什么信心地烦躁地进行着争斗。

拿定主意以后，斯捷潘把左膝盖向下一弯，扑通一声向后倒了下去，后脑勺重重地碰到了冻土墩上。乌克兰人把斯捷潘的双脚向上一撂，在他身上飞身而过，沉重地摔下来。斯捷潘本想象以前年轻的时候那样，一跃而起，但是，腿不从心，跳起来的乌克兰人已经压在他身上，把他的肩胛骨压进路上被马蹄子踩陷下去的雪里。

人们把他们围起来，哈哈地大笑着，不怀好意地鼓起掌来。斯捷潘拍打着弄脏的皮高帽子，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倒退十年，我还得跟你干一阵子呢……”

“但是，大叔，就这样吧，我送你过岗去。你自己不好意思了吧，”乌克兰人喘了喘气，满意地笑了。“请原谅我的脾气。”

人们把粮食换装到宽敞的四轮马车上，接着，跟斯捷潘摔跤的那个乌克兰人用漂亮的鞭子在三匹吃饱的马上打了一个响鞭。

“请原谅我吧！”

在离镇八里多路的山岗上，人们又把粮食转换到了雪橇上。道路上出现了雪，有些地方因雪橇载重过大，路面上被拖得积起了一堆堆雪。

路很难走，把公牛累得精疲力竭。在雪橇后面，被滑木磨得明光闪亮的辙迹，象女人在泥水里 溅湿 的衣裙的下摆，在冻结的地面上曳扯着。

离村子还有约摸六十来里。斯捷潘向阿丰卡提议说：

“咱们走吧。虽说是夜里，但我们能勉强支持到家。”

“没东西可过夜了，一把饲草也没有了，只有把公牛的肚子扎起来了。”

傍晚，他们走到了公树林。在晴朗而黝黑的天空中，晶莹透亮的星星在隐隐燃烧，撒出一层薄烟。天气很冷。斯捷潘走在前边。他们走进一个小山谷。在公牛的前边，出现了一个歪歪斜斜的身影，接着走出一个人来。

“走过来的是谁？”

“从火车站来的，杜勃罗维斯基的。”斯捷潘警觉起来，回头看了看走上前来的阿丰卡。

“站住！”

“凭什么权力？……”

“站住，告诉你！”

一个个子不高，戴着长耳风帽的人走了过来。靛蓝色的那干式手枪蓝莹莹的，在手套里闪闪发光。

“车上拉的什么？”

“种籽粮……”斯捷潘的心颤动了一下，声音哆嗦起来。他向旁边一瞥，看见一辆四人拉的马车从旁边驶过来。那个戴长耳风

帽的人，直迎着斯捷潘走来，把冻得冷冰冰的蒙上一层水气的枪口，向他毛皮高帽下边戳了一下。

“卸下来！……”

“这是干什么呀？……”斯捷潘哎哟一声，软弱无力地靠在雪橇上。

“卸下来！……”

两个人丢下四轮马车，响着咯吱咯吱的靴子声跑过来。

“打死他！……”一个人从远处叫道。那干式手枪柄戳开了毛皮高帽，顶住了斯捷潘的太阳穴。斯捷潘跪着趴了下去。

“卸下来！”那个戴长耳风帽的人凶神恶煞地大叫着，向斯捷潘弯下腰去，用那干式手枪戳住了他的牙。

“种籽粮啊……好兄弟……最亲爱的，好兄弟……啊——啊——啊……”斯捷潘号啕大哭，用双膝爬着，手掌按在路面上的冻土棱上，扎得鲜血直流。

头一个从四轮马车上跑下来的那个人，用步枪枪托把阿丰卡打倒在地上，从雪橇上向他身上扔来一条车毯。

“躺下，不许看！……”

四轮马车辘辘地响着，到雪橇旁边停下来。两个人呼哧呼哧地向四轮马车上扔着麻袋，另一个戴长耳风帽的人看守着斯捷潘。从他搭拉下的稀疏的小胡子下边，龇咧着象是挂霜的豁子嘴。

“拿住篷布，”第四个人坐在车夫座上，命令道。

公牛把卸空的雪橇轻轻一拉，在路上走动了。阿丰卡朝趴在地上的斯捷潘走过来，说：

“起来，咱们走吧……”

四轮马车响着低沉的轮子声，向路边的荒野里驶去。斯捷潘

站起来，咽下去流到嘴里的血。四轮马车在远方变成了黑乎乎的一团。过了一会儿，一阵威胁的枪声，“啪啦啦”在山谷里滚动起来。

“就是这样的命啊……完蛋了……”阿丰卡闷声闷气地说了一句，接着，折断了手中的鞭杆，痛苦地呻吟着叫喊道：“欺负人呵！……”

头发乱蓬蓬的斯捷潘，从地上爬起来，带着可怕的样子，慢慢地在浅蓝色的冰冷的月光中转动起来。阿丰卡拱背注视着他，于是眼前浮现出一幅图景：去年冬天，他埋伏着射中一只狼。那只狼在打碎的眼窝里带着射进去的一粒大砂弹，仍然在打谷场的篱笆边可怕地打圈子，随后陷入松软的雪中，蹲在后腿上，无声无息地死去了……

斋期的第四个礼拜，庄里的人都外出播种去了。

斯捷潘坐在台阶边，拿起一根枯树枝划着湿软的粘土地，用凹进黑眼眶的眼睛发狂似地爱抚着它……

他灰溜溜地、沉默寡言地过了一礼拜。回到家的最初几天，一家人不停地哭诉。待平静下来以后，大家看着斯捷潘摇摇摆摆的脑袋，看着他那一双变得软弱无力，总是漫不经心拨弄着棕黄色胡须的手，都充满了忧愁和恐惧。在复活节前一个礼拜，他头一次在夜里到阿塔曼墓冢去。草原镀上一层银白色的月光，升起雾气腾腾的海市蜃楼般的幻景。一只没怀孕的兔子在上一年杂草中懒洋洋地叫着，被幼林的嫩芽胀得难受的老草兔子，沙沙地向前走动。稀薄的云彩低低地扩散开来，遮住了一轮新月；光线被滤过云层的筛子，不声不响地抚摸着正在作梦的温柔的小草。斯捷潘在离他家那块地还有大约有二十俄丈^①的地方，就在阿塔

曼墓冢下站住了。

那块开垦出来的、诱惑过他的土地，就躺在墓冢的那边。在垅沟中间，埋着发芽的希望，繁茂的牵牛花覆盖着翻耕的黑土地。斯捷潘从墓冢后面走出来，望着被坟丘切成碎片的黑油油的耕地，感到一阵恐怖。他垂手站了一会儿，颤动着指头，长长叹了口气，接着，叹息被撕扯开来，变成了断断续续的呻吟。

从那天夜里起，谁也没察觉到，他几乎天天从家里出来，到那里去。他走到墓冢跟前，总是用长满老茧的手把胸口上的衬衣揉成一团。已经翻出来的那块黑土地，长着乱蓬蓬的草，死气沉沉地躺在墓冢后面；风吹干了地里翻耕出来的犁垅，摇动着枝条茂密的草木樨……

三一节前，草原上的刈草季节到了。斯捷潘和阿丰卡搭帮去刈草。他们乘车来到草原，头一个晚上，斯捷潘的公牛就从牧场走失了。

他们寻找了一个昼夜。大村镇的分水道纵横两个方向都跑遍了，看遍了所有峭崖和山谷。所寻之处，都没有留下公牛的足迹。斯捷潘在傍晚时分回到家，披上粗呢上衣，连头也不转地呆呆地站在门口。

“我去乌克兰镇看看。说不定让人牵到那里去了。”

“苏哈里科夫……苏哈里科夫上路了吧……”老太婆象热锅上的蚂蚁一样着急。

“我去那里。”斯捷潘皱着眉头，走出去。他抡着拐杖，劈下了艾蒿的圆锥形花序。

① 一俄丈等于2.134米。——译者

他在村庄后边碰到了阿丰卡。

“到乌克兰人那里去吗，普罗科费奇？”

“是到那儿去。”

“嗯，上帝保佑你。”

“谢天谢地。”

“你把刈草机扔在草原里，就回来吧。我们会把机器弄回来的。”阿丰卡从后边喊了一声。

斯捷潘挥了挥手，连头也没转一下。快晌午时分，他来到尼日涅—雅波罗诺夫斯克村，拐弯向一个老同事家里走去。他们在一块吃过苦，斯捷潘在他那里喝了一阵子牛奶，又动身向前走。沿路经常遇到一些人。

斯捷潘不时地站住，询问道：

“你们有没有见到三头公牛？一头角是断的，那两头是红毛。”

“没见到过。”

“说真的啊。”

“是这样，真的没有看到。”

道路象灰色的麻布似的，在斯捷潘的脚下向前伸展开来。他敲打着拐杖，一边汗流浹地走着，一边用苦涩的舌头舔着被风吹裂的嘴唇。

傍晚，在两条路的岔道口，他赶上了一辆拉着干草的大车。上边坐着一个没戴帽子的三岁上下的黄毛小孩。赶车的是一个男子汉，他穿着一条被刈草机润滑油弄脏的粗麻布裤子，戴着一顶草编的工人帽。斯捷潘赶上他，走了个并肩。

“你好啊。”

那只拿鞭子的手勉强地举到草帽的宽沿上。

“您没有碰到几头公牛吧……”斯捷潘刚要说话，突然停住了。

血冲得太阳穴嗡嗡直响，面颊唰地一白，血又流到心上，他蓦地感到：草帽底下的这副面孔熟悉极了。那副在不眠之夜的黑暗中闪着白光的面孔，禁不住出现在眼前……帽沿荫影下那双疲倦的眼睛，正以没认出的样子冷漠地看着他，稀疏的、象是燃烧的胡子，搭在半张半合的嘴唇上，在一排被烟熏黄的牙齿中间，现出一个黑糊糊的豁子。

“啊——……又见面了！……”

在帽子下边，太阳晒黑了的前额唰地变白了，这苍白慢慢向脸颊上扩散开来，一直延伸到下巴上、嘴唇上。

“认得吗？”

“什么……你要什么？……咱们向来没见过面呀！”

“没见过吗？……可冬天的粮食呢？……那是谁？……”

“没有过……没有过，……您认错人了，大概是……”

斯捷潘顺手拔出插在大车上的长柄三齿叉，迅速而敏捷地抓住叉柄。乌克兰人突然在停住的汗浸浸的马腿边坐下来，手掌按在尘土里，自下往上打量着斯捷潘。

“我的老婆死了……撇下一个小孩……”他用颤抖的手指着大车，以可怕的无所顾忌的声音说。

“为啥欺负人？”斯捷潘浑身颤栗着，用嘶哑的声音质问。

乌克兰人呆滞地看看自己的粗麻布裤子，摇晃了一下。

“你牵去这匹马吧……都是因为穷啊……啊？把我这匹马牵去吧。行行好吧！咱们中间有……言归于好吧……”他口齿不清地说个没完，用手扒着路上的尘土。

“你欺负人哪！……让土地白白荒在那里！……啊？人在挨饿……吃野菜吃得浮肿……啊？”斯捷潘大声喊叫着，越来越近地向他逼过去。

“埋葬了老婆……在女人的病中有了……就是这个孩子……从那个复活节后三年了……请宽恕吧！我们一起相遇了……我还你粮食……”乌克兰人痛不欲生地摇晃着脑袋，用僵硬发死的舌头前言不搭后语地絮絮叨叨地说着，在失去理智的心惊胆战的痉挛中发呆……

“祈祷上帝！……”斯捷潘长出了一口气，画了个十字。

“停停！等一等……我以上帝的名义请求！……孩子怎么办呢？”

“我给你带……不要为他伤心！……”

“没运一趟干草……哎哟！这个家毁了……怎么办？……”

斯捷潘举起叉子，瞬息间扼住了乌克兰人的脑袋。接着，他感到两耳的轰鸣声越来越大，“哼”地声将叉子戳进了棉软软、牙齿“嚙嚙”颤抖的嘴里……

斯捷潘向这张变黄的端正的贴在地上的脸扔了一把干草，然后爬上大车，把藏在干草里的男孩子抱了出来。

他用醉醺醺的兜圈子似的步伐离开大车，向山脚下一个灯火点点的村庄走去。他把在痉挛中佝偻着的男孩紧抱在胸前，咬紧“哒哒”作响的牙齿，小声说道：

“别作声，好孩子！嗯，别作声，得啦，不听话，狼来抓。别作声！……”

可是，男孩子翻转着白眼，竭力从斯捷潘手中挣脱出来，向弥漫着蔚蓝色暮霭的静寂的草原尖声地叫着：

“爸爸！……爸——爸！……爸——阿爸！……”

一九二五年或一九二六年

共同语言

很久以前，在鲁日那镇，积雪的地皮脏得要命。不久前飞来的白嘴鸦，披着那身崭新的羽毛，就象蓝钢的颜色一样明亮闪光。

烟囱上，青烟缕缕，蓬松得象飘着的细丝。天空不知怎么回事，一片灰蒙蒙的。不知道是因为罩着一层稀薄的烟雾还是别的什么，房屋的轮廓显得隐隐约约。只有在顿河的后边，奥布顿山的清晰而严峻的山脊在翻腾着波浪。森林站在那里，好象画成的一幅水墨画。

在民众文娱馆里正在召开边区苏维埃代表大会。会议开始后，区党委书记信心十足地摆开架势，大作国际形势报告。在会场的长凳上，坐满了代表：从后面望去，有带红帽圈的哥萨克帽，有毛皮高帽和带耳罩的大皮帽，还有熟皮短大衣排成的横队。会场上传出协调一致的呼噜声，间或还有咳嗽声。很少看见有大胡子，大多数人留着各色各样的小胡子，或者根

本就没有胡子，裸露着光光的面颊。

党委书记拉着契姆贝尔林腔^①读着报告，后排有人急躁地叫道：

“叫他别啰嗦了！”

会议执行主席用玻璃杯把长颈瓶碰得丁当作响，

“维持秩序！……”

报告结束后，在半个小时的休息时间内，休息室里菸草的浓烟从毛皮高帽上方低低飘过。我忽然在人们的嘈杂声中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好象是迈丹尼科夫的嗓门。我推开附近的一些人，果真看到了他——迈丹尼科夫，他重新当选为佩斯恰内村的苏维埃主席了。在他周围拥挤着一群哥萨克。他们这些人当中，一个最年轻的戴着一顶不算太旧的布琼尼式军帽^②的人说：

“……咱们又要打仗了。”

“那咱们可要挨人家的揍了……”

“那是从前！”

“人家有技术，老兄。”

“光有技术没有人，就等于背上没有哥萨克的马。”

“难道他们的人少吗？”

迈丹尼科夫又开始讲了起来，他的声音非常温柔平和，简直象高级的车轮润滑油。

“你可别讲这个。你瞧，这个老战友呵，可不太明事理了……即使战争爆发了，它对我们也并不可怕……你等一等！让我说说看，我说完了，你再说，现在你先听着。那是一九一五年，我们被抓到德国去。我当时是第三批的。我们一个哥萨克连从门卡斯

① 系指高加索一个地方的土音。——译者

② 布琼尼式军帽——苏联红军初期的军帽。——译者

克镇上了前线，被编入了第八步兵师，我们就象上了套索似地，跟着这个师走呵走的，经常打仗。在斯特里亚城下，我们丢掉了马。他们就给我们的步枪上了刺刀。我们甚至赛过了母马。我们在战壕里作战，在各种各样的条件下作战。不过，更多的是在战壕里作战。在那可恶的粘土地里滚爬了整整一年，一次，一连四个月都没有休息。我们身上遍是虱子！在有些地方，遇到的是烦恼，可在这里是太脏。虱子也是各色各样的：在烦恼中生的虱子，是弯脑袋的；身上脏时生的虱子，是黑颜色的，象小虫子。尽管它们是各种各样的，我们喂起它们来却是一个样子；常常脱下衬衣，铺在地上，用军用水壶或者用炮弹壳在衬衣上边擦。一擦，衬衣上就出现一条血道子。我们还用棍棒，用皮带抽打它们……简直就象在打死兽类一样。哎哟，它们繁殖得真快呵！衬衣里就象跑着蚂蚁群一样。

“我们自己人也在干架。为什么？好象也不为什么，谁也不知道为个啥。大家都大口大口地喝着别人的羹汤。

“一年过去了，我们充满了忧愁和苦恼。死，这就是一切！在这边，我们苦闷地想念着马，就象一心扑在马身上而整整几个月又看不到马的饲养员一样；在那边——留着我们的家小，而且杳无音信。可是，最重要的是，人民（我也同他们一起）为什么都在死亡，而且是无声无息的死亡？

“一九一六年，我们从前线撤下来，一下子就撤了八十来里。连里补了缺，来的几乎都是一些老头儿，胡子都搭拉到肚皮上了。就是这种状况。我们稍微休息了一下，又得到了战马。真没想到，又有了马！从师部传来一道命令：要我们连立即开赴前线。听人说，在那里士兵暴动了，都不愿到战壕里去在粘土地上滚爬，也不愿意去同死神结下亲家……

“德姆巴什大尉给我们作了讲解，他就是如此这般说的。我当场掏出笔来给他写了一张字条，从人群中递了过去。‘大尉阁下，请你给我们讲讲，各种不同语言的人民之间为什么打仗。我们怎么能打自己人？’他读完了字条，脸色一沉，什么也没有说。就在这个时候，我反复捉摸了一下，给我们连补充的这些哥萨克老头是干什么的，而且这些老头又是些老保守派。他们能为强暴的沙皇尽忠效力，能为一切强暴尽忠效力。一方面，他们老里老气，受过长期服役的严格训练；另一方面，他又有点傻里傻气，为服役所戕害。再就是：这些年来在军队里，他们的智慧被人夺去的，要比割草人打坏镰刀的速度更快。”

“上司把我们赶去对付暴动的士兵。和我们协同行动的有四挺机枪和一辆装甲车。我们来到一个团暴动的地方，那里已有两个连的库班人（这些人象加尔梅克人一样野蛮和有雀斑），他们已把这个团包围了起来。多么可怕的事情呵，老兄！在小树林后面，两个炮兵连已从前面的车上开拔了，可是部署在林间空地上的那个团，却还是驻扎在那里一动不动，怨声四起。一些军官到这个团里来，为他们从中斡旋，可是他们仍然在坚持不动，怨声载道。”

“我们的大尉发出了命令，我们举着军刀，迅速行动，把这个团包围成了一个马蹄形……接着，库班人开走了……士兵们又扔下步枪，把它们垛成堆，又怨声沸腾起来。”

“我心里却热血沸腾，甚至连嘴里都觉得苦咸得发烧。要是我在那里能决定人的生杀命运，我怎么能把人赶进墓穴里去，让他们象黄鼠狼一样在地里过日子？……骑马跑到跟前来，我一看：我们排的哥萨克菲利蒙诺夫一时怒起，用军刀背朝着一个士兵的脸打起来。我眼睁睁地看着，那士兵的脸和嘴都肿胀了起来，满是鲜血，菲利蒙诺夫有些胆怯了，那年轻的士兵也明显地害怕起来。”

这种情景真使我不寒而栗。我再也不能控制自己了，就奔到他们跟前，说道：‘别打了，菲利蒙诺夫！’他臭骂了我一句，真是老顽固分子。我举起来军刀，想吓唬他一下，说道：“不要打了，不然，向真主发誓，我就砍了你！”他猛然从肩上拉下步枪。我用军刀尖往他喉咙上一碰。……就象碰到一个草人一样，把一个活人从地上报销了……结果，一场鬼也不晓得的混战发生了。库班人开始向我们射击，我们也对他们还击。这些满脸雀斑的野蛮家伙，向我们发起了攻击，士兵们捡回了枪枝，又向整个骑兵射击起来。那里就是这样发生了骚动……

“我们就从那里被抓走了。开头，把我们发落到了后方，后来又一下子发落到了喀尔巴阡山区；真是还没有来得及把裤腰带上的虱子抓完，就这样把你弄到了喀尔巴阡山。我们按照规定好的行程，夜间赶路。命令不让发出任何声音。原来奥地利的战壕离我们这里只有四十俄丈。我们住了一个白天，不准任何人露一露头。天下着雨，一片潮湿。在战壕里，烂泥没到脚脖那么深。我既没有入睡，也没有平静下来。简直没法活！就是在那里，我想：我们提溜着脑袋生活在战壕里，到底为的是啥？当时，我脑袋里憋着一个念头，就是同奥地利人聊聊天。他们的士兵也象我们这个样子在谈天。有一次，他们大声喧嚷：‘先生，你们为什么要打仗呢？’‘可你们为什么呢？’我们也大声嚷道。我们不能在远距离内讨论。我想：最好能善意地聚在一起谈谈。但是，没有可能！铁丝网把人们象牲畜一样隔开了；可是一瞧，奥地利人也和我们一样。我们大家离开了土地，就象小孩子离开了乳头。我们应该有共同的语言。

“一天早晨，我们刚刚醒来，一个哨兵在喊：‘瞧啊，弟兄们，一头野兽让铁丝网给挂住了！’我们听到，奥地利人就象谷荏

地里的一群白嘴鸦一样，哇啦哇啦地骚乱起来。我稍微伸出头一瞧，就在我对面，站着一只驼鹿。这是一种类似鹿，长着灌木状长角的野兽。它的角钩住了铁丝网。在我们左面的战线上，进行过激烈的战斗。这样，射击的枪声就把它赶到我们这里的战壕里。

“奥地利人大声地叫喊着：‘先生们，你们出来救救这只动物吧，我们不开枪。’我从身上脱下军大衣，一下子跑到了土埂上，往他们的战壕里一望，那里竖着一个个的脑袋。我刚往驼鹿一靠近，它就直立起来，简直象吊环一样地晃动着。有三个哥萨克跑出来给我帮忙。我们没有办法，驼鹿就是不让我们靠近它！这时，我忽然瞧见，一伙奥地利人跑过来了——他们都没带枪，只有一个带着剪刀。

“就是在这里，我们聊起来了。这时，我们的连长卧倒在土埂上，用步枪瞄向最边沿的一个奥地利人。可是，我用脊背挡住了他。军官不能驱散我们，我们就把奥地利人当成客人领到自己的战壕里。我开始和一个奥地利人交谈起来。可是我自己无论是用他们的语言，还是用我们的语言，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我觉得泪水哽住了嗓子。我碰了一下一个不太年轻的奥地利人，他长着一头火红的头发。我叫他坐在子弹箱子上，接着说：‘先生，我们跟你是什么敌人呀，咱们都是亲人！你瞧，咱们手上的茧子都还没有脱掉。’他仿佛搞不明白，可是，我看他心里是懂得的，就摸了摸他手上的茧子！他向我频频点头：是的，他在说，他赞同我的看法。于是，我们的周围便聚起了一堆哥萨克和奥地利人。我又说：‘先生们，我们不需要触犯你们什么，你们也不需要触犯我们什么，让我们来结束这场战争吧！’我看到，他又一次表示同意，但这些话他没有理解，便招呼我们到他们那里去。他说，那里有会说俄语的人。我们就走了过去。整整一连人都走掉了！这

一走，把军官们吓了个要死。我们来到奥地利人的战壕里。他们那里有个捷克人会讲俄语。我同刚才交谈过的那个奥地利人谈话，由他当翻译。我反复对我这个奥地利朋友说，我们不是敌人，而是亲人。我又一次用指甲搔了搔他手上的茧子，还拍了拍他的肩膀。他通过捷克人回答说：我是一个工人，一个钳工，我很同意你的意见。我对他说：‘让我们结束战争吧，老兄。这种战争是毫无意义的。刺刀应该对准那些让我们互相残杀的人。’我这番话感动得他掉下了眼泪。他回答说：家里撇着妻子儿女，当然同意结束战争。我们大声喧嚷起来。这时，他们的军官象公火鸡似地张牙舞爪地走了。我们结成了亲密的朋友，还在他们那里喝了可可。我们为所有的人找到了这样一种语言，用这种语言一说话，即使没有翻译，大家一听就能明白，便流着眼泪交谈起来，一个劲儿地接吻。

“我一回到我们的战壕里，就从枪里卸出枪闩，把它捣进了泥里，对上帝痛心地发誓，以后决不再向奥地利兄弟发一枪一弹，包括他们的钳工、工人和农民……就在这天夜里，把我们这个连撤出了战壕，在沙韦尔卡村附近被解除了武装。过了一段时间，革命发生了，沙皇在彼得堡垮台了……”

“等一等！”一个戴着布琼尼军帽的年轻哥萨克打断了讲故事人的话，“驼鹿后来怎样了呢？”

“驼鹿？这只鹿嘛，我们把它救了。那时候，我们看到它气喘嘘嘘的，角上带走了一大抱带刺的铁丝。这里的问题不在鹿，重要的是，人们开始用一种语言谈起话来了，可是你，却一个劲地叫唤：战争，战争！战争将为大家所了解：我们一见到他们的士兵，手上的茧子彼此碰到一块，我们就交谈起来了……”

“代表同志们，请进来啦！”不知是谁丁丁当地摇着铃，在舞

台上大声叫喊着。

人群把门口挤得水泄不通，谈话声嗡嗡地响成一片，代表们
密密麻麻的人群象潮水一样，向礼堂流进去。

一九二七年

学会仇恨

在战争中，树木也和人们一样，各有各的命运。我曾见过一片被我军的炮火轰击过的树林。不久前，从C村被击退的德国鬼子，曾在这座林子里设防，他们原想在这里固守下去，但是，死神把他们同树木一块送去见了上帝。在被击倒的松树干下，躺着死去的德国士兵，他们那些被炸成碎片的尸体，正在绿油油的蕨类植物中腐烂着；被榴弹炮炸裂的松树，尽管发出松脂的芳香，也还掩盖不住腐尸的令人窒息的臭气。似乎，这片弹坑累累的、被灼烧成栗褐色的不毛之地，散发着一股墓地的气息。

死神在这块林间空地上威严而肃穆地统治着，这里是被我军的炮弹开垦出来并翻耕一新了的。不过在这块空旷的地面上，中央还屹立着一棵奇迹般地幸存下来的白桦树。它那被弹片炸得伤痕斑斑的枝干，被风摇曳着，而那刚刚萌发出来的油光闪亮的枝叶，在风中飒飒作响。

我们穿过这块林间空地走过。一个红军通讯兵走在我的前面，他用手轻轻抚摸着这棵白桦树的树干，带着真挚的爱抚惊讶地问道：

“你在这里是怎样保全下来的呀，亲爱的？……”

然而，如果说松树是经受炮击之苦，象被切削下来似的，倒了下去，而在炸断的地方还留存了一些流着松脂的尖顶的话，那末，橡树却是以另一种方式迎接死亡的。

一棵老橡树长在一个无名小溪的岸边。开春，德军的一颗炮弹落到了这棵橡树上。树干被炸出了一个咧着嘴似的大洞，烧焦了橡树的半边。可是，在裂口处弯向水边的另一侧，在春天却令人惊讶地复苏了，而且还罩上了一簇簇新嫩的叶子。如今，这棵伤残的橡树，大概正在流水中浴洗着下垂的枝条，而它顶端的树枝，想必正竞相贪婪地把它尖削的、稀落落的叶子伸向太阳……

格拉西莫夫中尉个子高高的，稍微有点驼背，宽阔的两肩象鸢一样向上欠着。他坐在掩蔽部的入口，详细地讲述着今天的战斗，讲述着全营胜利击退敌军坦克的一次冲锋。

中尉消瘦的脸庞显得很平静，差不多有些缺乏热情，眯缝着一双疲倦而红肿的眼睛。他用颤抖的男低音讲述着，不时地把骨节突出的又长又粗的手指交叉在一起。这个姿势同他强壮的身躯，同他刚毅而勇敢的脸庞，显出一种奇怪的不相称，但是它却明显地表现出一种无声的痛苦，或者说令人心酸的深沉的思虑。

他正讲述着，蓦然沉默了下来，脸色在瞬息间变成了另一个样子：黝黑的脸颊苍白起来，颧骨下隆起的肌肉来回滚动着，一双凝视着前方的眼睛燃起了一团仇恨的火焰——这是一种不可熄灭的深仇大恨。我一见这个样子，禁不住向他注视的方向转过脸

去；这时我才看见，沿着树林从我军防御前沿走过来了三个德国俘虏，后面跟着一个押解他们的红军战士。这个战士穿着一身夏天的军便服，衣服褪了颜色，在太阳下几乎全是白色；头上戴的船形帽，被推到了后脑勺上。

这个红军战士慢悠悠地迈着步子，步枪在他手里有节奏地来回晃动着，刺刀尖在太阳下闪闪发光。德国俘虏也是象他这样缓步行走着，迫不得已地挪动着他们脚上那双沾满黄泥的短靴。

走在前面的德国鬼子是一个中年人，他凹陷的脸颊上长满浓密的栗褐色硬毛。走到同掩蔽部相对的地方，他皱起眉头向我们这边投来一瞥狼一般的目光，接着转过头去，边走边整理着挂在腰间的头盔。这时，格拉西莫夫中尉骤然暴跳起来，用粗厉而沙哑的嗓音向这个红军战士大声嚷道：

“你怎么啦，同他们散步吗？加快步子！快点带走，命令你的！……”

看来，他还想喊些什么，但激动得气喘嘘嘘的，陡然转过身去，很快沿台阶跑进了掩蔽部。谈话时在场的政治指导员，看我流露出惊异的目光，小声回答道：

“真叫人没办法，——神经质！他在德国人那儿作过俘虏，难道您不知道吗？您想个办法同他谈一谈。他在那里吃过很多苦头，打这以后，他看见活的希特勒匪徒，就受不了！看见死的没什么，甚至还感到高兴。可要是看见这些俘虏，那就是另一个样子了：或者是闭上双眼，脸色发白，直冒冷汗，或者是转身走开。”政治指导员向我挪近一些，转而用小声说：“有两回冲锋，我恰好同他在一块；他的力气象烈马一样，您最好能亲眼目睹一下，看他在做些什么……什么情况我都看见过，可他是怎样使用刺刀和枪托的，您知道吗，可怕极了！”

夜间，德军的重炮进行了骚扰炮击。他们每隔一段小小的间歇，就有步骤地从远处进行一阵炮轰。几秒钟以后，在我们的头顶上，高高的星空里，响起了炮弹的嘶鸣。鸣叫声越来越大，接着在我们后面的一个地方，在靠近公路（沿着这条路往前线运送弹药的汽车，白天非常密集）的方向，一片黄色的亮光一闪，爆起了一团火焰，接着是雷鸣般的爆炸声。

在炮击的间歇中间，汽车就在树林里停下来。这时候，听得到蚊子尖声细气的歌唱声，被炮声惊得惶惶不安的青蛙，也在附近的池沼中相互发出胆怯的呼唤声。

我们在榛树丛下躺下来，格拉西莫夫中尉一边用折断的树枝轰着蚊子，一边不慌不忙地讲述着他自己的经历。此刻我根据自己的回忆，把他讲述的这个故事写在这里。

“战前我在西西伯利亚的一座工厂里做机械师。去年七月九日，我应征入伍。家里有妻子、两个孩子和残废的父亲。哎，在送别的时候，可想而知，妻子哭得泪人似的。她临别时对我说：‘要好好保卫祖国，保卫我们。一旦需要，就献出生命，这是为了我们的胜利啊。’记得当时我笑着对她说：‘你是我的什么人，是妻子还是家庭鼓动员？我自己老大不小了，说到夺取胜利，我们会同法西斯拚杀的，不要担心！’

“父亲自然比较严厉，在这种时候，不教训一番是不行的。‘注意啊，’父亲说，‘维克托，格拉西莫夫这个姓，可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姓。咱家祖祖辈辈都是工人，你曾祖父曾在斯特罗加诺夫那里做过工。我们这一姓上百年来都是为国家干铁匠活的，提起这些，就是叫你在这场战争中作一个钢铁般的人。政府是咱们自己的，战前就把你培养成了预备役指挥官，你也应当狠狠打击

敌人。’

“‘一定做到，父亲。’

“往车站去的路上，我跑到区党委去了一趟。我们那里的书记是一位干巴巴的、惯于讲道理的人……嗨，我想，妻子和父亲在上路时还劝导了我一番，这位书记绝不会放过机会的，他一开口，准会讲半个钟头，一定的！可完全相反。‘请坐，格拉西莫夫，’我们的书记开了口，‘上路前，照老习惯，我们是要坐一会儿的。’

“我们坐在一块的功夫并不大，都沉默着。后来他站起身来，我看见他的眼睛似乎湿润了……瞧瞧，现在发生的事情多奇怪！我这样想。不过，书记到底开腔了：‘一切都很清楚，也很了解，格拉西莫夫同志。从你带红领巾的时候起，我就记得你是这样一个招风耳朵。还记得，后来你成了共青团员。十年来，你是怎样一个共产党员，我也了解。去吧，狠揍那些恶棍！党组织是信任你的。’我有生第一次同自己的书记接了吻。鬼了解他，我当时仿佛觉得，他全然不象是以前那样的面包干了……

“他这种诚恳的态度，让我感到热乎乎的，我走出区党委会时，又高兴又激动。

“这当中，妻子也让我感到宽慰。您知道，送丈夫上前线，任何人的妻子也不会愉快的；当然啰，我的妻子也痛苦得怅然若有所失。她总是想着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说，可她的脑袋里象吹着过堂风，所有的念头都飞光了。眼瞧着火车已经开动，她在我坐的那节车厢旁边走着，一边捏着我的手，一边很快地说：

“‘留心点，维佳，保重身体！别在前方着凉。’

“‘你怎么了，’我说，‘娜佳，看你说什么呀！我怎么也不会着凉的。那里气候很好，还很暖和呢。’

“我既为分别而痛苦，也为妻子那可爱而痴傻的话语感到快

慰。同时更对德国鬼子充满憎恨。好吧，我心想，你们——这些背信弃义的邻居，既然动了我们，那现在你们就当心着吧！头一天，我们就要扎进你们的胸膛！”

格拉西莫夫沉默了几分钟，静听着前沿上猝然爆发的对射的机枪声。后来，射击声也象突然响起来那样，一下子停止了。这时他又接着讲了下去：

“战前，我们工厂常从德国进口机器。在装配的时候，每个零件我往往都要摸弄四五次，从各方面仔细打量它们。没什么可说的，这些机器都是一双双灵巧的手做出来的。我读过一些德国作家的书，也很喜欢他们，因此不知怎地，总习惯以尊敬的态度看待德国人民。说实在的，有时也为这一点感到惋惜：这样勤劳而有天才的人民，竟然能容忍本国存在这种可恶的希特勒式的制度，可是这终究是人家的事情。后来，西欧便发生了战争……

“就这样，我上了前线，心里想：德国人的装备是强大的，军队也还不错。真见鬼，同这样的敌人打一仗，并且狠揍他们一顿，也是挺有意思的。我们在一九四一年也不是草包。说实在的，我并不指望这种敌人有什么特殊的道德原则，同法西斯打交道，哪能有什么道德原则呀！但是我从没想到，交战的对手竟是希特勒军队这种灭绝人性、丧尽天良的恶棍。嗯，这放后面再讲吧……

“七月底，我们的部队到达前线。投入战斗是在二十七日黎明。开头，因是初来乍到，感到多少有些害怕。他们用强大的迫击炮火压住了我们，但到傍晚，我们多少有些习惯了。接着，痛打了他们一记耳光，把他们从一个村子里赶了出去。在这次战斗中，我们抓住了一批俘虏，共有十五个左右。象现在发生的一样，我还记得清清楚楚的：我们押送着这些俘虏，他们一个个惊慌失措，面无血色；我们的战士这时候都被战斗磨炼得冷静了些，每一个人

都给俘虏拿来了他们所能拿来的一切：有的端了菜汤来，有的拿了烟草或烟卷来，还有的用茶水款待。他们拍着俘虏的肩膀，称呼他们为‘朋友’，问道：为什么打仗呀，朋友？……

“可是，一个正规军战士对这个动人的场面看了又看，最后说道：‘你们对待这些“朋友”太不象样子了！在这里他们都是“朋友”，可你们最好看一看，在前线那边，这些“朋友”是怎样干的，他们是怎样对待我们的伤员跟和平居民的。’他仿佛往我们头上泼了一桶冷水，说着，就扬长而去。

“很快，我们转入了进攻。这时，我们才真正长了许多见识……烧成一片废墟的村庄，数以百计惨遭枪杀的妇孺和老人，被糟踏得肢体不全的红军战俘的尸体，被强奸后又遭残杀的妇女、姑娘和幼女……

“有一个幼女特别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她才十一岁，看得出她是去上学的；德国鬼子抓住她，拖到菜园里，强奸后就把她杀害了。这个小姑娘还几乎是个孩子，她躺在被揉烂的马铃薯秧子上，四周七零八落地扔着沾满血污的作业本和教科书……她的脸蛋让双棱刀骇人地劈了多处，敞开的书包还紧紧抓在她的手里。我们用斗篷盖住她的尸体，沉默地站立在那里。随后，战士们沉默地散了去；可我还站在那里。记得，我愤怒得象发了狂似的，我低声念道：‘波洛温金·巴尔科夫。自然地理教科书。中学和非完全中学用。’这是我从乱扔在草丛中的一本教科书上读到的，我很熟悉这种课本，因为我的女儿也在五年级读书。

“这是在离鲁任不远的地方发生的。可是在斯克维拉附近的一个沟壑里，我们又偶然发现了一个虐杀被俘红军战士的刑场。您想必到过肉铺吧？真的，这个地方看起来大体上就是这个样子……满沟遍野的树枝上，吊挂着鲜血淋漓的躯体，没有手，没有

脚，有的还被剥掉了半边皮。在沟底，八个被害者的尸体单独堆放在一起。您在那里绝对无法看得出，哪件肢体是哪个被害者身上的，简直是一堆被垛起来的胡砍乱剁的肉。在这一堆上面，八顶红军战士的船形帽，象一叠盘子，一个个摞了起来……

“您想想看，有法子用语言讲述看到的这一切吗？绝对不能！没有这样的语言。这应当亲自看一看。总而言之，讲这些已经够了！”讲到这里，格拉西莫夫中尉沉默了好一阵子。

“可以在这儿抽烟吗？”我问他。

“可以。拿手掩住。”他用沙哑的嗓子回答。

抽完烟，他继续讲了下去：

“您会明白的，我们见识到法西斯的这一切所作所为之后，都变得残暴了，而且也不可能不这样。我们大家都懂得，我们不是在同一般人类打交道，而是在同一种生性凶残的劣等兽类打交道。原来，他们如今是以先前那种制造机床和汽车的精巧技艺，在杀害、强奸和处死我们的同胞。后来，我们又撤退了，但是格斗起来却一个个象凶神一样！

“在我们连里，几乎所有战士都是西伯利亚人。但是对乌克兰的土地，我们却简直是拚死拚活地去保卫的。我的许多同乡都在乌克兰牺牲了，可我们在那里却打掉了更多的法西斯。好吧，我们撤退了，但是也不让他们好好活着。”

格拉西莫夫中尉贪婪地深深吸了几口烟，用多少变了样的温和的口气说：

“乌克兰的土地多好啊，那里的大自然优美极了！每一个村庄都仿佛是我们的故乡，这可能是因为我们在哪里毫不吝惜地流下了自己的鲜血。要知道，正象人们说的，血是能够产生骨肉之情的……你瞧，要是离开某个村子，心这该死的东西，就拧得直痛。

舍不得离开，简直是难舍难分啊！我们离村时，相互间都不忍心对看一眼。

“……当时，我没有想过会被法西斯俘虏，但是偏偏碰上了这种事情。九月间我第一次挂彩，可是没有离队。二十一日，在波尔塔瓦省杰尼索夫卡附近一战，我第二次负伤，便作了俘虏。

“德军坦克冲破了我们的左翼，从坦克后面象水一样涌来了步兵。我们一边战斗，一边冲出包围。这一天，我连损失很大。我们两次打退了敌军坦克的冲锋，曾击毁六辆坦克和一辆装甲车，把大约一百二十个希特勒匪徒撂倒在一块玉米地里。后来他们调集来了几个迫击炮连，我们才不得不放弃了高地。在这里，我们从中午一直守卫到四点钟。

“这天从早上起，天气就热辣辣的。天空没有一丝云彩，太阳烘烤得使人透不过气来。迫击炮弹落点极密，记得战士们口渴得嘴唇都发黑了，我下达口令时哑不成声，仿佛声音是从别人喉咙里发出来的。我们跑过一个谷地时，一发迫击炮弹在我前面爆炸开来。我仿佛只见一根黑色的烟柱冲天而起，接着什么也不晓得了。原来一块弹片打穿了我的头盔，另两块击中了我的右肩。

“不记得我在昏迷中躺了多久，只知道人们的脚步声把我惊醒了。我欠起头一看，原来我并非躺在我摔倒的那个地方。我身上的军便服不见了，有人仓促给我肩上缠了绷带。头上的帽盔也没踪影了，脑袋被打上了绷带，但绷带没打牢靠，一端垂到了我的胸上。我刹那间想到，是我连战士拖着我在行进中给我裹的伤。这时我艰难地抬起头来，指望能看到自己人。可是，朝我走来的不是自己的弟兄，却是德国鬼子。原来是他们的脚步声把我惊醒了。好象在清晰的电影中一样，我真真切切地看见了他们。我用手在四周摸索着，周身没有了武器：无论手枪、步枪，甚至手榴弹，

都不见了。必定是我们弟兄当中，有人从我身上取下了子弹袋和武器。

“‘这就死吧，’我心想。这时刻我还能想什么呢？如果您要将这个情节写进未来的长篇小说，那就由您自己作主，随便写吧，可我当时却什么也来不及想。德国人已经离得很近了，我不想躺着死去。无非是不想躺着死掉，也不能这样做，明白吗？我使出浑身的劲，手按着地跪了起来。等他们走到我跟前的时候，我已经站稳了脚跟。我站着摇摇晃晃，生怕马上再倒下去，让他们把我躺着刺死。他们一副面孔我也记不得了，只记得他们围着我站在那里，不知说了些什么，都笑了起来。我开腔道：‘喂，你们打就打死吧，混蛋！打死吧，要不，我马上又要摔倒了。’他们当中有个人用枪托照我脖子打来，我一下栽倒了，但立刻又站了起来。他们哈哈笑了起来，一个人挥挥手说：‘往前走！’我挪动了脚步。我满脸都是干血块；头上伤口中的血，滚烫烫、粘糊糊的，还一直往外流；肩膀疼得厉害，右手也抬不起来。记得我很想躺下去，一步也不再往前走，可我还是走着……

“不，我根本不想死，尤其是不愿做俘虏。我一边无比艰难地克制着头晕、恶心，一边迈脚步——这说明我还活着，而且还能行动。哎哟，口渴让我难受得要命！我的嘴粘到了一块；迈着我的两脚，眼前总是晃动着一道黑黝黝的帷幕。我几乎失去了知觉，但我走着还是在想：‘只要我喝个够，稍微休息一下，就一定要逃跑！’

“在一个小树林边上，我们所有被俘的人都被集合起来，排了队。看得出来，所有的人都是邻近部队的。从我们团里，我只认出了三连的两个。大多数被俘人员都挂了花。一个德军中尉用不象样的俄语问，在我们中间有没有政治委员和指挥官。大家都缄默

不语。于是，他又一次发出命令：‘凡是政治委员和军官，向前两步走。’没有一个人走出队列。

“中尉在队列前缓步走过去，从中挑出了十五六个外貌象犹太人模样的人。他一个个问：‘是犹太人吗？’不等回答，就命令出列。他挑出的这些人，既有犹太人，也有亚美尼亚人和一般俄罗斯人。这些俄罗斯人无非是长了一副淡褐色的面孔和一头黑发。德国鬼子只是把他们往旁边稍带开一点，就当着我们的面用冲锋枪把他们杀害了。后来，我们被胡乱搜了身，没收走了我们的皮夹子和所有个人物品。我从来不把党证放在皮夹子里携带，怕的是丢失；总是把它装在裤子的里袋里，这样，在搜查时就没有被发现。人到底是一个绝妙惊人的创造物：我清醒地知道，我的生命系于一发之间，即使我不是在逃跑中被击毙，那在半路上反正也会让人杀死的，因为大量失血以后我难以同其他人一样行走。可是搜查完毕以后，我的党证竟然保存了下来。这让我高兴极了，甚至忘记了口渴！

“德国人把我们编成行军的队形，往西边赶去。道路的前后左右有强大的押解阵容，还开动着十来辆德军摩托车。他们不断催我们快走，我的力气要被耗尽了。我曾两次摔倒，站起来又走，因为我知道，要是多躺一会儿，让队列走过，我就会让他们击毙在半路上。走在我前面的一个中士，就是这样被毙掉的。他的脚挂了花，走起路来很艰难，边走边呻吟，有时甚至疼得直喊叫。队伍走了约一公里左右，他大声说道：

“‘不行了，走不了啦。同志们，永别了！’说着，坐到了路的中央。

“人们试图抬着他走，架起了他，但他又坐到了地上。象在梦中一样，我记得他那一副惨白的年轻的面孔，紧锁的眉头和被泪

水打湿的眼睛……队伍走过去了。他仍然留在后面。我回头一望，看见一个摩托车手正驶到他跟前，连座位都没离开，便从枪套里掏出手枪，对准中士的耳朵射了一枪。走到一条小河附近，几个落到后面的红军战士，又遭到了法西斯匪徒的枪杀。

“就在这里，我望着小河，望着破坏的桥梁和陷在路边的载重汽车，脸朝下栽倒了。是失去知觉了吗？不是，我清醒着。我直挺挺地躺在地上，嘴里弄得满是尘土。我恼火得咬牙切齿，沙在牙齿中间吱吱作响，可我却无法站立起来。同志们在我旁边跨着步子，一个同志低声说：‘起来吧，要不，会打死你的！’我用手撕扯自己的嘴巴，挤压眼睛，想让疼痛激使我站立起来……

“队伍已经走过去了。我听到了摩托车‘沙沙沙’向我驶近的车轮声。我到底站起来了！连回头看看摩托车也没有，就象醉汉一样，摇摇晃晃，强制自己赶上队列，站到了最后一排。穿过小河的德军坦克和机动车辆，把河水搅成了浑浊的泥水，可是，我们喝着这黄褐色的象温汤似的河水，却仿佛觉得比清冽的泉水还要甜。我把脑袋和肩膀都浸泡到水里，弄得湿淋淋的，这使我一下子神清气爽，焕发起了精神。此刻我满可抱定希望，不会再跌倒，也不会葬身在路途上了……

“刚一离开这条小河，在路上就遇到了一队德国中型坦克。它们向我们迎面驶过来。领头的坦克手看见我们都是些俘虏，便开足马力，向我们队伍横冲直闯过来。前几排被坦克一冲而散，乱作一团。步行的押送兵和摩托手观看着这情景，哈哈大笑起来，他们冲着从坦克塔口站出身来的几个坦克手，不知大喊大叫了些什么，接着挥了挥手。随后，把我们重新排好队，赶到了道路的一侧。对这些洋洋自得的人们，你能有什么可说的呢……

“这天傍晚和夜间，我没有试图逃跑，因为我知道，这是不

可能的，同时也由于我流血过多，变得异常虚弱，再说，这时对我们警戒得也很森严，任何逃跑的企图，都是不可能成功的。可是，我后来又为自己这晚不曾试图逃走，痛骂了自己一顿！早晨，我们被赶着穿过一个驻扎着德军的村庄。德军步兵往街上蜂拥而来，围观着我们。押送兵勒令我们小步快跑，穿过全村。这是要在开往前线的德军眼前竭力侮辱我们。我们跑着，有谁摔倒了，或者掉队了，他们就立即向谁开枪。到傍晚时分，我们才来到了战俘营。

“这是一个拖拉机站的院子，四周密密地围着带刺的铁丝网。里面肩并肩地站立着俘虏。押送队把我们移交给了战俘营的警备队，接着，那些人就用枪托把我们赶进了围墙。如果说这个战俘营是地狱，那一点不差。里面没有厕所，人们就只能就地解手，并且只好站立或躺卧在泥污和臭水中。最虚弱的人一般都已站不起身来。一昼夜给喝一次水，给吃一顿饭：一杯水、一捧湿黍子或一把发霉的葵花子，这就是一切。有的日子甚至根本就忘了给饭吃……

“下了两天滂沱大雨。把俘虏营里的污泥给翻了起来，遍地都有膝盖那么深。早晨，水蒸气从人们湿透的衣服上冒出来，仿佛马身上的汗气。可雨还是不停，倾盆如注……每天夜里都有几十个人死去。因为吃不饱，我们大伙都一天天衰弱下去。我还要外加一层痛苦：伤口的折磨。

“到第六天头上，我感到肩膀和头上的伤口疼得更厉害了。原来出现了化脓。后来，就闻到了一股恶臭味。俘虏营的旁边是集体农庄的马厩，那里住着红军战士的重伤员。一早，我去问警备队的一个军士，要他允许我去大夫那里看看病，因为有人告诉我，大夫正在伤员那里。这个军士俄语说得满不错，他回答说，

‘去吧，俄国佬，到你们的大夫那里去吧，他会马上给你帮忙的。’

“当时我不明白这是一个恶作剧，就高高兴兴地到马厩那边去了。

“在门口，我碰到了三等军医。这是一个顶没出息的人。他很瘦，显得疲惫不堪，受过种种折磨。因为吃的苦头太多，被弄到了半疯癫的地步。伤员们躺卧在用牲口粪铺成的垫子上，让马厩里浓烈的臭气熏得喘不过气来。大多数人的伤口都生了蛆，那些能动的伤员就拿指头或小棍儿，把它们从伤口里抠出来……这里还放着一堆死去的伤员，暂时没来得及把他们发落出去。

“‘您看见了吗？’军医问我，‘我拿什么帮您的忙呢？我连一条绷带也没有，一无所有！离开这里吧，谢天谢地，走开吧！可以把您的绷带解下来，往伤口上撒些灰。瞧门口那儿，是刚烧的灰。’

“我真的这样做了。那个军士在门口遇到了我，哈哈大笑起来：‘喂，怎么样？噢，你们的士兵真有高明的大夫啊！他给您帮忙了吧？’我想不哼不声地从他身边走过去，可是他一拳头打在我脸上，大喝道：‘你不愿回答我，畜牲？！’我栽倒了，他拿脚往我胸上、头上踢了好一阵儿，一直踢到他累了为止。我到死也忘不了这个法西斯匪徒，不会的，我绝不会忘记！他后来不止一次打过我。只要隔铁丝网看见我，他就命令我走出去，于是便不声不响地、全神贯注地打起我来……

“您想了解，我是怎样活过来的？我这就谈谈。

“战前在我没当机械师、还在卡马河上作装卸工的时候，我一次能扛两大袋盐，每袋一百公斤。我力气有的是，没灾没病，体质健壮；不过主要是，我不愿意死，抗敌心强。我想为了祖国，

我应当回到战士的行列中去，我回去是为了复仇，是为了同敌人战斗到底！

“这个俘虏营好象是个调配站，我被从这个营转移到约百十公里的另一个营。那里的一切，也象这个调配站布置得一样：高高的柱子上围着带刺的铁丝网，头顶上连个遮阳的棚子也没有，全是露天。给的吃食也是一样，不过有时候不是湿黍子，而是给每人发一杯煮熟的烂谷粒，或者是往营房拉来一些死马的尸体，让俘虏们自行分食。为了不至于饿死，我们也吃了这些死马肉，可是一吃，有成百成百的人死去……加上十月份寒潮来临，又不停地下雨，每早都结了薄冰。我们都为寒冷吃尽了苦头。我从一个死去的红军战士身上脱下了一身军便服和一件军大衣，但这也不能御寒，不过对于饥饿，我们倒是已经习惯下来了……

“看守我们的士兵，都因劫掠而变得肥硕了起来。从性格上看，他们都是从木椁头上出来的。看守我们的警备队，都是挑选出来的清一色的彻头彻尾的恶棍。看看他们是怎样寻开心的：早晨，一个上等兵走近铁丝网，通过一个翻译说：

“‘马上发吃的东西，从左边发起。’

“说完，这个上等兵就走开了。左面的围墙旁边，聚拢了所有还有力气站立的人们。我们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地等待着。成百上千个瑟瑟颤栗的活骷髅，在透骨的寒风中站立着，等呀等的……

“突然，从对面很快走出了看守人员。他们隔着铁丝网，把剁开的一块块马肉扔过来。饥肠辘辘的人群一哄而起，向那里急奔过去。于是，大家围绕着被弄得泥里巴叽的马肉，你争我抢，打起群架来……

“看守员们扯开喉咙，哈哈大笑起来。接着是长长的一梭子

机枪点射。立时出现一片喊叫声和呻吟声。俘虏们慌忙向左面的墙边跑去；可泥土地上却留下了被击毙的和受伤的人们……高个子的首席中尉，俘虏营的总管，带着译员走到铁丝网跟前。首席中尉差不多有点忍不住笑地说：

“‘分发食品的时候，发生了煽动性骚乱。要是再发生这类事情，我就命令把你们这些俄国猪，统统枪毙！把击毙的和受伤的收拾起来！’

“希特勒匪兵们聚集在总管身后，一个个都笑得死去活来。总管“精心”设计的这个恶作剧，真叫他们好好开心了一阵子。

“我们默默地把死者从营房里拖出来，埋到附近的山谷里……

“在这个俘虏营里，打人通常用的是拳头、棍子和枪托。打人对他们象家常便饭，为解闷要打人，为了开心也要打人。我的创伤本来收了口，后来大概老是着水和挨打，又裂口复发了，疼得简直难以忍受。可是，我仍然活了过来，没有放弃逃生的希望……我们简直就是躺在泥泞中睡觉，没有草垫，没有任何东西。我们总是紧紧挤成一团躺下来睡。整夜整夜都唧唧嚷嚷，吵吵嚷嚷，不得宁静：有的躺在最下边的泥地里了，冷得吃不消，要抱怨几声；就连躺在上面的，也冷得睡不着，要发几声牢骚。我讲的这些并不是梦，这是真正的人间苦难。

“日子仿佛在噩梦中，一天天这样过去了。我自己也一天天衰弱下来。这时候，怕连一个小孩也能把我推翻在地上。有时候，我惊骇地看着我这一双皮包骨头的、瘦骨嶙峋的手，心想：‘我怎么能从这里逃走呢？’每逢这时，我就咒骂自己，为我最初几天不曾试图逃走而悔恨。即便那时候让人家开枪打死，也不至于象如今这样，遭受这种可怕的折磨。

“冬天来到了。我们就扒开雪，睡在冻土地上。我们俘虏营

里的人越来越少了……终于公布了这样一个通知：再过几天，要派我们去做工。大家都活跃起来了。唤醒了每个人的希望，尽管这希望微小得很，但到底有了盼头，都盼着或许能有逃掉的一天。

“这天夜里静悄悄的，但天气很冷。黎明前，我们听到了隆隆的炮声。我四周的一切，都微微颤动了起来。等轰轰隆隆的声音又响起来时，不知是谁，突然大声说了一句：

“‘同志们，我们进攻了！’

“于是，不敢想象的事情发生了：象有口令似的，整个俘虏营都惊动起来了！甚至连那些几天来不能起床的病人都都起来了。四周响起了热烈的低语声和压低了的恸哭声……一个人在我旁边用女人似的声音，哽噎着大哭起来……我也……我也……”格拉西莫夫中尉很快把话声停了下来，沉默了片刻，等控制住自己，较为平静了些，才接着讲下去：“我的泪珠也在脸颊上滚动下来，并且在风中结成了冰……有人低声唱起了《国际歌》，我们也轻轻地用沙哑的嗓音唱了起来。哨兵们用机枪和冲锋枪向我们开了火，命令“躺下！”我躺下去，把身体压进雪中，象小孩似的哭了起来。可是，这已不单是高兴的眼泪，这也是为我国人民骄傲的眼泪。法西斯匪徒可以杀害我们这些手无寸铁的、饿得孱弱无力的人，他们可以虐杀、折磨我们，但他们摧折不了我们的意志，永远也摧折不了！我敢直截了当地说：他们征服不了我们！”

那天晚上，我没能听完格拉西莫夫中尉的故事。他被紧急叫到了参谋部。不过，几天以后，我们又见面了。窑洞里散发着霉湿味和松脂的气息。中尉坐在长椅上，佝偻着身躯，把手指交叉着的两只大手安放在膝盖上。我看着他这样子，心里禁不住想，瞧他

在战俘营里惯于打坐的这种姿势，交叉着指头，一连几个钟头沉默不语，只是一味难过地、无济于事地想呀想的……

“您要我讲讲是如何逃出来的吗？现在就给您讲一下。那晚听到隆隆的炮声以后，过了不久就把我们派去修工事去了。严寒已经过去，正是解冻天气。天下着雨。他们押着我们往俘虏营以北的方向走去。又是象以前的做法一样：精疲力竭的人们一倒下，就把他们毙掉了，留在半路上……

“不过，为了在地里拣个冻土豆而毙人的事情也发生过。一次，一个德国军士就为这杀了人。是这么回事：我们穿过一块土豆地，一个乌克兰人，姓贡恰尔的准尉，弯腰拣起了一个该死的土豆，想揣起它来。可是让这个军士发现了。他二话没说，走到贡恰尔跟前来，对准后脑勺就是一枪。接着，命令队伍停下来，整了队。‘所有这一切，都是德意志国家的财产，’军士一边说，一边用手向四周比划着，打了一个大大的手势。‘你们任何人，要是擅自乱拣东西，那就要统统枪毙。’

“我们经过一个村子，妇女们看见我们，就给我们扔来了几块面包和烤土豆。我们有的弟兄拣到了一些，其他人就没能拣得到；押送兵向窗户开了枪，同时，命令我们快速前进。可是孩子们是不害怕的，他们跑到前面几条街上，直接将面包放在道路中央，这样，我们就拣起了一些。我也顺手捞到了一大块煮熟的土豆，同旁边的一个同志均分了，连厚厚的皮也吃了下去。我好象觉得，一辈子也没有吃过这样好吃的土豆！

“工事修在一座树林里。德国人大大加强了警戒，因为他们给我们发了铁铲。不，不是给他们修工事，在我，是打算去破坏的！

“这天傍晚，我拿定主意要采取行动：我从我们挖的坑里爬出

来，左手握着铁铲，走到看守跟前……在这之前，我发现其他德国鬼子都在壕沟附近，除了监督我们组的这个看守外，附近没有看守队里的任何人。

“‘我的铲子断了……您看看，’我一边嘟哝着，一边接近看守。刹那间，我闪出了这样一个念头：要是用力不够，我头一下打不倒他，那我可就没命了。哨兵大概从我面部表情中发现了什么异常，他作了一个肩部动作，取下了冲锋枪；说时迟，那时快，我一铲子向他脸上打去——我不能向他脑袋上打，因为他戴着头盔。我到底用足了力气，德国鬼子一声没响，就仰面倒下了。

“我手里有了一支冲锋枪和三夹子弹。跑吧！可这时候，我不能跑。没力气，那就完了！我停了停，喘了口气，又勉强地小步跑了起来。山谷那边，林子很密，我向那边飞奔而去。现在我已记不清摔倒了多少次，反正站起来摔倒，摔倒了又站起来……但随着分分秒秒，我离得越来越远了。当我累得气喘吁吁，上气接不上下气，从密林中翻到山岗那边时，在后面很远的地方响起了几梭子枪声，接着传来了人的叫喊声。此刻，要抓到我已经不那么容易了。

“暮色降临了。倘若德国人忽然发现我的踪迹，向我接近，那我只要给自己保留最后一发子弹也就行了。这个念头鼓起了我的精神，我悄悄地、小心地前进着。

“我就在树林里过夜。离我半公里远的地方，有一个村子。但我不敢往那里走动，因为我担心撞上鬼子。

“第二天，游击队把我收容了。我在他们的窑洞里舒舒服服地休息了两个礼拜，经过养精蓄锐，身体变得结实了。起初，尽管我从大衣里子中拿出我的党证给他们看（我在俘虏营时把党证缝进了大衣），他们对我还有些怀疑。后来，我参加了他们的一些战

斗，他们对我的态度才一下子改变了。就在那里，我开始统计让我杀死的法西斯匪徒，我一直仔细计算着，到现在为止，数目已渐渐累计到了上百个。

“一月间，游击队员把我送过火线，我在战地医院躺了个把月。从肩膀上取出了迫击炮弹片。至于在俘虏营得的风湿病和其他疾患，等到战争结束以后再治吧。从战地医院放我回家养了养病。在家住了一个礼拜，就再也住不下去了。闷得慌啊，有什么办法！不管你怎么说，我的岗位到底是在这里。”

我们俩在窑洞口分了手。临别时，格拉西莫夫中尉带着若有所思的样子，看着日光明丽的林间小道，说道：

“……人们都真正学会了打仗，也学会了恨，学了爱。在战争这样的砥石上，所有的感情都正好得到出色的磨砺。爱和恨仿佛怎么也不能并存似的；知道嘛，俗话说：‘在一辆大车上，无法套得上马和胆怯的母鹿’。可是在我们手里，它们非但被套上了，而且拉得很好！我恨透了法西斯匪徒，因为他们给我们祖国、也给我本人带来了种种苦难；同时，我也深心热爱我国人民，不愿让他们在法西斯铁蹄下痛苦呻吟。这就是激发我、也是激发我们大家如此狠狠搏斗的原因。正是体现在行动中的这两种感情，在把我们引向胜利。倘若说，对祖国的爱一直珍藏在我们心里，直至我们的心脏停止跳动时为止，那末，我将永远把仇恨悬挂在刺刀尖上。请原谅，如果这些话有些难于理解，可我就是这样想的。”

格拉西莫夫中尉结束了他的谈话。在我们结识的这段时间里，他第一次露出了朴实而亲切的、孩子般的微笑。

我第一次发现，这位三十二岁的中尉，这位历尽艰辛苦难，但仍如橡树一样坚毅挺拔，顽强活过来的人，两鬓上已经亮闪闪

地露出了白发。这些让苦难染白了的鬓发，是一种透明的丝状物；粘附在中尉船形帽上的这种蛛网似的银丝，一接触到鬓角，就消失得无影了，无论我怎样留心观察，也看不到它们。

(1942年)

人的命运

献给1903年入党的苏共党员叶夫根尼娅·

格里戈里耶芙娜·列维茨卡娅

战后的第一个春天，在顿河上游显得格外温暖而有生机。三月底，温和的春风从亚速海一带习习吹来，两天两夜就把顿河左岸的沙滩赤裸裸地暴露出来了。草原上填满积雪的宽涧和谷地也膨胀起来，小河破开冰面，汹涌奔流，道路几乎完全无法通行。

在这道路泥泞、交通隔绝的恶劣条件下，我必须去一下布坎诺夫镇。距离并不算远，总共才六十公里光景，但是，要走完这些路，显然并不那么轻松。日出前，我和另一个同志出发了。一对吃得饱饱的马，紧紧套着挽索，吃力地拖着沉重的四轮马车。车轮陷进湿漉漉的掺和着冰雪的沙土中，一直陷到轮轴。经过一小时跋涉，在马的腰间和大腿上，后轡的

薄皮带下，已经出现了白色的肥皂沫样的汗花；这时，在早晨的新鲜空气里，散发着浓烈而醉人的马汗味和暖烘烘的柏油味，——这是因为马具上涂着大量的柏油。

走到马特别吃力的地方，我们就下车步行。正消融的雪在靴子底下发出噗哧噗哧的声音，走起来特别吃力。在道路两旁还结着一层薄冰，让太阳一照，犹如水晶似地闪闪发光。在这种地方走起路来就更加艰难了。走了六个来小时，我们才走出三十公里的路程，来到叶兰卡河的一个渡口。

这条不算大的河，躺在莫霍夫斯基村对面，夏天有几处经常干涸，如今在那赤杨丛生的河滨沼泽地里，水已漫出岸边整个一公里宽了。过河必须乘坐一种又破又小的平底船，小船顶多坐三个人。我们放马车回去。对岸集体农庄的棚子里，一辆古老的饱经风霜的“老爷”牌吉普车在等着我们，那还是冬天留在那里的。我和驾驶员两个人提心吊胆地坐在破旧的小船里。另一位同志同行李留在岸上。船一离岸，水就象小喷泉一样，从破船底的几个地方喷出来。我们用手头的东西堵住漏洞，不断把船里的水掏干。一小时之后，我们到了叶兰卡河的对岸。司机从村子里开出了小车，又到船边，抓住桨说：

“这条该死的小船要是在水中不会散架，我们大约过两小时回来，不可能再早了。”

村庄远远地向一边伸展开去，码头附近一片寂静。这样的寂静只有在人迹罕到的地方，在深秋或者初春才会出现。水上飘来潮湿的空气，送来霉烂的赤叶杨的苦涩味儿。从那淹没在远方淡紫色雾气中的普里霍贝尔草原上，微风送来了永葆活力的难以觉察的芬芳——这是不久前从积雪底下挣脱出来的土地散发的一种芬芳。

在附近的河滩上，躺着一排倒塌的篱笆。我坐到上边，想抽支烟，可是，把手伸到棉袄右边的口袋里一摸，真倒霉透了，发现那盒“白海”牌纸烟已经湿透了。在摆渡时，波浪从低沉的船舷上打进来，浑黄的河水一直溅到我的腰部。那时候我没功夫去想纸烟，扔下桨，就急急忙忙去掏水，以免小船沉没。现在我一边难过地悔恨自己的疏忽，一边小心翼翼地口袋里掏出那盒经水泡过的烟来，蹲下去，一支一支地把湿成褐色的纸烟摆在篱笆上。

中午到了。阳光灿烂，象五月那样热。我盼望着纸烟快快晒干。太阳晒得那么热，我真后悔穿着士兵的棉装上了路。这是开春以来第一个温暖的天气。我独自坐在篱笆上，完全沉浸在寂静与孤独之中，摘掉头上的那顶破旧的军棉帽，让微风吹干因拼命划船而累出的满头大汗。我凝视着那飘荡在浅蓝色的天空中的朵朵白云，无思无虑，十分惬意。

不一会儿，我看见，从村庄边的那座院子后边走出一个男人。他手里拉着一个小男孩，从个子看，约摸五六岁，不会再多。他们疲惫不堪地向这码头方向走来。但是，到吉普车旁边，他们拐了个弯向我走来。这个有点驼背的高个子男人，走到我跟前，小声小气地说：

“你好，老兄！”

“你好。”我握了握向我伸来的那只又大又硬的手。

他俯身向孩子说：

“乖乖，问伯伯好。瞧，他和你爸爸一样，也是个驾驶员。只是咱们开的是大卡车，他开的是这种小汽车。”

那孩子用天空一样明亮的眼睛直勾勾地望着我，现出一丝微笑，勇敢地向我伸出那绯红的冷冰冰的小手。我轻轻地握住这只

小手，询问道：

“你这小老头，手咋这么凉啊？外面这么暖和，可你却冻成冰棍啦？”

小傢伙露出幼稚而动人的轻信神态，紧偎在我的膝盖上，惊奇地扬起淡白色的眉毛。

“伯伯，我怎么会是老头儿呢？我完全是个孩子，我一点儿也没冻坏。手冷，是因为扔过雪球。”

父亲从背上摘下空空的行囊，没精打采地坐在我的身边说：

“我倒霉死了，带着这种旅伴！他简直把我拖累坏了。你迈大步，他就要小跑了，不得不迁就这样的‘步兵’啊。哎，原来只要一步走的，现在就要分作三步走。就这样，我和他还是相隔老远老远的，活象马和乌龟同行一样。你还得一眼接一眼地看着他，不然，稍一转脸，他就溜到水洼里去玩，或者在什么地方摘下一根冰棍儿，象吃糖一样含在嘴里咂起来。不，带着这样的侣伴旅行，真不是男人干的事，何况还得赶路呢。”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问道：“老兄，你怎么了，是在等候首长吗？”

我不好意思向他解释说我不是驾驶员，就回答说：

“要等一等。”

“他们从对岸来吗？”

“是的。”

“你知道不知道，船快到了？”

“大约两小时以后。”

“得好一阵子呢。哎，那咱们就休息一下，我也不急着到哪里去。刚才我走过来看到，一个驾驶员兄弟在晒暖，我就想，让我和他一块抽会儿烟吧。抽烟也罢，死去也罢，一个人总感烦闷。你生活得满富裕，还有纸烟抽呢！看样子，纸烟叫你弄湿了，是

吗？嘿，老兄，泡过水的烟，害过病的马，毫无用处了。还是来抽我的烟吧。”

他从草绿色单裤的口袋里，掏出一个破旧的烟荷包来，这烟荷包是红绸子做的，形状象管子。他解开烟荷包，我一看，绣在角上的题词是：“赠给亲爱的战士。列别江中学六年级女生。”

我们吸着辣乎乎的火烟，沉默了好半天。我正想问他，带孩子往哪里去，有啥急事需要在这泥泞的道上赶路，但是，他抢在我前边问道：

“怎么，你在战争时期一直都是开车吗？”

“差不多都在开。”

“是在前线？”

“对。”

“嗨，老兄，我在那里可吃苦吃到鼻子眼里去了。”

他把又大又黑的手放在膝盖上，佝偻着背。我从侧面瞧了瞧他，不知怎的感到一阵悲凉……你们可曾见到过那种叫人目不忍睹的、仿佛洒着一层死灰似的、充满难以忍受的忧愁的眼睛吗？我偶然相遇的谈话者就是这样一双眼睛。

他从篱笆上折下一根弯曲的枯枝，拿它在沙地上默默地划了一会儿，划出了一些莫名其妙的图形，然后说：

“有一次夜里，我睡不着，对着黑暗瞪大眼睛，想道：生活呵生活，你到底为啥要这样折磨我？为什么要这样惩罚我？不论是黑夜，还是白天，我都无法得到解答……不，永远也不会得到解答！”他象忽然想起什么似的，温存地推了推儿子说：“去玩吧，小乖乖，到河边去玩吧。在大河边，孩子们会捡到好玩艺儿的。只是要当心，别把脚打湿了。”

方才，在我们不声不响抽烟的时候，我偷偷打量这父子俩，就

吃惊地发现了一个奇怪的情况：小孩的穿着虽然很简单，但衣料却挺结实，一件薄薄的旧剪毛山羊皮挂里的短上衣，前襟显得长了些；玲珑的小皮靴稍大了些，里面可以套上毛袜；短上衣一只撕破的袖子上，排着精心缝补的针脚——这一切，说明了一个女人的照料，显露了一双能干的母亲的手。可是，父亲却是另一种样子：烧了几个窟窿的棉袄，补得粗针大线，潦潦草草；破旧的草绿色裤子上缝着很不象样子的补丁，显然是用男人的大针脚补缀上去的；脚上穿着一双几乎是全新的军用皮靴，但是一双厚厚的羊毛袜却被虫子蛀破了，看得出，它们没有沾过女人的手……看到这些，当时我想：“这不是一个光棍汉，就是跟老婆过得不够和睦。”

他目送儿子走去，声音低沉地咳了几下，又重新说下去，我全神贯注地听着：

“起初，我的生活是很平常很平常的。我生于1900年，是沃龙涅什省人。国内战争中在红军中呆过，是在基克维泽师里。在饥饿的一九二二年，我去古班给富农当牛做马，好歹活了下来。可是父亲、母亲和妹妹都在家里饿死了。只有我一个幸存下来，举目无亲，孤苦伶仃。唉，一年后，我从古班回到家，卖掉小房子，到了沃龙涅什城，开头在木工合作社做工，以后进入工厂，当了钳工。我很快结了婚。老婆是个孤女，从儿童保育院出来的。她可是个好姑娘！温顺、快活、聪明，而且会体贴人，我真是配不上她。她从小就知道生活为啥这样艰难，可能就是这个养成了她的好性情。在别人看来，她也来见得这样好，但是，我不是别人，我看得一清二楚。在我看来，没有比她更漂亮、更可心可意的人了，世界上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有！”

“我下班回来精疲力竭，有时候就凶得象恶鬼。可她没有、从

来没有用粗声恶气的话对待过我。她温存，娴静，总好象不知道咋着服伺你才好。收入虽说不多，她还是想方设法让你吃得香香甜甜的。你只要一瞧瞧她，火气就消下去了，过一会儿就由不得去拥抱她，会对她说：‘请原谅，亲爱的伊琳娜，我对你太粗野了。要明白，我今天的工作很不顺手。’于是，我们又言归于好，我也心平气和下来。你要知道，老兄，这对工作意味着什么？第二天一早，我霍地爬起床来，到工厂上班，啥活都会在我手里顺顺当当，得心应手。看，家里有个聪明贤慧的老婆，那作用该有多大呵！

“有时领薪水以后，一高兴就和同志们喝两杯，偶尔喝多了酒回家，东倒西歪地走在路上，在别人看来，想必是很可怕的。你会感到街道是狭窄的，别说本来就是小巷子啦。当时，我还是个健壮的小伙子，简直象魔鬼一样结实，能喝很多酒，就是醉了，自己也能磨蹭到家里。但是，有时最后一段路程我只能改成头挡^①，也就是说，是爬着走的，但还勉强爬得回去。这时，她对我既不责备，也不叫嚷，更不跟我吵闹。我的伊琳娜只是微笑着，并且是那么的小心，生怕我醉后发火气。她一边给我脱鞋，一边附在我耳旁说：‘靠墙睡吧，安德留沙。免得睡着了从床上滚下来。’这样，我就象麦袋子似地倒下了，一切都在眼前晃动。只是迷迷糊糊地听到，她用一只手轻轻地爱抚着我的头，还小声地说些亲切的话，意思就是说，她可怜我……

“早晨，上班前两小时她就叫起我，让我活动活动腿脚。她知道，我在醒酒前是不吃东西的，嘿，她就拿出一根腌黄瓜，或者还有什么爽口的东西，再倒上一小杯伏特加，劝说道：‘安德留沙，

① 头挡——汽车上的一种速度，最慢。——译者

快喝点投一投，解解酒吧。以后可甭再喝了，我亲爱的。’难道还能辜负这样的信任吗？我干杯后，不是用语言而是用眼睛感谢她，又对她亲了亲，就带着一股甜情蜜意上班去了。要是我喝醉了酒，她给我过不去，吵吵闹闹，骂骂咧咧的，那老天爷作保，我第二天还会去喝酒的。有一些家庭里就是这个样子，那些婆娘们真傻。我见过的这样的婆娘多了，我清楚得很。

“不久，我们的孩子出世了。头生是个儿子，过了几年又生了两个姑娘……从此，我和同事们不再来往了。领了薪水全部拿回家去。家里人口多了，也顾不到喝酒了。过个休息日，喝杯啤酒，也只限于一杯，仅此而已。

“在1929年，我对汽车入了迷。学会开车后就开起了载重汽车。后来我习惯了开车，就不想再回工厂去干了。开车对于我来说快活多了。这样一晃，就过去了十个年头，甚至我连觉察也没有觉察到，这些日子是怎么过去的。它们就象是在梦中过去的一样。呵，十年算得上什么！你随便问问哪一个中年人，他们察觉到生活是怎么过去的吗？他们一点也没有察觉！过去的事就象那沉没在迷雾中的远方的草原。早晨我刚到草原上去，周围什么都是透透亮亮的，可是一走出三五十里路，草原就迷雾一片。从这里望去，就已分不清哪是森林，哪是野草，哪是耕地，哪是荒原……

“这十来年我不分白天黑夜地干活儿。挣的工钱不少，我们的光景过得不比别人差。孩子们也招人喜欢：三个人的学习全是‘优秀’。大孩子阿纳托利特别擅长数学，连中央的报纸都提到过他。对这门课，他哪来的这么大才华，老兄啊，连我自己也不晓得。我只是觉得与我脸上有光，我为他自豪，真的，真值得自豪！

“十年当中，我们积攒下来几个钱，在战前盖了一座小房，有

两个房间，还有贮藏室和走廊。伊琳娜还买了两只山羊。此外还需要什么呢？孩子们喝的是牛奶粥，头上有房，身上有衣，脚上有鞋，可以称得上应有尽有。只是我的屋子盖得不是地方。划给我一块六百平方米的地皮，离飞机制造厂不太远。如果我的屋子盖在另一个地方，我的生活或许就是另一个样子了……

“就在这时，战争爆发了。第二天军事委员会下了通知，第三天我就要上军车。伊琳娜、阿纳托利和两个女儿——纳斯坚卡和奥柳什卡，一家四口人都来送我。孩子们都是好样的，很坚强。当然，两个女儿难免眼泪巴巴的。阿纳托利只象是怕冷一样，不停地抽动肩膀，那时候他已年满十六岁了。可是，我的伊琳娜……我们结婚十七年来，还没有一次见过她是那个样子。夜里，我这件衬衣的肩膀和前襟都叫她的泪水湿透了，第二天一早，还是那个样子……来到火车站，我连看她都不忍心：嘴唇哭肿了，披头散发，眼睛呆滞，简直象一个神经失常的人。指挥员刚一宣布上车，她一头扑在我的胸口，双手搂住我的脖子，筛糠似地颤抖，好象一棵快要砍倒的树……孩子们，还有我，对她好劝歹劝，都一无用处！别的妇女都在跟丈夫或跟儿子谈话，可我那位却紧偎着我，如同一片叶子粘在树枝上一样，还浑身哆嗦，说不出一句话来。我对她说：‘我亲爱的伊琳娜，控制控制自己，对我说上一句告别的话吧。’她一边说，一边啜泣，每吐一字，呜咽一声：‘我的……亲人……安德留沙……咱们……今生今世……再也……见不到面……面了……见不到了！……’

“我看着她那样子，难受得心就要碎了，可她又说出这样的话来。她本该明白，我跟她分别也不好受，并不是到丈母娘家去吃煎饼。当时真给急坏了！我用力拉开她的手，轻轻地推了推她的肩膀。好象是轻轻地只一推，可我当时有股傻劲儿，她站不稳

脚步，向后退了两三步，接着，她又伸出双手，挪着碎步向我走来，我对她嚷嚷道：“难道人家都是这样送别的吗？你干吗提前把我活活埋葬了呢？！”呵，我又抱了抱她，我看到，她已经神经错乱了……”

故事讲了一半，他突然打住了。在一片寂静中，我听到有什么东西在他的喉咙里翻腾着，发出咕都咕都的响声。他的激动传染给了我，我斜眼看了看他，在那死灰一般的眼睛里，却看不到一个眼泪疙瘩。他坐着，没精打采地低下头，只有那双不由自主地垂下的大手在轻微地颤抖，下巴和刚毅的嘴唇也在颤抖……

“不必了，朋友，不要想这些了！”我低声说，可他大概没听清我的话，接着就以极大的意志力控制住激动，突然以一种嘶哑的变得异样的嗓音说：

“一直到死，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刻，我都不能原谅自己，因为我当时推了她一下……”

他又长时间地陷入沉默。他试图卷一支烟，但是报纸破了，烟草撒在膝盖上。最后，他好歹卷成了一支，没命地大口大口吸着，这时才咳嗽着，继续讲他的故事：

“我从伊琳娜手里挣脱出来，捧着她的脸吻了一下，发觉她的嘴唇冰冷。我告别了孩子们，向车厢跑去，车轮已经转动了，我才跳上踏板。火车徐徐移动着，在我的亲人身边通过。我看到我那几个孤苦伶仃的孩子紧偎在一起，向我挥手。他们想笑，可笑不出来。伊琳娜双手抱着胸口，嘴唇蜡白，在对孩子们喃喃说着什么，舍不得眨眼地直望着我，整个身子向前倾斜，象是要顶着大风走来……她就是这样留在我一生的记忆里：一双紧紧抱住胸口的紫手，两片苍白的嘴唇，两只睁得大大的饱含泪水的眼睛……我在梦中见到的她，多半都是这个样子……当时我干吗

要推她一下呢？直到如今，一想起来，我的心就象让钝刀子割着一样难受……

“在乌克兰的白教堂附近，我们编了队，分给我的是一辆‘吉斯五号’^①车，我开着它上了前线。是呵，有关战争无须向你多讲了，你亲自看见，知道起初是什么样子。最初，我常常收到家里的来信，可只偶尔回一张明信片。往往在信上写几句这样的话：一切平安，少有接触。现在虽说退几步，但很快就要集中兵力，让德国鬼子尝尝我们的厉害了。还有什么好写的呢？日子过得叫人厌烦，没有什么心思写信。再说，我这个人不喜欢怨天尤人，叫苦连连。我最不能容忍那种满身是毛孩子气的人，他们有事没事，见天都给老婆或情人写信，信纸上眼泪鼻涕，一塌糊涂。说他的日子难过呀，艰苦呀，随时就可能被打死呀，等等。瞧瞧，这种穿裤子的畜生，就知道鼻涕一把泪一把地诉苦，向人们寻求同情，可就没有设身处地地想想，那些孤苦无靠的妇女和孩子，在后方并不比我们好受。整个国家就靠她们维持！要在这样的重压下不至于垮台，我们的女人、孩子需要有怎样的肩膀啊？瞧，她们没有被压倒，到底坚持过来了！可那些流鼻涕抹咸水的胆小鬼，还写那种怨言满腹的信，这就好比用棍子绊劳动妇女的腿。她们接到这种信，含辛茹苦的人啊，就会耷拉下双手，没心思干活儿了。不能这样啊！你既然做一个男子汉，既然做一个战士，要是需要的话，就应该吃得下辛苦，忍受一切。要是你身上的女人气比男人气还要多，那就干脆穿上裙裙，把自己干瘦的屁股撑得肥实些，起码从后面看上去象是个娘们儿。这样你就可以去给甜菜除除草，挤挤牛奶，不要上前线。前线那边没有你，真

① “吉斯五号”——莫斯科斯大林汽车厂生产的一种大卡车。

味就已够呛的啦！

“不过，我打仗也不满一年……在这段时间内，我受过两次伤，但都是轻伤：一次伤了臂上的肌肉，另一次伤了一条腿；第一次是飞机上的子弹打中的，第二次是弹片碰伤的。德国人从旁边和上头给我的汽车打了许多窟窿。可我，老兄，开始还算走运。走运，走运，最后还是走到绝路上去了……一九四二年五月，在洛佐文基城下，我在一种狼狈不堪的情况下当了俘虏：当时德国人的攻势很猛，可我们的一个一百二十二毫米榴弹炮炮位上快要没有炮弹了，给我车里装上炮弹，绳捆索绑地载满一车，我自己在往车上装的时候，累得肩膀上的军装都被汗水浸透了。得拼命紧赶啊，因为战斗已经打到我们身边来了：左边不知是谁的坦克在隆隆开动，右边在射击，前边也在射击，而且已经开始闻到焦糊味了……”

“我们的汽车连长问我：‘你能窜过去吗，索科洛夫？’其实这时根本没有什么可问的。在那边，我们的同志可能正在牺牲，难道我能呆在这里搔痒痒？我回答道：什么话！我一定窜过去，没说的！‘好吧，’他说，‘那就快出发吧！开足马力！’”

“我立即出发了。我活这么大，从没开过这样的飞车！我知道，运送的不是土豆，运输这种东西需要特别小心。但是，当时兄弟们正在那里赤手空拳地和敌人浴血奋战，一路上又都是炮火连天，硝烟弥漫，哪里还顾得上什么小心！车子跑了十二三里路的样子，眼看着就要拐到村道上，开到炮台所在的山谷里去了。谁知抬头一看，哎哟，我的圣母娘娘，我们的步兵在大路两旁的田野上奔跑着，迫击炮弹在他们的队伍中间爆炸开了。我该怎么办呢？要不要转回去呢？我加大油门，全速冲过去！距炮位约莫还有两里路的光景，车子拐到了村道上，但是，老兄呵，我却没有

开到自己的弟兄那里……我的车旁落下一颗重型炮弹，看来是远射炮打来的。我连爆炸也没听到，什么都没有听到，只觉得仿佛脑袋里有个什么东西轰地一下爆裂了，别的什么也记不清了。当时怎么活了下来，我什么也不知道；在离排水沟七八米的地方躺了多长时间，我也不得而知。待我清醒过来，怎么也无法站起来：我的脑袋在抽搐，浑身颤抖，好象在发疟子，眼里一片漆黑，左肩膀好象有什么在吱吱发响，周身剧痛，好象被人狠揍了两天两夜。我在地上爬呵爬，爬了好半天，才勉强支撑起来。不过，我还是怎么也不明白，这是在哪里？我出了什么事？我完全失去了记忆力。我怕再倒下去。怕再倒下去，起不来了，就要完蛋了。我站立着，摇摇摆摆的，象是暴风中的杨树。

“我恢复知觉后，稍微清醒了一下，往四下里一看，心象是叫谁用老虎钳子夹住了：我拉的炮弹在四周横七竖八，躺了一地，我开的那部车在不远的地方翻了个底朝天，车身被打得稀巴烂，战斗已在我的后边进行……这可怎么办呢？”

“不瞒你说，这时候我两腿禁不住发软，身子就象割掉的草那样倒下来，因为我知道，我已是法西斯分子的俘虏了。在战争中，这种情况是常有的……”

“唉，老兄，当你明了自己被迫沦为俘虏的时候，心情是很沉重的。谁没有亲身经历过，他就无法真正体会到人在这时是啥心境。”

“就这样，我躺在地上，听到坦克隆隆滚动着。四辆德国中型坦克开足马力，从我身旁驶过，往我刚才运来炮弹的方向开去……这让人心里是一种啥滋味呵？随后，拉着大炮的牵引车开了过去，炮车开了过去，最后一小股步兵也开了过去，大约不多于一个作战连。我用眼角向他们瞟了瞟，又把脸贴在地上，闭上了

眼睛：看到他们我就噁心，打心眼里厌恶他们……

“我以为都过去了，就欠起头来。谁知六个自动枪手在大约离我一百米左右的地方大踏步走来。我一看，糟了，他们拐下大路，直向我走过来。一声不响地走来了。‘坏了，’我想，‘我这条命完了。’我不想躺着死去，坐了起来，随后就站起了身。他们其中的一个，在离我几步远的地方，从肩上猛一拉，把自动枪摘了下来。你瞧，人这个玩艺儿挺有意思：在这一会儿，我既不慌张，也不胆怯，只是看着他，心里想：‘他要马上给我一梭子呢，可会打在哪里呢？打在脑袋上，还是打在胸口上？’好象他射穿我身上不同部位，会让我变成不同的鬼一样。

“这是个年轻的家伙，样子长得还端正，脸黑黑的，嘴唇薄成一条线，眼睛眯缝着。我心里马上想到：‘这家伙会毫不犹豫地打死我的。’一点不错，他举起了自动步枪。我直视着他的眼睛，一声不响。忽然发现另一个——大概是个上等兵吧，岁数大一些，可以说上了些年纪——不知嚷了句什么，一把将那年轻人推到一旁，走到我跟前，叽哩哇啦地说了一阵子德国话，弯起我的右肘，摸摸我的肌肉。摸了以后，说道：“噢——噢——噢！”说着指了指道路和太阳落山的地方，意思是说，走吧，到我们帝国当牛作马去吧。这狗崽子，竟摆出主人的架势来了。

“可在这时，那个黑面皮的小子，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的靴子——我的那双靴子样式是挺好的——他用手比划着说：‘脱下来！’我坐在地上，脱下靴子，送给了他。他不客气地从我手中夺了过去。我又把裹脚布解下来递给他，而且从上到下把他打量了一下。他突然叫起来，用德国话破口大骂着，又一次抓起了自动步枪。其余的几个人都哈哈大笑起来。他们一边笑，一边安安生生地走开了。只有这个黑黑的家伙，在走到大路上以前，回过头来，闪着

狼羔子似的眼睛，连连看了我三次，仍在生气。我真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好象是我从他脚上脱下了靴子，而不是他脱下了我的靴子。

“有什么办法呢，老兄，我已没有可藏的地方了。只得走上大路，用绕着弯子的沃龙涅什土语，狠狠地臭骂了他们一阵子，接着迈步向西方走去，当了俘虏！……当时，让我步行实在不行，一个小时只能走二里来路，不能再多。好象喝醉酒一样，你想着往前走，身子却东倒西歪，迈不开步。没走多远，一队我方的被俘人员赶了上来，都是我们那个师里的。有十来个德国自动步枪手押送着他们。那个领队的敌人赶上我，连句话都没说，一下举起自动步枪的枪托，狠狠地朝我头上打了一下。要是我这会儿倒下来，他接着就是一梭子子弹把我结果在地上。但是，我的弟兄们把我抱住了，并且推到他们当中，扶我走了半个多小时。我清醒过来以后，其中一个兄弟小声地告诉我：‘千万不能倒下去！尽全力走吧，不然的话，他们会打死你的。’于是，我拼尽吃奶的力气走下去。

“太阳刚一落，德国鬼子就加强了押送队伍，从卡车上下来了二十来个自动步枪手，加快驱赶我们。我们当中有些伤势重的，跟不上队伍，就不由分说被枪毙在路上。有两个弟兄想逃跑，但他们没考虑到，在这月夜里，光秃秃的原野被看得一清二楚。唉，这两个同志当然也被打死了。半夜里，我们来到一个被烧了一半的村庄。我们被赶到一座屋顶被打坏的教堂里去过夜。石头地板上没有一根麦秸，可我们大伙又没有军大衣，只穿着一身单军服，因此，没有一点可铺的东西。有几个人连上衣都没有穿，只穿了一件粗布衬衣。这多数是些下级指挥员。他们都把军官服扔掉了，为的是让敌人无法认出他们的身份。还有一些炮手也没穿军服，因

为他们原先都是光着身子在大炮旁边干的，结果就这样光着身子被俘虏了。

“夜里下了一场大雨，淋得我们一个个浑身都湿透了。教堂的圆顶不知是让重炮还是让飞机炸毁的，圆顶四周的屋顶也被弹片炸得净窟窿眼子，连祭坛上都找不到一块干地方。这样一来，整整一夜我们就只得在教堂里晃晃悠悠，好象关在黑羊圈里的一群羊。

“半夜光景，我听到有人推着我的胳膊问：‘同志，你没受伤吗？’我回答他：‘你需要什么，兄弟。’他接着说：‘我是军医，’或许我能给你帮点忙吧？’我向他叫苦说，我的左肩膀格噶格噶直响，而且肿了起来，还疼得厉害。他果断地说：‘把上衣和衬衫脱下来。’我脱了下来，他用细细的手指在我的肩膀上摸了又摸，捏了又捏，痛得我眼前直发黑。我咯吱咯吱地咬着牙，对他说：‘你大概是兽医，不是给人看病的大夫。你这不安好心肠的，干么人家哪里疼，你偏往哪里狠狠地按呢？’他还是照样地摸着，恶狠狠地对我说：‘闭上你的嘴！再跟我瞎啰嗦，有你好瞧的，我还叫你疼得更厉害呢！’他一边说着，一边重重地拉动我的胳膊，痛得我两眼直冒金星。

“我清醒后，向他说：‘你这是要干什么，可恶的法西斯分子？我这条胳膊本来就叫打碎了，可你又这么折腾它。’我听到他轻轻地笑了起来，说道：‘我想你要用右手揍我呢，可你原来是个挺老实的小伙子。你那条胳膊并没被打坏，只是脱臼了。我已经给你捏上了。喂，现在怎么样？你觉得轻点了吗？’真的，我觉得全身的疼痛，不知跑到哪里去了。我打心眼里感谢他，向他道了谢。可他却又在黑暗中摸索着走过去，小声地问：‘有受伤的吗？’瞧瞧，这才是真正的大夫呢！他当了俘虏，还在黑暗中做着自己伟大的

事业。

“这是一个不平静的夜晚。在我们排成双行被赶进教堂的时候，押送队长就曾警告过，关进里面，不放我们出来大小便。真不凑巧，就在这晚，我们其中的一个教徒急着出来大便。他忍了又忍，后来实在忍不住，就哭了起来。他说：‘我不能糟蹋神圣的教堂呀！我是个信徒，我是个基督教徒！弟兄们，叫我如何是好呢？’你知道，我们这些人会怎么样呢？有的笑，有的骂，有的给他出了五花八门的馊主意。他惹得我们大家都很开心，可是，没想到这件事竟了结得很悲惨：他敲起了门，请求出去。嗨，一下子惹出了一场大祸：法西斯分子隔着门，横扫了一长梭子弹，这个教徒被打死了，另外还打死了三个人，一个受了重伤，天亮前就死去了。

“我们把死者放在一个地方，一一坐下，这才安静下来，各自想起了心事。大伙都感到俘虏营的生活一开头就很不妙……过了一会儿，大伙压低嗓子，交头接耳地说起话来：谁是从哪里来的，哪个省的人，怎么当的俘虏。在黑暗中，那些来自同一个排或同一个连的同志们，有的找不到，就轻轻地彼此叫唤着。我听到身边有两个人在小声说话。一个说：‘明天上路以前，要是叫我们排起队来，把政委、共产党员和犹太人都供出来，那你，排长，可不要躲起来！这件事，你无论如何也逃不掉。你以为脱掉上衣，就可以装成士兵吗？跑不掉你的！我可不愿意为你担保。我第一个要指出你来！我知道，你是党员，还动员过我入党呢，现在你可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说这话的人就在我身边，跟我并排坐着，在左边。在他的另一边，一个年轻人的声音回答道：‘克雷日涅夫，我向来怀疑你不是个好人，特别是那一回你拿不识字作借口，拒绝入党。但是，我从来也没想到，你会成为叛徒。要知

道，你是七年制中学毕业的啊！’那傢伙却懒洋洋地回答排长说：‘哼，毕业的，又怎么样？’他两个沉默了好一阵儿。后来，从声音上判断，那个排长又悄悄地这样说：‘你不要供出我来，克雷日涅夫同志。’那傢伙却轻轻冷笑着说：‘是同志的，都留在战线的那一边了，我可不是你的同志，你也不要央求我，不管怎样我都要说出你的。到底还是自己的性命要紧呵！’

“他们不说话了。可是这种无耻的行为气得我直打哆嗦。‘不行’，我想，‘我决不让你这个狗崽子出卖自己的指挥员！你甭想从我手心里走出教堂，你只能象牲畜一样让人拖出去！’天刚发亮，我看见一个厚嘴唇阔脸庞的小子仰八叉地躺在我的旁边，头枕着双手；这个人的旁边坐着一个精瘦的小伙子，翘着鼻子，脸色苍白，手抱着双膝，身上只穿一件衬衫。我想：‘是啊，这小伙子对付不了这匹五大三粗的骗马！我不得不结果了他。’

“我碰了碰小伙子的胳膊，悄悄地问：‘你就是排长吧？’他只是点了点头，什么也没回答。‘这东西想出卖你吗？’我指着躺在地上的那傢伙说。他又点了点头。‘喂，’我说，‘抓住他的腿，不要叫他踢，快快！’我扑到那傢伙的身上，用手死死地掐住他的喉咙，他连喊一声也没来得及。我压住他掐了几分钟，才慢慢直起身来。这个叛徒让报销了，舌头搭拉着歪到了一边！

“做了这件事后，我心里非常不好受，很想洗洗手，好象我掐死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只小爬虫……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杀人，并且是个自己人……不，他那里还算是自己人呢？他比敌人更坏，是个叛徒。我站了起来，对那个排长说：‘同志，离开这里吧，教堂大得很呢。’

“第二天早晨，正象克雷日涅夫说的那样，在教堂旁边，他们叫我们所有的人都排上队，四周由自动步枪手团团包围着。三个

党卫队^①的军官开始寻找他们认为的罪人。他们询问，谢是共产党员，谁是指挥员，谁是政委，但是，一个也没发现。实际上，我们当中差不多有一半是党员，还有指挥员，当然也有政委。正是这个缘故，才没有出现一个出买同志的坏蛋。他们从我们二百多人当中只抓出了四个人：一个犹太人和三个俄罗斯士兵。这三个俄罗斯人所以遭难，是因为他们有浅黑色的皮肤，鬈曲的头发。德国鬼子走到他们面前，问道：‘是犹太人吗？’他们说是俄罗斯人，可德国鬼子连听都不听。‘出来！’——接着，就完了。

“枪毙了这几个倒霉的人以后，我们又被赶着继续朝前走去。那个和我一块掐死叛徒的排长，直到波兹南^②，一路上始终和我并排走着。头一天，他还不时地握握我的手。到波兹南，就是因为这个，我们被德国人分开了。

“老兄，你看，就是这么回事，我从被俘的第一天起，就想跑回自己的队伍中来，但是我想，得有十分把握再跑。在到达波兹南，送我们进正式的集中营以前，终于遇到了这样的机会：五月底，派我们到集中营附近的树林里给死去的战俘挖坟墓。当时，我们许多弟兄死于痢疾；有一天，我一边挖着波兹南的泥土，一边向四下张望，发现有两个卫兵坐在地上吃东西，还有一个坐在太阳底下打瞌睡。我丢下铁锹，悄悄地走到一片灌木丛后面……随后，我就朝着太阳升起的方向直奔而去……

“看起来，卫兵们没有及时发觉。我自己也不知道，当时我那么虚弱，哪里来的力气叫我一昼夜跑了八十来里。但是，我的梦想成了泡影：第四天，在离该死的集中营已经很远的地方，我又被

① 党卫队——德国法西斯的嫡系部队。——译者

② 波兹南——波兰人的一个省会。——译者

抓住了。几条警犬沿着我的脚印追来，在没有割过的燕麦地里发现了我。

“第四天一早，我不敢在没有遮挡的田野上赶路，就在离森林至少有五六里远的燕麦地里躺下休息。我用手掌搓下麦粒，稍微吃了一点儿，又在口袋里装了些作干粮，忽然听到汪汪地狗叫声和摩托车的马达声……叫声越来越近了，我的心儿几乎停止了动。我趴在地上，用手抱住头，为的是不让狗咬伤我的脸。喝，它们跑到跟前，一下子就把我身上的破衣服撕得稀巴烂，弄得我就象刚落生时一样，赤条条的。在燕麦地上，狼狗们把我拖来拖去，任意折腾了个够，最后，一条公狗用前爪搭在我的胸口，瞄准我的喉管，不过没有再继续动我。

“德国鬼子骑着两辆摩托车开来了。他们先是自己动手，毒打了我一顿，接着，又纵狗扑到我身上，咬得我遍体鳞伤，皮开肉绽。就这样，他们把我光着身子，血淋淋地带回集中营。为着逃跑，我坐了一个月的禁闭。但是，我到底还是活下来了……给我留了一条活命！

“老兄啊，每回忆起这件事来，我都一阵子难受。再要讲出当俘虏时吃的苦头，那就更加难受了。一想起在德国所受的非人的苦难，一想起那些在集中营里被折磨死的同志们，朋友们，——心就好象不是在胸膛里，而是在喉咙里跳了，就难以喘得过气来。

“在被俘的两年中，他们把我赶到东，赶到西，哪里没有去过！在这段时间里，我走遍了半个德国：我到过萨克森，在硅酸盐厂里干过活；到过鲁尔区，在矿井里运过煤；也到过巴伐利亚，在土方工程中累断了脊骨；我还到过绍林吉亚；他妈的，在德国的土地上，我哪里没到过。他们那里的自然景色处处都不相同，但是，枪杀和鞭打我们的弟兄，却到处是一模一样。那些该五雷轰

顶的坏蛋和寄生虫，打起人来那个狠毒劲儿，在我们这里就连打畜牲也从来没有过。他们拳打脚踢，怎么狠毒怎么来；什么橡皮棍子、五花八门的铁器，顺手抓起来就打，更甭说枪托和其他木器棍棒了。

“他们这样打你，就因为你是俄罗斯人，就因为你还活在这世界上，还能给他们这伙流氓出大力干活。他们打你，也就因为你不该这样用眼张望，不该这样走路，不该这样拐弯……他们打你，只是为了有朝一日要把你打死，为了让你倒下时咽自己的最后一滴血。德国所有的焚尸炉，恐怕也不够我们所有的人用……

“到处都给我们吃一样的东西：二两重的代用面包，掺着一半锯末，再就是一些用冬油菜做的稀汤。开水——有的地方供给，有的地方还没有。其实，用不着我多费口舌，你只要寻思寻思，我战前的体重是一百七十二斤，可是到秋天就不到一百斤重了，这就说明了一切。我当时瘦得真可以说是皮包骨头，甚至连支撑这把骨头的力气都没有了。可是，还是经常给你派活，又不许你说半个不字。这么多死沉死沉的活儿，就连拉货的马也会吃不消的。

“九月初，我们一百四十二名苏联战俘，被他们从库斯特林城郊的集中营里，转移到离德累斯顿城不远的6—14号集中营里。在这个集中营里，当时有我们的人近两千名，大家都在采石场里当苦力，用手工把德国的石头凿下来，打开粉碎。每人每天的劳动定额是四立方米。要知道，当时大家即使不干活，也已经半死不活了。结果是，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我们这一百四十二个人，过了两个月，只幸存下来五十七个人。老兄，怎么样？你说惨不惨？当时，我们还没来得及掩埋自己的弟兄，可集中营里又流传着一个消息，说什么德国鬼子已经占领了斯大林格勒，正继续向西伯

利亚挺进。灾难一个个接踵而来，压得你的眼睛离不开地面，仿佛连你自己也在请求把你掩埋在这人地两生的德国异乡，可集中营的看守们呢，天天在那里吃啊唱啊，一个劲地寻欢作乐。

“有一个晚上，我们下工回到了营棚。因为下了一整天雨，我们身上的破衣服几乎都能拧出水来；大伙儿在冷风中象狗一样直打哆嗦，冷得上牙碰不上下牙，我们既没有地方烘衣服，也没有地方烤火，再加上肚子里饿得比死都难受。可是，在晚上，我们连一点下肚的东西也没有。

“我从身上脱下湿漉漉的破衣服，扔到木板床上，说道：‘他们要我们采四方石头，可我们每个人的坟上只要一方就够了。’只是说了这么一句话，但是我们中间出了一个坏蛋，把我的这句牢骚话向集中营的警卫队长告密了。

“集中营的警卫队长，或者照他们的说法，俘虏营长，是个德国人，叫摩勒。他个子不高，可很结实，浑身上下白得出奇：头发是白的，眉毛、眼睫毛也是白的，甚至连那双凸出的眼睛也是淡白的。他的俄语讲得和咱们一样，也是把重音打在“O”上，好象是个土生土长的伏尔加河流域的人。他骂起娘来可是个好样的，吓人得很。这套本领，也不晓得这个畜牲是从哪里学来的？通常，他叫我们在住区（他们把集中营的棚子叫住区）前面排起队来，他同一群党卫队匪徒，向侧上方伸着右手，在队伍前面走着。摩勒的手上戴着皮手套，为保护手指，在皮手套里还衬着铅垫；他一走，一边每隔一个人打一下我们的鼻子，打得鲜血直流。还美其名曰：‘预防感冒。’每天都是如此。集中营总共有四个住区，他今天给第一个区进行‘预防’，明天给第二个区进行‘预防’，这样一直轮流下去。这是一个很认真的恶棍，工作起来连个休息日也不过。这个笨蛋，有一件事他可无法理解：为了使自己发火，他在

动手打人之前，总要在队列前骂上十分钟；他一上来就奶奶娘地乱骂一通，可我们听了反倒有些轻松，因为我们仿佛听到了自己的乡土话，就象是从家乡吹来的一阵微风……他要是知道，他的这种骂法只能给我们带来满足，那他就不会用俄语骂了，怕只会用他们的德语。只有我的一个莫斯科朋友，对他极为不满。这个朋友说：‘他骂人的时候，我就闭上眼睛，好象已经回到了莫斯科，坐在扎采普街上的啤酒馆里，十分想喝啤酒，想得直到头晕眼花的地步。’

“就是这个警卫队长，在我说了有关几方石头的话之后，第二天，便把我叫了去。那天晚上，我们集中营的棚子里来了一个翻译，带着两个卫兵。他问：‘哪一个姓索科洛夫？’我答应了一声。‘跟我们走，营长亲自叫你去。’很清楚，营长为什么要我去。是要惩罚我。我告别了同志们。他们也都知道，我这是去死的。我叹了口气，便走了。走在集中营的院子里，抬头看了看星星，也和星星告了别，心想：‘你算吃苦吃到头啦，安德烈·索科洛夫，第三百三十一号，——这是我在集中营的编号。’不知怎么，我开始怜惜起伊琳娜和孩子们来了，不过后来这种怜惜的感情消失了。我开始鼓起勇气，为的是象一个士兵应该做的那样，看着手枪的枪口而无所畏惧，也为的是不让敌人在最后一分钟看到我是难分难舍地离开人世的……

“在警卫队长的办公室里，干干净净，窗台上放着鲜花，好象我们这里讲究的俱乐部。桌子周围坐着集中营的所有长官，共五个人。他们狂饮着烧酒，吃着咸肉。在他们面前的桌子上放着一大瓶刚开盖的烧酒，还有面包、咸肉、渍苹果，各种打开的罐头食品。我看了一眼这些东西，说实话，心里直翻胃，差一点要呕吐出来。我饿得象只狼，人吃的东西早已没入过口，现在面前却摆

着这么多好吃的东西……我勉强克制住剧烈的恶心，费了好大劲儿才从桌子上移开自己的眼睛。

“喝得醉醺醺的摩勒正坐在我的面前。他摆弄着手枪，把它从一只手里往另一只手里抛扔着，同时两眼直盯着我，连眨都不眨一下，简直象一条蛇。这时，我双手贴在裤腿缝上，把磨坏的皮靴跟“咔嚓”碰了一下，大声报告说：‘警卫队长，战俘安德烈·索科洛夫奉命来到。’他接着问我：‘怎么，俄国佬，你说过开四方太多了吗？’‘一点不错，’我说，‘是太多了，警卫队长。’‘你又说做坟墓只要一方就够了吗？’‘是的，警卫队长，一方就够了，甚至还用不完。’

“他站起来说：‘我赞赏你的诚实，为你这番话，我现在亲手枪毙你。这里不合适，咱们到院子里去，那里是你见上帝的地方！’我对他说：‘随你的便。’他站了一会儿，想了一下，然后把手枪撂在桌子上，倒了一大杯白酒，捏起一小片面包，又在面包上放了一小块咸肉，接着便把这些东西递给我，说道：‘俄国佬，临死前为德军的胜利，干一杯。’

“我刚刚从他的手里接过杯子和面包，但一听到这些话，全身就象火烧一样难受！我心里想：‘我作为一个俄罗斯士兵，能为你们德军的胜利干杯吗？！你异想天开，警卫队长。反正我就快死了，你同你的白酒一起滚蛋吧！’

“我把玻璃杯放在桌子上，搁下吃的，说道：‘谢谢你的款待，但是我不喝酒。’他微笑着说：‘不愿为我们的胜利干杯？那就这样吧，为你自己的死干杯。’这对我会有什么损失呢？我便对他说：‘为我自己的死和摆脱痛苦，我可以喝一杯。’接着，我端起杯子，咕嘟咕嘟两口就喝了下去，但没有动一下吃的东西，我用手掌擦了擦嘴唇，彬彬有礼地说：‘感谢你的款待。警卫队长，

我准备好了，咱们走吧，打死我好了。’

“但是，他却仔细地打量着我说：‘你临死以前，还是吃一点东西吧。’我对他这样回答：‘我喝一杯酒是不吃东西的。’他倒了第二杯，递给了我。我又喝干了第二杯，还是不动吃食儿，只为喝酒壮胆，心里想：‘最好在走到院子里与人世间告别之前，能喝个酩酊大醉。’警卫队长把他两道白眉毛扬得高高的，问道：‘俄国佬，你为什么不吃？别不好意思。’我对他回答道：‘对不起，警卫队长，我两杯酒下肚，也不习惯吃东西。’他鼓起腮帮子，噗哧一声，随后哈哈大笑起来。他一边笑，一边叽哩咕噜地说着德国话：看得出，他是把我的话翻译给他的朋友们听。那些人也捧腹大笑起来，移了移椅子，把嘴脸转向我。这时我发现，他们对我的态度有些变样了，好象温和了一些。

“警卫队长给我倒了第三杯酒，他的双手笑得直颤抖。这杯酒我喝得很慢很慢，咬了一小块面包，剩下的放到了桌子上。我很想叫他们这些该死的家伙看看，我虽然饿得死去活来，但决不会因为他们的一点施舍而噎死。我有我这个俄国人的尊严和骄傲。他们不管怎样用尽手腕，也不能把我变成牲畜。

“接着，警卫队长摆出一副严肃相，整了一下胸前的两枚铁十字章，没带武器，从桌子后边走过来说：“原来如此，你这个索科洛夫，是个真正的俄国士兵。你是一个勇敢的军人。我也是一个军人，但我尊敬值得尊敬的敌人。我不枪毙你了。再说，今天我们英勇的队伍已经开到伏尔加河畔，完全占领了斯大林格勒。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快乐，所以我宽饶了你这条命。回自己的住区去吧，这是因为你勇敢而留给你这条命的。’这时，他从桌子上拿起一个不大的面包和一块咸肉，递给了我。

“我用力紧紧抓住那块面包，左手拿了咸肉。这样意外的转

变，把我弄得完全不知所措了，连声谢谢的话也没说，就做了个向后转，拔腿向门口走去。这时我心想：‘现在他要是向我的肩膀中间打上一枪，这些东西就带不到朋友们那里去了。’没有，总算没发生这样的事。这一次，死神又从我身旁溜走了，它只是让我打了一个寒噤……

“我迈着坚定的步子，从警卫队长办公室里走了出来。可是来到院子里，就感到疲倦极了。我一闯进棚子，就倒在水泥地上，失去了知觉。伙伴们在黑暗中把我推醒：‘讲讲吧！’嗯，我记起了在警卫队长办公室里发生的事情，便讲给他们听。‘咱们怎样分吃这些东西呢？’我邻铺的一个同志问道，他的声音有些颤抖。我回答说：‘大家平分。’我们等到了天亮。用麻线拉开面包和咸肉，连一粒面包屑都计算在内，每人分到了象火柴盒那么大的一片面包。嗨，说到咸肉，你会明白的，只能抹一抹嘴唇。但是，大家分得都没意见。

“不久，他们把我们三百个身体最结实的人调往沼泽地排水，后来又发送到鲁尔区下矿井。我在那里一直呆到一九四四年。这时，我们已经打扁了德国人的颧骨，法西斯分子不再对我们俘虏胡作非为了。有一次，我们干日班的全体俘虏被集合起来，一个外地来的上尉通过翻译说：‘谁在部队里或者在战前当过驾驶员，向前一步走。’我们一共有七个人当过驾驶员，都向前迈了一步。发给我们每人一件旧工作服，由卫兵押着送到了波茨坦^①。到了那边，他们就把我们分散开了。我被分配到‘托吉’开车，——这在德国人那里是一个修建道路和防御工事的空头机关。

^① 波茨坦——柏林附近的城市。——译者

“我给一个少校衔的德国工程师开‘超级奥普尔’^①。呵，这可是一个胖得吓人的法西斯分子！小个子，大肚皮，横量竖量一样长，腰粗膀圆，象个胖太太一样。前面的军服领子上挂着他的三层下巴，后面的脖子上叠着三条胖褶。我估量，在他身上，少说也有三普特纯脂肪。他走起路来呼哧呼哧的，就象一个火车头；一坐下来吃东西，可够你受的！他往往整天整天地，从水壶里倒着白兰地，大吃大喝。有时我也跟着沾一点光：在半路上停下来，他也切着香肠、咸肉，边吃边喝；情绪好的时候，就扔给我一块，好象喂狗一样。他从来不把东西递到人家手里，一次也没有过，以为这样会降低他的身份。不过，无论怎么说，比起在集中营来，这里要好多了；我开始渐渐有点人样了，虽然是微乎其微，但总算是恢复人的模样了。”

“两个星期来，我把这位少校从波茨坦送到柏林，又从柏林送到波茨坦。后来，上级派他到靠近前线的地带修筑防御工事，为的是对付我们的军队。在这里，我完全忘记了睡眠：整夜整夜地在想，怎样逃回自己人这里，怎样逃回祖国。”

“我们来到了波洛茨克市^②。黎明时，我在两年中第一次听到，我们的大炮在隆隆轰鸣。你知道吗，老兄，这时我这颗心跳成了什么样子？就是新婚前去同伊琳娜约会时，我也没有这样心跳过！战斗在波洛茨克以东十八公里的地方打响了。城里的德国鬼子变得特别凶狠，都神经紧张了起来；我拉的那个胖子，酒也喝得更凶了。白天，我跟着他在城外东跑西颠，他到处下达命令，如何如何修工事；夜里，他就一个人没命地喝酒，喝得全身浮肿，连下眼皮都肿得老高老高……”

① 超级奥普尔——一种德国造的小汽车。——译者

② 波洛茨克——苏联的一个城市。——译者

“这时我想：‘是呵，不须再等了，我的机会到了！而且应是不只我一个人跑掉，还要把那个胖子随车带走，他对我们很有用场！’

“我在一片瓦砾堆中找到了一个四斤重的称砣，用擦汽车的破布把它包了起来，以备在万不得已用它打人的时候，不致流血。我又在路上拾到一段电话线，尽量把备好的一切必用之物藏在车前座下。在同德国鬼子们分手的前两天，晚上我给汽车加油回来，看到一个德国下等兵醉得象团烂泥，两手扶着墙在走路。我停下车，把他带到瓦砾场，剥下他的军衣，摘下他头上的船形帽。我把这些东西窝巴窝巴，塞在座位下，一溜烟跑了。

“六月二十九日早晨，我的那个少校叫我送他去城外，开往特罗斯尼察的方向。在那边，他在领着修工事。我们上路了。少校在后边的座位上安适地打盹儿，我的心这时可几乎要跳出了胸膛。我把车子开得飞快，但出城后便放慢了速度。后来，我停下车，跳出去，往四下里望了望，发现在后边很远的地方有两部卡车徐徐开来。我把车门开得稍大一些，拿出了称砣。胖子仰在座位的靠背上，打着呼噜，就象睡在老婆身边一样。喝，我拿称砣向他左边的太阳穴只重重地一敲，他的脑袋就搭拉下来了。为了保险起见，我又给他了一下，但我不想把他打死。我必须把他活着带走，他能向我们的人讲出许多情况。我从手枪套里掏出他的‘巴拉贝伦’^①，塞进自己的口袋里，把螺丝刀插在后座的背上，用电话线勒住少校的脖子，紧紧地拴在螺丝刀上。这为的是在开快车时，不至于让他倒下去，或者歪到一边。我连忙穿上德国军衣，戴上船形帽，跳上驾驶台。嗨，我开着车，一直奔向炮声隆

① 巴拉贝伦——一种自动快发手枪。——译者

隆、战斗激烈的地方。

“我从两个火力点中间冲到了德国的前沿阵地。几个自动步枪手从隐蔽部里窜出来，我故意放慢了车速，让他们看见车上坐着少校。他们一边摆着手，一边大声叫喊，意思是那边去不得。可我却假装糊涂，加大油门，拉上了八十公里的挡。等他们明白过来，用机枪向汽车扫射时，我已经开到了‘真空地带’，开始象兔子一样拐弯磨角，绕着弹坑飞跑了。

“这当儿，德国鬼子从后边射击着，可我们自己的人又从前边用自动步枪向我开火。挡风玻璃被打透了四个地方，散热器也让子弹打坏了……刚好，湖边的小树林就在眼前，我们的人向汽车跑来。我冲进树林里，打开车门，倒在地上，吻着泥土，连气都喘不过来了……

“一个年轻的小伙子，穿着军服，佩带着我还没见过的草绿色肩章，第一个向我飞跑过来。他咬牙切齿地说：‘啊哈，你这个见鬼的德国佬，迷路啦？’我扯下身上的德国军衣，把船形帽往脚下一扔，对他说：‘我亲爱的傻蛋！乖儿子！我怎么会是德国佬呢？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沃龙涅什人。我被俘了，懂吗？车上坐着一头骗猪，快把他解下来，带上他的皮包，领我去见你们的指挥员。’我把手枪交给他们。中间经过好几个人的引领，天落黑时才到达一个上校的地方，——他是一位师长。在这之前，他们给我吃过饭，洗过澡，还盘问过我，给了我一套军服，这样，当我到掩蔽部去见上校的时候，我已照规矩身着整齐的军服，从灵魂到肉体都是干干净净的了。上校从桌子后面站起来，向我迎面走来。当着全体军官的面，他拥抱了我，并说道：‘战士，谢谢你，为了你从德国人那里带来的宝贵礼物，对我们来说，你那个少校和他携带的提包，比二十个俘虏都宝贵。我要向司令部请求，让政

府给你奖赏。’我被他这几句话，被他这番厚意深深感动了，嘴唇直打哆嗦，不太听使唤，好不容易才迸出了一句话：‘我请求，上校同志，把我编进步兵连去。’

“但是，上校笑了。他拍拍我的肩膀说：‘要是你站着都吃力，怎么当武士啊！我今天就送你到医院去。在那里，给你治治病，养养身体，然后回家休一个月的假。到你假满归队，我们再看一看，把你分配到什么地方去。’

“上校和掩蔽部里的全部军官，都一一和我亲切握手告别。我因为两年没有得到过人的待遇，出来的时候激动极了。还有，老兄，当我跟首长谈话的时候，好半天都禁不住把头习惯地缩在肩膀里，仿佛怕挨打一样。你瞧瞧，在法西斯的集中营里，就把我们弄到了这种地步……

“从医院里，我立即给伊琳娜写了一封信。写得很简单：怎么当的俘虏，又怎么带着德国少校逃跑回来。嘿，连我也奇怪，不知道从哪里学会象孩子那样吹起牛来了？我不禁告诉她说，上校答应呈请奖励我呢……

“两个星期当中，我吃了睡，睡了吃。他们让我少食多餐，要不，如果让我放开肚皮吃，医生说，会撑死我的。我的力气完全恢复了。可是过了两个星期，却什么东西都咽不下去了。家里没有回音，说实话，我开始犯愁了。不想吃东西，晚上还睡不着觉，各种古怪离奇的念头净往脑子里钻……第三个星期，我收到了来自沃龙涅什的第一封信。但这封信不是伊琳娜写的，是我的邻居、木匠伊万·季莫费耶维奇写的。但愿上帝不要叫任何人收到这样的信件！他告诉我说，那还是在一九四二年的六月，德国鬼子轰炸飞机厂，我家的房子上落了一颗重型炸弹，伊琳娜和两个女儿正好在屋里……唉，他在信中说，连她们的影子都没找

到，在那房子的地方，只留下了一个深深的弹坑……我这次没把信读完，就眼前一片乌黑，心紧缩成一团。我倒在床上，睡了一会儿，才把信念到了头。邻居还写道，我的儿子阿纳托利轰炸的时候在城里。晚上，他回到村里，看了看弹坑，当天夜里就返回城里去了。临走前，他对邻居说，他要请求上前线当志愿军。就这么回事。

“当我把心舒展开来，血在耳朵里轰鸣的时候，便想起了我的伊琳娜在火车站与我难分难舍的情景。现在看来，在那时，她那颗女人的心呵，就预感到，在这个世界上，我和她不可能再见面了。可在当时，我却推了她一下……那时，我有家庭，也有自己的房子，这一切都是我们多年来苦苦挣来的呵，可是，在一瞬间，这一切却统统给毁灭了，只剩下孤身一人。我想：‘我这乖谬的生活不会是一场恶梦吧？’在德国的集中营里，我几乎每天夜里，总自言自语地跟伊琳娜、跟孩子们交谈，我常常鼓励她们说：我的亲人，我一定会回去，不要为我难过，我很坚强，我能活下去，我们还会重新团聚的……谁知道，两年来，我一直在跟死者说话呵？！”

说话的人沉默了片刻，然后用另一种低低的声音，时断时续地说下去：

“来吧，老兄，咱们再抽一支烟，我闷得简直喘不过气来。”

我们抽着烟。在春水泛滥的森林里，啄木鸟在“啁啁啁”在啄着树干。温暖的春风还是那样懒洋洋地拂动着干燥的赤杨花，云朵还是象是一张张鼓鼓的白帆在蓝天上翱翔，可是，在这默无声息的悲伤的时刻，那生机蓬勃、万物复苏的无边无际的世界，在我的眼睛里也变成了另一个样子。

沉默得叫人难受，我问道：

“那以后又怎样了?”

“后来吗?”说话的人象不乐意回答似地说:“后来,我从上校那儿得到了一个月的假期,经过一个星期,来到了沃龙涅什。我走到我们全家从前住过的那个地方:一个很深很深的弹坑,灌满了浑浊的泥水,四周长着齐腰的野草……一片荒凉,象坟地一样寂静。哎,老兄,难受啊,实实在在难受!我站了一会儿,感到钻心似地悲痛,又走回火车站。在那里,我连一时半刻都呆不下去,当天就回到了师里。

“但是,三个月过后,我又象从乌云里钻出来的太阳,喜气洋洋,阿纳托利找到了。他从前线寄给我了一封信,看样子是从另一个战线上寄来的。我的通讯地址,是他从邻居伊万·季莫费耶维奇那里打听到的。原来,他首先上了炮兵学校。在那里,正好用得着他的数学才能。过了一年,他毕业了,成绩优良,上了前线。这封信就是他从前线寄来的。他在信上说,已获大尉称号,在一座四十五毫米炮的炮位上指挥作战,曾得过六枚勋章和许多奖章。一句话,各方面都赶过了老子。我为他自豪得了不得!不管怎么说,我的亲生儿子当上了大尉和炮兵连长,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而且还得到了那么多勋章。尽管他老子只开着“斯蒂贝克”^①运运炮弹和别的军需品,但这没有什么关系。老子这辈子已经没干头了,可是他,大尉的前程还在后头呢。

“在夜里,我常常作着老头的梦:战争一结束,我给儿子娶个媳妇,自己住在他们小两口那里,抱抱孙子,干干木匠活儿。总而言之,尽是些老头的营生。可是,就是我的这些梦想也全都落空了。冬天,我们开始了不停顿的反攻,相互之间没工夫写太

① 斯蒂贝克——美国制造的一种汽车。——译者

多的信。战争临近结束时，在柏林附近，我在一天早晨给阿纳托利寄了一封简短的信。第二天，我就收到了回信。这时我才知道，我们父子两个从两条不同的路线都来到了德国的首都附近，而且两个人离得很近。我盼啊盼，巴不得马上能和他见面。唉，我们见是见面了……五月九日的早晨，恰恰就是胜利的那一天，我的阿纳托利被德国的一个狙击兵打死了……

“那天下午，连长把我喊了去。我到他那儿一看，一个陌生的炮兵中校坐在他旁边。我一走进房里，他也跟着站了起来，如同看到了一个军衔比他高的人。我们连长开腔说：‘索科洛夫，是找你的。’说完，他自己向窗口转过身去。我身上好象刺过一道电流，突然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炮兵中校走到我跟前，声音低沉地说：‘坚强些吧，作父亲的！你的儿子，索科洛夫大尉，今天在炮位上阵亡了。请您跟我一块去吧！’

“我摇摇晃晃，好不容易才站稳脚跟。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情景象梦一样恍惚：跟着中校坐上了一辆大汽车，穿过堆满砖头瓦块的街道。我还隐隐约约记得那士兵的行列和铺着红丝绒的棺材。我看见了阿纳托利。唉，老兄，就象现在看见你一样。我走到棺材跟前。我的儿子躺在里边，可已不是我儿子那个样子啦。我的儿子总是笑嘻嘻的，是个肩膀狭窄，脖子细长、喉结很尖的男孩子；但是，现在躺着的，却是一个年轻英俊、肩膀宽阔的男子汉。他眼睛半睁半合，好象不是在看我，而是在望着我不曾知道的很远很远的地方。只有嘴角上永不消失的那丝微笑，还能让我认出当年我那个托利加……我吻了吻他，退到一旁，中校讲了话。阿纳托利的同志们，朋友们，擦着眼泪，可我却没有哭，我的眼泪在心里流干了。可能就是因为这个，我的心才痛得那么厉害……

“在背乡离井的德国的土地上，我埋葬了自己最后的欢乐和

希望。儿子的炮兵连鸣起礼炮，给自己的指挥员送葬。这时，我仿佛要五内俱裂了……我丧魂落魄似地回到了自己的部队。不久就复员了。到哪里去呢？难道还要回沃龙涅什吗？一无可恋了！我想到，一个老朋友住在乌留平斯克，他是冬天受伤复员的，曾经邀我到他们那里去住。我想起他来，就动身到乌留平斯克去了。

“我那个朋友和他的妻子住在市郊，有一座房子，却没有孩子。他虽然残废了，可仍在一个汽车队里当驾驶员，我也在那里找了个工作。我就住在他们家里，他们把我当自家人一样看待。我们把各种货物运到区里，秋天又被调去运送粮食。就在这时候，我认了我这个新儿子。喏，就是在砂地上玩着的那个。

“通常跑了长途，回到城里，我的第一件事，就是到茶馆去吃点东西。当然了，也要喝二两解解乏。说实在的，我又对这个有害的玩意儿上瘾啦……有一次在茶馆附近，我看见了这个小家伙，第二天又看见了。那可真是个小叫花子：小脸儿上溅的净是西瓜汁，罩着一层尘土，脏得象土鬼，头发还乱蓬蓬的，可是他那双眼睛却亮晶晶的，象雨后夜里的星星！他那么招我喜欢，真有点怪，我甚至开始想念起他来了。每次跑长途车回来，总是急着想见到他。他就在茶馆附近，靠人们施舍过活，——人们给他什么，他就吃什么。

“第四天，我从国营农场装了一车粮食，直接拐到茶馆那里。正巧，我的小家伙坐在那里的台阶上，摆动着一双小脚丫，明显看得出，他是饿了。我从车窗探出头来，向他叫道：‘喂，瓦纽什卡^①！快上车来吧，我带你到大粮仓去，从那儿回来给你午饭吃。’他听到我的叫声，身子哆嗦了一下，跳下台阶，爬上脚踏板，

① 瓦尼亚的爱称。——译者

低声低气地说：‘叔叔，你咋知道我叫瓦尼亚呢？’说着，他那双小眼睛睁得圆溜溜的，期待着我怎么回答。荷，我对他说，我可是个有经验的人，啥都知道。

“他从右边走过来，我打开车门，让他坐在旁边，就把车子开动了。这个小家伙伶俐活泼，可不知怎么回事，忽然沉默起来。他想了一会儿，一双小眼睛从那两道向上卷曲的长睫毛下不住地盯着我，接着叹了一口气。这样一个黄口小儿，都已经学会叹了口气了。难道他也应该这样做吗？我向他问道：‘瓦尼亚，你的爸爸呢？’他低声回答说：‘在前线牺牲了。’‘那你妈妈呢？’‘我们一块来的时候，妈妈在火车里被炸死了。’‘你们是从那里来的呀？’‘我不知道，不记得了……’‘在这里你没有一个亲人吗？’‘一个也没有。’‘那你夜里在哪儿睡觉呢？’‘走到哪里，就睡哪里呗。’

“当时呵，我的热泪禁不住一个劲儿地流。我当机立断，下定决心：‘我们再也不分开了！我要认他当儿子。’我的心立刻变得轻松了一些，不知怎的也亮堂了。我向他俯下身去，悄声地问道：‘瓦尼亚，你可知道我是谁吗？’他也用近乎听不出的声音说：‘谁？’我同样悄悄地告诉他：‘我是你爸爸。’

“我的老天爷，这一说可了不得了。他一下子扑在我的脖子上，亲着我的腮帮、嘴唇、前额，同时又好象一只太平鸟^①一样，响亮而又尖利地叫了起来，叫得连驾驶室里都震动了：‘爸爸！我的亲爸爸！我可知道了！我知道你会找到我的！反正会找到！我等你来找我，等了这么长时间！’他贴在我身上，浑身直打战，如同风中的一棵小草。我的眼睛里蒙上了一层雾，全身也在哆嗦，两手在颤抖……真是怪得很，当时我竟然没有放下方向盘！不

① 太平鸟——又名“十二黄”，繁殖在苏联西伯利亚和中国东北。
——译者

过，我不知不觉地把车开到了水沟里，弄得马达也停止了转动。在眼睛里的雾还没有消散以前，我怕车会撞到人身上，再也不敢开了。我就这样约摸停了五分钟，我这个儿子一直紧紧地贴在我身上，全身象筛糠一样，一声也不响。我用右手抱住他，轻轻地把她搂在胸前，同时用左手转过车子，掉头向家里开去。我哪儿还顾得上往那大粮仓去呢，统统丢到了脑后。

“我把汽车扔在大门口，抱着我这个新儿子，一直抱到屋子里。他的两只小手勾住我的脖子，总也不肯放开。他还把自己的小脸蛋紧紧贴在我那没刮的腮帮上，就象粘上了似的，我就这样把他抱到屋里。主人两口子赶巧都在家里。我走进去，向他们使了个眼色，象真的似地那样说：‘你们快瞧瞧吧，我可把我的瓦纽什卡找到了！好人们，待承待承我们吧！’他们这对没有孩子的夫妇，马上明白了是怎么回事，立即跑里跑外，忙碌了起来。可我从身上怎么也放不下儿子。好说歹说总算把他哄住了。我用肥皂给他洗了手，让他坐在桌子旁边。女主人在盘子里给他倒了些菜汤，看他狼吞虎咽吃饭的那样子，禁不住掉下了眼泪。她站在火炉旁边，不住地用围裙擦着泪。我的瓦纽什卡看她抹眼泪，跑到她跟前，拉着她的衣襟说：‘婶子，你干么哭呀？爸爸在茶馆旁边找到了我，大伙都该高兴，可你还哭。’谁知道，我的天呵，她听了以后，哭得更厉害了，简直全身都哭湿了！

“吃过午饭，我把他带到理发馆，给他理了个发。回到家里，又在洗衣盆里亲手给他洗了个澡，然后用一条干净的大毛巾把他包了起来。他搂住我，就这样在我的怀里睡着了。我小心地将他放在床上，把车子开到大粮仓，卸下粮食，又把车子开到停车处，赶忙跑到了商店。给他买了一条小呢子裤，一件小衬衫，一双皮凉鞋，还有一顶草帽。当然啰，这些东西不光不合身，质料也很

不适用。就为那条裤子，我被女主人好骂了一顿。她说：‘你疯了，在这大热天，叫孩子穿呢子裤！’说完，立即把缝纫机拿出来，放在桌上，翻箱倒柜了一通。过了个把小时，她就给我的瓦纽什卡做了一条缎纹布的短裤，一件短袖的白衬衣。我和他睡在一块儿，这是我好久以来第一次安静地入睡。可是，我在夜里起来了三四次。每当醒来，看见他就象只小麻雀栖在屋檐下似的，躺在我的胳肢窝下边，轻轻地打着鼾，我心里就高兴得不知道说什么好！我尽力不翻身，以免惊醒他。可到底忍受不了，我就悄悄地坐起来，擦亮火柴，看看他的小模样儿……

“天亮前我就醒了，不知道为什么那样憋闷得慌。原来是我这个儿子从被单里滚出来，伸开手脚，横七竖八地躺着，一只小脚正好压在我的喉咙上。跟他在一块睡觉很不安生，可也习惯了，没有他还觉得寂寞呢。夜里，他睡熟后，我一会儿摸摸他的小胳膊小腿，一会儿闻闻他的头发，我的心才安静得下来，才变得温和些，要不，我这心就忧伤得象石头一样……

“起初，他跟着我在车上跑东跑西，后来我看这样干是不行的。我一个人需要什么呢？一块面包、一个葱头，加点盐，就够我这个当兵的填饱一天肚子了。可是带着他，情况就不同了：一会儿要给他打些牛奶，一会儿得给他煮个鸡蛋，不给他弄个热菜又不行。但是工作又不等人。我狠了狠心肠，把他留给女主人照管。可他从早一直哭到晚。到了晚上，他就跑到大仓库来接我，在那里，他盼我直盼到深夜。

“开头一个阶段，我带着他感到负担很重。有一次，天没落黑我们就躺下睡觉了，因为我在白天累过头了。可他一会儿象小麻雀一样，唧唧喳喳说个没完；一会儿不知怎的，又突然沉默了。我问他：‘乖儿子，你想什么来？’他两眼盯着天花板，反过来问我：

‘爸爸，你那件皮大衣放在什么地方啦？’我这一辈子从来也没有过什么皮大衣！为了叫他不再纠缠，我说：‘留在沃龙涅什了。’他又问：‘可你为什么找我找这么久啊？’我回答他说：‘唉，好儿子，我在德国找你，在波兰找你，我跑遍了整个白俄罗斯，到处找你，可你却在乌留平斯克。’‘那乌留平斯克比离德国近吗？波兰离咱们家远吗？’在入睡以前，我总是跟他这样东拉西扯一通。

“老兄，你以为他是随便问问有关皮大衣的事吗？不是的，这都不是无缘无故的。这就是说，他的亲生父亲过去穿过这么一件皮大衣，让他记住了。要知道，孩子的记性就象夏天闪电的反光一样，突然一闪，刹那间照亮一切，随即又熄灭了。他的记性就象闪光，有时会突然迸发出亮光。

“或许，我本来可以跟他在乌留平斯克再住上一年来光景，可是，在十一月里我闯了祸：我在泥泞地上行车，汽车在一个村子里打了一下滑，有头母牛正好打这儿走过，就被撞倒了。嘿，娘们儿大嚷大叫，人们跑着围拢过来，交通警察也闻声赶来了。我一再央求他原谅，他还是没收了我的驾驶证。牛站起来，摆了摆尾巴，快步跑进胡同去了，可我却失去了驾驶执照。我干了一个冬天的木工活，后来和一个朋友通信——这是我过去的一个同事，也是你们省里的人，在卡沙里区当驾驶员，——他邀我到他那儿去。他来信说，我可以先当半年木匠，以后便可以在他们省里领到新的驾驶执照。瞧，我们父子俩现在就是要到卡沙里去。

“再说，就是不曾有这次撞牛的事，我反正也是要离开乌留平斯克的。苦恼和忧愁不让我在一个地方长住下去。待我的瓦纽什卡长大几岁，送他进了学校，那时候我才会安静下来，在一个地方落下脚来。现在我还要带他在俄罗斯的土地上游逛游逛。”

“他走路可很艰难呀！”我说了一句。

“这样一来，他就很少用自己的双脚走路了，大多是骑在我肩上，让我驮着他走；要是想活动一下身子，他就从我身上爬下来，在路边蹦蹦跳跳地跑一阵子，象一只小山羊一样。老兄，这些算不得什么，不管怎样，我同他总可以过下去的，只是我的心晃荡得厉害，是应当换一个活塞了……有时它捏得紧巴巴的，一阵阵绞痛，弄得眼睛一片漆黑。我真害怕，有一天我会睡着死过去，吓坏我的小儿。况且还有一件伤心难过的事：几乎每天夜里，我都梦见死去的亲人。最常做这样的梦：我站在带刺的铁丝网后边，他们站在外边，在另一边……我跟伊琳娜、跟孩子们海阔天空地讲着一切，可是刚想拉开铁丝网，他们却离我而去了，就象是在眼前消失了一样……确实很奇怪，我白天一直表现得很坚强，从来没有叹过一口气，不曾叫过一声‘喔唷’，可是夜里醒来，泪水总是把整个枕头都浸透了……”

森林里传来了我那个同志的喊声和划桨声。

这个素不相识的、可我已倍感亲切的人，站了起来，伸出了一只象木头一样硬梆梆的大手说：

“再见，老兄，祝你幸福！”

“祝你到卡沙里去能有幸福。”

“谢谢。喂，好孩子，咱们上船去了。”

那男孩向父亲跑来，挨在他的右边，拉着父亲的棉袄襟，跟在跨着阔步的大人身边，碎步小跑着。

两个失去亲人的人，两粒被一场空前剧烈的战争风暴抛到异乡的砂子……在他们面前等待着的是什么呢？我希望：这个俄罗斯人，这个有着百折不挠的意志的人，能够经受一切。而那个孩子，一定會在父亲身边成长，等他长大成人，也一定能经受一切。如果祖国号召他去象他父亲那样做的话，他也能克服自己道路

上的种种障碍。

我怀着非常沉重的心情，目送着他们的背影……本来，我们完全可以平安无事地分手了，可是，这时瓦纽什卡那两条短短的小腿连蹦带跳地跑了几步，突然回过头来，向我挥动着一只嫩红的小手。就在这一刹那间，仿佛有一只柔软但很尖利的爪子，把我的心抓住了，我急急忙忙转过脸去。不，在战争年代白了头发、上了年纪的男人，不仅是在梦中流泪；他们就是不在梦中，也同样会流泪。在这里，重要的是要会及时地转过脸去。在这里，最重要的是不要伤害孩子的心，不要让他看到，在你的脸上是怎样地流着已经很少，然而却很伤心的男人的眼泪……

(1956年)

附：肖洛霍夫的生平与创作

苏联著名作家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肖洛霍夫，对于我国的广大读者来说，既熟悉又陌生。这个名字虽然广为人知，但是，他是怎样走向创作道路的？都有些什么成就？特别是所谓《静静的顿河》盗窃案的真象如何？这些问题我国广大青年读者却了解不多。这里仅借《肖洛霍夫中短篇小说选集》出版之际，为大家提供一些基本的资料。

（一）

肖洛霍夫是苏联当代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他的小说有独特的艺术价值。当他开始写短篇小说时，德高望重的老作家绥拉菲莫维奇就说过：肖洛霍夫“将会发展成为一个可贵的作家”。这个预言已经变成了现实，肖洛霍夫已成为全世界著名的作家。他的作品已先后用苏联各民族的五十四种语言和世界三十多种语言出版了九百七十四次，总印数多达七千九百万册。

他的作品怎样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吸引这么众多的读者

呢？让我们沿着他的足迹，追溯一下他的创作道路。

肖洛霍夫于一九〇五年五月二十四日生于顿河年屯州维申约申斯克镇克鲁日伊林村。他父亲原是梁赞省人，后来移居到顿河，曾当过商店的职员，磨坊经理等，母亲出身于农民家庭。肖洛霍夫六岁（即一九一一年）开始上学，先跟家庭教师季莫菲·季莫菲也维奇·姆雷欣学习，用了六、七个月的时间学完小学一年级课程。一九一二年进入卡尔金诺夫斯克小学二年级学习。他小学没毕业，就进入莫斯科一所中学的预备班学习，时约两三年，又转到维申斯克镇的中学学习。后因战争而辍学，回到出生地克鲁日伊林村。在这里，他度过了整个国内战争时期。一九二〇年到一九二一年，肖洛霍夫一家迁至卡尔金镇居住，他在附近几个村镇作人口登记工作，在拉特舍夫村还做过扫盲工作，也曾参加卡尔金镇业余剧团的演出，并为这个剧团编写过《他们的风俗习惯》、《常胜将军》等剧目。一九二〇年到一九二一年八月，他在卡尔金镇革命委员会当办事员，后来志愿参加粮食征集队，有时在草原上和匪帮作战。有一次，肖洛霍夫被马赫诺匪徒俘虏，只是因为年幼而获释，接着又在察里津省布卡诺夫斯克镇当粮食检查员。到一九二二年十月，肖洛霍夫去莫斯科，为了维持生计，曾当过装卸工、水泥匠等。一九二三年八月，他开始在红色普列斯纳第八〇三号房管所当会计和办事员。同时期，他加入了莫斯科共青团作家和诗人的“青年近卫军”文学小组，开始写《顿河的故事》。丰富的基层生活，特别是草原上的工作和战斗，给他积累了许多创作素材，成为他写作的源泉；在文学小组的学习，使他提高了文学素养，获得了一定的写作技巧。两者结合起来，就给肖洛霍夫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一九二三年九月十九日，他的第一篇作品《考验》（小品文）在

共青团的《少年真理报》上发表，署名为“米·肖洛赫”。同年十月三十日，第二篇小品文《三个纽扣》又发表在《少年真理报》上。年底，他返回故乡顿河。一九二四年一月十一日，肖洛霍夫在布卡诺夫斯克同马丽亚·彼得罗夫娜·格罗莫斯拉夫斯卡娅结婚，婚后两三天就同妻子一同返回莫斯科。这一年四月十二日，他在《青年列宁主义者报》上发表了第三篇小品文《检查员》。

同年十二月十四日，肖洛霍夫的第一篇短篇小说《胎痣》在《青年列宁主义者报》上发表。这篇小说开始写得情节过于简单，人物少，在编辑部的指导下，经过修改，补充了情节和人物，终于问世了。这是肖洛霍夫在小说创作上迈出的第一步。接着，他参加了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简称“拉普”）。一九二五年二月十四日发表了短篇小说《粮食委员》。从此，肖洛霍夫的作品如同冲开了紧闭的闸门，一篇篇陆续在各家报刊、杂志上发表出来。据统计，他先后在《青年列宁主义者报》、《农民青年杂志》、《星火》、《探照灯》、《接班人》、《共青团》等刊物上发表了《看瓜田的人》、《牧童》、《希巴洛克的种》、《有家庭的人》等十几篇短篇小说，还有中篇小说《道路》。这一年，他在莫斯科第一次和老作家亚·绥·绥拉菲莫维奇会见。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作家在他主持的一次作家晚会上，向与会者介绍了他的同乡——年青的肖洛霍夫。从此，肖洛霍夫开始了长篇小说《顿河乡土》的写作。

一九二六年，肖洛霍夫迁居维约申斯克镇，继续写长篇小说。同时也写了《死敌》、《小马》、《蛀虫》等多篇短篇小说。这一年，先后由新莫斯科出版社出版了两本短篇小说集：《顿河故事》和《浅蓝的原野》。年底，终止了《顿河乡土》的写作，开始写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第一部。一九二七年继续写《静静的顿河》，同时发表了《风》、《软弱的人》等短篇小说。

一九二八年，在《十月》杂志上发表了《静静的顿河》第一部。接着，各报刊发表了许多对小说热情洋溢的评论。四五月份，他作为莫斯科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的代表，出席了第一次全苏无产阶级作家代表大会。不久，《十月》杂志上又发表了《静静的顿河》第二部。十月一日，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全体理事在莫斯科开会，推选肖洛霍夫为《十月》杂志编委。叶尔米洛夫作了《关于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的报告》。苏联报刊开始热烈讨论《静静的顿河》。十二月三十一日，高尔基从国外写信肯定了《静静的顿河》第一部。一九二九年初，《十月》杂志发表了《静静的顿河》第三部的前十二章。

一九二九年十月，德国共产党文学和政治出版社出版了《静静的顿河》德译本。这是世界上最早的《静静的顿河》的外文译本。

一九三〇年一月，斯大林在党中央会见了肖洛霍夫。肖洛霍夫回忆这次会见时说：“谈话给了我很多东西，鼓舞我去实现新的创作构思。”接着，他参加了顿河地区农业集体化运动，开始写作《静静的顿河》第六卷。秋天，斯大林向肖洛霍夫转达了高尔基请他去索伦多的邀请。年底，他到意大利的索伦多会见了高尔基。返回顿河后，开始写长篇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不久，加入了联共(布)党，绥拉菲莫维奇是他的入党介绍人之一。

一九三一年，肖洛霍夫把《静静的顿河》第三部手稿的第一部分打印稿，经法捷耶夫转给高尔基。高尔基对此稿的优缺点提出了意见。

一九三一年十月，《静静的顿河》第一、二卷的中译本在上海出版，译者是贺非，鲁迅作后记。

一九三二年，《新世界》杂志开始发表长篇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十月》杂志继续发表《静静的顿河》第三部。一九三三

年，在亚速海边区，开始了反对原领导在集体农庄运动中的过火行为和严重政治错误的斗争，肖洛霍夫是这一斗争的积极参加者，他掌握了大量生动的素材。在这期间，他向党中央写了报告，请求中央派人调查处理边区领导的犯罪案件，并请求给顿河上游支援粮食。斯大林立即给肖洛霍夫打电报，感谢他的报告，并说要做到他所要求的一切。还让他报个粮食数字。不久，他将所需粮食的数字寄给了党中央，协助解决了顿河上游的吃饭问题。

一九三四年，他参加了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被选入大会主席团，并当选为第一届苏联作协理事会理事。从这年十一月到一九三五年，他先后到瑞典、丹麦、英国和法国访问。一九三六年七月，他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作者尼·奥斯特洛夫斯基通信，但因为忙于写《静静的顿河》第四部，没有能去看望他。这年十月二十一日，《真理报》登载鲁迅逝世的消息后，肖洛霍夫前往我国住莫斯科的钱俊瑞的寓所吊唁。

一九三七年六月，肖洛霍夫出席了亚速海黑海边区党代会，当选为边区党委会书记处书记。七月，他作为苏联代表出席了第二次国际保卫文化代表大会，当选为国际作家协会保卫文化执行局成员。十二月，他当选为最高苏维埃代表，次年一月，出席了最高苏维埃会议。

一九三九年一月，肖洛霍夫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就在这一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颁布命令：鉴于肖洛霍夫在苏联文学发展中成就突出，授予他列宁勋章。同年十二月，他完成了《静静的顿河》的写作。第二年三月，苏联人民委员会发布决议，授予《静静的顿河》斯大林奖金一等奖。肖洛霍夫把全部奖金捐赠国家，列入国防基金。

一九四一年，伟大的卫国战争爆发后，肖洛霍夫随军当了六

年新闻记者。一九四三年，他的长篇小说《他们为祖国而战》的部分章节在《真理报》上发表。一九四五年九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授予肖洛霍夫一级卫国战斗勋章。

一九五三年三月，斯大林逝世后，肖洛霍夫十分痛心，写了《别了，父亲！》的文章，发表在真理报上。

一九五四年，在第二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上，肖洛霍夫就苏联文坛上的问题作了发言。他在发言中批评说：二十年来的文学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近年来出现了许多平庸的作品。其原因是：成名的作家降低了对自己的要求，批评家则降低了批评的标准，作家仍存在着战争时期赶任务的习惯。他还尖锐地指出：《文学报》的领导者是靠西蒙诺夫提携登上文坛的，作领导的作家都是站在原地不动的作家。他的发言引起了不少作家的反对，如法捷耶夫、革拉特柯夫、阿扎耶夫等，都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可是肖洛霍夫仍坚持自己的观点。

一九五六年，肖洛霍夫出席了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在大会上，他谈到苏联文学的状况和任务时指出：近二十年来，好书是有数的，而平庸的作品却不少，其原因是，许多作家早已失去同生活的联系。他还认为，自从高尔基逝世以后，以法捷耶夫为首的集体领导，没有取得什么成绩。他提出要注意培养青年作家。这年十二月，《真理报》发表了他的中篇小说《人的命运》。

一九五八年四月，肖洛霍夫完成了《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二部的写作。

一九六一年，肖洛霍夫出席了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在会上他又一次指出，苏联文学落后的原因是作家脱离生活，号召老作家要培养新作家，要向文坛输入新鲜血液。这次，他当选为苏共中央委员。

一九六三年八月，肖洛霍夫出席在列宁格勒作家之家举行的欧洲作家联盟会议。会上讨论了“现代长篇小说问题”。肖洛霍夫在会上发言说：长篇小说家只能提出如何更好地创作长篇小说，使之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的问 题，而 不存在“要不要长篇小说”的问题。

一九六四年五月，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授予肖洛霍夫“民族友谊大金星勋章”；一九六五年十月十五日，瑞典皇家学院诺贝尔奖金委员会宣布授予肖洛霍夫一九六五年度诺贝尔奖金。一九六六年六月，他出席了苏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再次被选为苏共中央委员。一九六七年，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颁布命令，授予肖洛霍夫“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列宁勋章和“镰与锤”金质奖章，表彰他在“苏联文化发展中的卓越功绩”。这年五月，他出席了第四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并发了言。他责备爱伦堡在大会前夕去意大利海岸而不参加会议的作法。他还指出：在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未满四十岁的作家占71%，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占20.6%，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占13.9%，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只占12.2%。因此，他呼吁，要大胆地吸收青年作家出席代表大会，并提拔他们进作协领导机构。在这次会议上，肖洛霍夫当选为作协理事会书记处书记。

一九七一年，他出席苏共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也发了言。他指出：苏联文学从苏维埃政权建立的时候起，就忠实地为人民服务，在教育人民方面起了巨大作用。苏联文学是最有思想的文学。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他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

一九八〇年五月，值肖洛霍夫七十五岁诞辰之际，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颁布命令，为表彰获得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的作家肖洛霍夫在苏联文学发展中的伟大功绩，授予他列宁勋章和第

二枚“镰与锤”金质奖章，并决定在他的家维约申斯克镇为他建立半身铜像。一九八三年，苏联在出版世界古典和现代文学名著丛书中，又出版了肖洛霍夫的中短篇小说集。

(二)

纵观肖洛霍夫的生活道路和创作历程，可以看出，肖洛霍夫走过了一条坚实的创作道路。他所以能在艺术创作上取得重大成就，其主要原因可归结如下：

首先，肖洛霍夫是从火热的现实斗争中走上文坛并攀上高峰的。他的人生命运所遇到的正是俄国社会革命的激流汹涌澎湃的时代。当国内战争在顿河沿岸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时，肖洛霍夫还是个孩子。国内战争成了他的学校，磨炼了他的革命意志，也砥砺了他的艺术才能。在革命斗争的激流中，肖洛霍夫不是站在岸上观看浪花的游客，也不是浮在岸边的泡沫，而是主流中激起的一朵浪花。他当过粮食检查员，当过会计，参加过草原上的斗争。以后，他又参加了反过火行为的斗争，还当选为边区党委书记处书记。他所描写的一切，都是他亲身所历和亲眼所见。因此，他的作品不是某个概念的图解，而是栩栩如生的真正的艺术品。这些作品忠实地反映着时代精神，简直如同一部部史诗。如《粮食委员》、《看瓜田的人》、《死敌》、《小马》、《蛙虫》等短小说，反映了草原上激烈的阶级斗争。《静静的顿河》反映了极左的过火斗争造成的顿河上的一场暴动的情况，《被开垦的处女地》反映了农业集体化过程中的斗争，《他们为祖国而战》则反映了卫国战争时期苏联红军可歌可泣的战绩……由于肖洛霍夫的作品都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各个历史时期的一个侧面，很多苏联人都把这些小说

当成教科书，起到了很好的教育作用和鼓舞作用。

其次，肖洛霍夫无论反映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事件，都不回避生活所固有的种种矛盾。他的小说都是全面直书过去和现在的斗争，从不为某些领导人的好恶而奉迎地美化生活或丑化生活。这是一切正直的作家共同的特点。列夫·托尔斯泰在年轻的时候就给自己立下这样的约言：不仅不直接的撒谎，而且也不要消极地通过避而不谈来撒谎。他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都是对社会现实的揭示，从不绕道走。肖洛霍夫也是如此。他不仅不掩盖真象，而且决不把悲剧写成为正剧，也决不把正剧写成使人入迷的消遣读物。但是，真实的力量却是那么巨大，他写的生活的痛苦无论多么可怕，都会被向往幸福的强烈意志、获得幸福的愿望和赢得幸福之后的欢畅所压倒，所征服。你看他的中篇小说《人的命就是如此》。在这篇小说中，他描写了两个基本相似的命运。一个是安德烈·索科洛夫。他的历史是一个“被空前剧烈的战争风暴”连根摧毁了的人的不幸流浪的历史。“我被他们赶来赶去，哪儿没有到过！”——索科洛夫回忆自己在法西斯集中营的两年生活时这样说。但当他勇敢地 from 俘虏营里逃出来后，在自己的一家人住过的地方，看到的却是“一个很深的弹坑，灌满了浑浊的水”，妻子、女儿都炸死了，儿子也在战场上牺牲了。悲愤使他在“一个地方长呆下去”。“现在我还要带着他（拾的孤儿）在俄罗斯的大地上走一走”。这是一个普通的俄罗斯人的一生，充满了危难事件的一生，饱受了沉重打击和动荡的一生，尝尽“非人折磨”的一生。另一个人是索科洛夫在异乡偶尔遇到的一个无依无靠的“小傢伙”。他被战争夺去了一切：失去了家园，母亲在撤退时被炸死在火车里，父亲在前线牺牲了。他到处流浪，“可真是一个小叫花子：脸上溅的净是西瓜汁，罩着一层

尘土，脏得象土鬼，头发还乱蓬蓬的”，小小的年纪就已“学会叹气”了”。索科洛夫没有力量改变自己的“被摧残的命运”，不能使自己“死气沉沉的眼睛”获得新的生命，但是，他却能改变这个孩子的生活和命运，能够不使孩子眼睛的星光被蒙蒙的云雾所遮挡，能够使这个孩子不再去做一个孩子不应当做的事情。他自认是孩子牺牲的父亲，小孩也信了他。两个流浪的、“孤苦伶仃的”、失去一切的人，相依为命，坚强地生活着。索科洛夫使得这个孩子确实象一个孩子那样生活下去，而这个孩子也使索科洛夫“刚强起来”——永远有信心，永远是一个男子汉。这合二而一的共同命运，体现了“人的命运”，——俄罗斯苏维埃人的命运。作为更广泛的概括来说，还可以使人们体会到，这是全体胜利了的人民的命运。为了保卫自己的社会主义祖国，为了使“生活中新生事物必胜”，人民经历了战争的一切恐怖，忍受了“非人”的苦难。我们读了肖洛霍夫所描写的这种和那种事实上的全部深刻的悲剧以后，合上书本，留下的却是走向光明的印象，胜利的信心，向上的力量。这是无产阶级作家写悲剧必须做到的。

第三，肖洛霍夫的小说所以具有强大的艺术魅力，还由于他构思的巧妙，语言的生动，人物形象的深刻。由于肖洛霍夫生活的根底很厚，听到各种各样的生动故事，掌握顿河人民的生动语言，他所写的一切，都是他亲身经历的，不是坐在写作室里硬编的，所以，他写出的故事情节都巧妙而新颖，没有类同感。如他一九二七年写的《共同语言》中的故事，是通过一只驼鹿被战场上的铁丝网挂住这件事，引起作战双方士兵的认识、交谈。双方的士兵原来都是工人、农民，都有可爱的家，都愿意结束战争。从此，他们自动放下武器，愿意共同把斗争的矛头指向战争贩子。这是以一个真实的故事为素材的，是任何一个“天才”的作家生编硬

造不出来的。肖洛霍夫描写的人物是一群活生生的、光彩夺目的人物，他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笑声，都有自己的叹息，都有自己的追求。每个人走路和回头的姿态都各自不同，各人都按自己特有的方式去恨。爱情的明朗，爱情的光辉和爱情的不幸也因人而异，各具特色。你瞧，在短篇小说《放牛娃》中，有这样的描述：“格里戈里的妹妹杜尼娅当了放牛的下手，在哥哥的旁边大踏步走着。她晒得黑黑的雀斑脸在欢笑，眼睛和嘴唇也在笑，浑身上下都在笑。因为她在复活节之后不久刚度过第十七个春天。人在十七岁的年纪上，觉得什么都是可笑的：不论是哥哥的苦脸，还是一路上倒嚼的大耳朵小牛，甚至连他们两天没有吃到一块面包这件事，她也觉得可笑。”这里寥寥数笔，把十七岁的杜尼娅写得栩栩如生。在《野小鬼》^①中，肖洛霍夫写一个小鬼穿过枪林弹雨，完成给红军报信的任务时说：“匪帮们正在镇子上，爸被打死了……他们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爷爷叫你们快点去。”一个小孩奔跑的急促，对敌人的仇恨，对红军的期望，一下子全跃然纸上。读了这些话，就如同见到喘着粗气、充满爱和恨的孩子一样，十分亲切。还有，在《浅蓝色的原野》中，他为读者塑造了坚决拒绝跪在刽子手面前的安尼凯、谢妙和阿尼西娅；在《故乡》中，他为人们写出了一个“眼睛眯成一条线”的十七岁的共青团员、骑兵连长；在《共和国革命委员会主席》中，他为时代写出一个在敌人面前临危不惧的村苏维埃主席包加端列夫；在《死敌》中，他塑造了一个同富农进行殊死斗争的坚贞不屈的农村积极分子叶菲莫夫；在《粮食委员》中，他塑造了一个大义灭亲的青年伊格纳特，等等。肖洛霍夫了解人民，真正与人民同甘共苦，共命运。他热

^① 《野小鬼》、《浅蓝色的原野》、《死敌》、《共和国革命委员会主席》等篇未收入这本小说集中。——译者

爱人民，尊重人民的智慧和感情，千方百计帮助他们，并从最真实的、最可靠的、饱经沧桑的人民中的迫切问题出发，写出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他把劳动人民“嘭嘭”跳动着的一颗颗赤诚的心，如实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使我们看见了它们的每一个偏僻的角落，每一瞬间的变化。这种表现人物的多样性、深刻性和生动性，可以和曾经写过农民的大艺术家巴尔扎克、左拉、莫泊桑相媲美。

在肖洛霍夫的小说中，事件的叙述，景物的描写，人物的对话，其语言都是十分生动的。肖洛霍夫继承经典作家的语言传统，学习农民朴实、生动的语言，形成自己独有的语言特色。在《共同语言》中，讲到农民被统治阶级抓去当兵的痛苦时，他写道：“大家离开了土地，就象小孩子离开了乳头。”多么生动！在《委屈》中，他这样描写农村旱天的公路：“灰白色的尘土在道路上滚动着，象是从地上卷起的雪粉。”多么形象！在他笔下的旱灾是这样的：“从黑海岸边蔓延过来的歉收，象铁蹄一样在各种庄稼上面践踏而过。”写得十分逼真！熟悉农村生活的人读过肖洛霍夫这些描述以后，准会拍案叫绝：太妙了。人们离开了土地，就成了离开乳头的小孩，非饿死不行！土地，长出五谷杂粮，为人类提供了各种食物，就连大家吃的肉，喝的奶，仍然是大地母亲通过动物的转化给予人们的。土地不正是我们每一个活着的人的奶头吗！那在路上滚动着的灰白色的尘土多象雪粉呵！那因自然灾害而造成的歉收多象一些踏遍原野的铁蹄呵！如果没有饱蘸着农民感情的笔触，是提炼不出这些优美、形象的语言的。这些描写与列夫·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中描写的列文的田庄相比，用“异曲同工”这个词再恰当也没有了！

在肖洛霍夫的小说中，具有个性的人物对话，更是俯拾皆是。

如在《漩涡》中，从农民成为红军战士的巴霍梅奇在临死时对他的妻子说：“老婆子，不必为我们伤心！……活够了……我们早晚造得上那儿去的。过后为我作个祈祷吧，要记住，不要写：‘红色近卫军战士彼得’，要直接写：‘阵亡军人彼得·伊格拿特·葛利高里’……不然，神父是不肯接受的……嗯，别了，老婆子！……要活着……爱护小孩子。如果我啥时候有对不起你的地方，那就请你原谅……”读了这一段话，难道我们不为之感动吗！一对生离死别的老人出现在我们面前，而这位敢于赴汤蹈火的老战士，对死的来临，视死如归；但他还有点农民的意识，相信上帝；对未来充满信心，要老伴照顾好小孙孙。为了让神父允许老伴为他们祈祷，还教她如何写他们牺牲者的身份……这不多的话语，把战士复杂的心情刻画得淋漓尽致。难怪苏联一些评论家和作家认为，肖洛霍夫的语言有列夫·托尔斯泰的特色！

（三）

肖洛霍夫在文学上的巨大成就，逐步受到国内外艺术大师们的重视和赞扬，为文学研究人员所注视，成为世界文学界的一门学问。

在苏联，最早发现和支持肖洛霍夫的是老作家绥拉菲莫维奇。肖洛霍夫早期的短篇小说《顿河的故事》一问世，绥拉菲莫维奇就赞扬说：这些小说，“象草原上的鲜花一样，生气勃勃，色彩鲜艳。朴素，鲜明，所讲的故事使人感同身受，仿佛就在眼前。”他又说：“作者对所讲的事物具有广泛深入的了解。他眼光敏锐，能抓住事物的本质。并善于从许多特征中挑选出最典型的特征。”还惊喜地指出：“一个年轻的黄喙小鹰，但却展翅高翔了。……最

有眼光的人也难以预测，他会这样满怀信心地突然成长起来。”

当肖洛霍夫写出《静静的顿河》以后，轰动了苏联文学界。高尔基曾说：“法捷耶夫、肖洛霍夫以及象他们那样的天才，目前还是极少数几个。”阿·托尔斯泰指出：“米哈依尔·肖洛霍夫是我们文学中另一个非凡的现象……他在《静静的顿河》中，展示了哥萨克生活的史诗般的、充满土地气息的、生动绮丽的画卷。”法捷耶夫称赞说：“肖洛霍夫有着怎样巨大神奇的吸引人的力量啊。可以直率坦白地说，当你读他的作品的时候，会体会到一种真正的创作上的忌妒心情，觉得写的是那么好，真想偷走许多东西。”费定把肖洛霍夫称为“文坛上的一位大师”。西蒙诺夫谈到这位作家时说：“文学不是按个子高低排成的战士队列，但不管怎样，如果有人问我：在这些作家中谁名列第一？我会毫不犹豫地，散文界是肖洛霍夫”。

肖洛霍夫的作品被介绍到外国以后，逐渐受到世界文学界的重视。

法国著名的作家罗曼·罗兰指出：“苏联文学新的优秀作品（例如肖洛霍夫的书）主要是继承了过去时代的伟大现实主义的传统。这一传统已成为俄国艺术的灵魂，并且因为有了托尔斯泰更使它变得永世不朽。”

美国有影响的作家厄纳斯特·海明威曾说：“我非常喜欢俄国文学。我是在它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在当代作家中，我喜欢肖洛霍夫。”

英国大作家格雷厄姆·格林这样评价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只有巨大的文学技巧，才能不加粉饰地将哥萨克人粗野的生活展示其他民族的读者面前。”

日本作家小林多喜二读了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以后，

十分感慨地说：在无产阶级的文学作品中，我还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雄厚的、象大江大河的悠悠流水一般的、丝毫也不表露细琐感情的作品。用一句触怒人的话来说，这部作品不同于那些冗长得甚至令人感到憎恶的作品。”

德国著名女作家安娜·西格斯这样赞美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被开垦的处女地》是残酷的、未加任何修饰的真实。不是那样被弄得七扭八歪的、变了形的、似是而非的真实，而是原原本本的、真正的真实，它的源泉就是生活。肖洛霍夫在书中描写了他熟悉无比的事物。”

印度知名作家穆·安纳德在给肖洛霍夫的信中说：“您的具有广阔的史诗般规模的书激励了我，使我相信，东方的作家，通过在新的作品里描写欧洲极少了解的、遥远的、陌生的民族，也能进入世界文学的行列。”……

“誉满全球”如果说在商品广告中是一句庸俗的赞语的话，用来形容肖洛霍夫的作品，倒是名副其实的。

(四)

肖洛霍夫的代表作《静静的顿河》从一九二八年第一部发表到一九四〇年全书问世，共经历了十二年。其间，小说第一部和第三部的出版曾受到阻挠，只是由于高尔基和绥拉菲莫维奇的支持，才得以面世。关于这部长篇小说，是有争论的。较大的争论可以归纳为三次。第一次争论高潮是从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初。争论的焦点是《静静的顿河》算什么性质的书？肖洛霍夫是哪个阶级的作家？这时，虽有高尔基、绥拉菲莫维奇、卢那察尔斯基等权威人士对这部长篇小说的肯定，但是，一些评论家仍然认为，《静

《静静的顿河》反映了作者的客观主义、自然主义、超党性态度和抽象的人道主义思想；作者不是无产阶级作家，而是动摇的农民——同路人作家，有的甚至认为肖洛霍夫是富民意识的传播者，是无产阶级的异己分子。同时，有人告发他的《静静的顿河》一书的原稿是从评论家哥洛乌舍夫那里剽窃的。在老一代革命作家的主持下，这场争论是以这样的结果而告终的：多数人认为，肖洛霍夫是一位无产阶级作家，《静静的顿河》是一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那种对作者和作品持完全否定的看法，是极“左”的观点。关于这部书的稿源问题，经过党组织的调查研究，以绥拉菲莫维奇、法捷耶夫等五名作家的名义，给《真理报》写信说：“由于无产阶级作家肖洛霍夫的小说《静静的顿河》取得了理应得到的成功，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就散布恶毒的诽谤，似乎肖洛霍夫的小说剽窃别人的手稿，似乎关于此事的材料存在于联共（布）党中央或者检查机关。这种卑鄙的诽谤本身无需驳斥。”北高加索无产阶级作家协会书记处发出通告：“……对肖洛霍夫同志提出的指控是最卑鄙的诽谤，经过调查之后，没有一个指控得到证实……”

第二次争论发生在一九四〇年以前，除个别评论者外，大多数评论家和作家都已承认肖洛霍夫是无产阶级作家，《静静的顿河》属于无产阶级文学。但大家仍然就书中葛利高里形象的典型性和阶级实质开展了争论，并有一些人认为这个典型人物的最后归宿破坏了人物的完整性。

第三次争论是从一九五七年开始，直到现在仍在继续着。其中心议题是：葛利高里这一形象的悲剧实质是什么？争论的一方以列宁格勒的肖洛霍夫专家勃里吉科夫为代表，另一方以莫斯科大学教授雅基缅科为代表。双方的共同点是，一致认为葛利高里是一个悲剧形象。分歧点在于：前者认为葛利高里的悲剧

实质在于历史的迷误；后者则认为其悲剧的实质在于葛利高里个人的反叛行为。作家肖洛霍夫本人认为，《静静的顿河》中所反映的哥萨克暴动之所以会发生，是由于当时对待中农哥萨克所采取的过火行动。这种情况为在顿河上游地区活动的反动派——邓尼金的特使所利用。至于葛利高里的形象，据这位作者说，这“是陷入一九一四——一九二一年事件的强大漩涡中的个别人的悲剧命运”。他“有十分特殊的个人命运，我无论如何也不想在他身上体现中层哥萨克。当然，我将把他从白军夺过来，但我不准备把他变成一个布尔什维克。他不是布尔什维克”。肖洛霍夫还指出，他要在葛利高里身上表现出人的魅力。

当谈到葛利高里类型的命运时，肖洛霍夫说：“苏维埃政权已经把这种类型的人从他们所处的死胡同里解脱出来。他们中间的某些人选择了同苏维埃现实彻底决裂的道路，但多数人则靠近了苏维埃政权。在卫国战争中他们投入了苏维埃军队，现在他们正在参加人民的建设。”

这就是结论！

（段心强）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肖洛霍夫中短篇小说选

作者 = (苏) 米 · 肖洛霍夫著 马龙闪 段心强 赵惠媛译

页数 = 2 4 1

S S 号 = 1 0 3 3 7 8 1 4

出版日期 = 1 9 8 5 年 1 0 月第 1 版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胎痣

放牛娃
粮食委员
希巴洛克的种
阿廖什卡的心
道路 〔
“ 两个丈夫 ”
委屈
共同语言
学会仇恨
人的命运

附：肖洛霍夫的生平与创作